

蔡增基回忆录

蔡增基/著述 冯璇/翻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招商局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胡 政 谢寿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刘兰兮 李亚东 朱荫贵

杨 群 陈争平 易惠莉 武 力

徐秀丽 虞和平 黎志刚

招商局文库总序

1872年创立的中国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轮船招商局是晚清洋务运动仅存的硕果，它发展至今天，已成为横跨金融、交通、地产等三大核心产业的企业集团。自创立以来，招商局与祖国共命运，同时代共发展，饱经沧桑，几度挫折，几度辉煌，生生不息，以它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它在自身经营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印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荣辱兴衰，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坐标。招商局史不仅属于招商局，也属于全社会。招商局的发展史，值得学术界不断地探寻和回视。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招商局学”概念，希望学术界努力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学派。可以说，发展和繁荣招商局历史研究，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自20世纪早期开始，不少专家、学者潜心研究，陆续出版、发表了许多有关招商局研究的著述，新观点、新发现层出不穷。继承招商局金字招牌的招商局集团深刻认识到招商局厚重历史的社会意义，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积极组织、投入各方面力量，挖掘招商局百年历史，分别在1992年和

2007年成功举办了招商局历史学术研讨会，在2004年成立了招商局史研究会，设立了招商局历史博物馆，在2005年开设了招商局史研究网，历年出版和赞助出版了多本招商局历史研究图书，出资拍摄了多部招商局历史题材专题片，鼓励和支持了院校普及招商局历史知识以及培养招商局历史研究人才，派员对散落在各地的招商局文献进行了调查和复制以及购买，定期公开了许多招商局馆藏招商局历史档案。我们不遗余力地做好这些工作，除了推动招商局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外，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各界研究招商局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社会研究招商局历史服务。

2010年，鉴于招商局历史研究的迫切需要和为了系统化地展示招商局历史研究的著述、文献史料，我们提出了出版“招商局文库”的设想，希望将以前历年来已出版的和今后将出版的有关招商局历史研究书籍以统一的版式集中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我们的这一设想给予了大力支持，对如何建立“招商局文库”提出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并承担了出版任务。目前，“招商局文库”主要设有“研究丛刊”、“文献丛刊”两个系列。2012年，适逢招商局创立140周年纪念，我们将集中出版一批学术论著和历史文献，以作为“招商局文库”的开篇。今后，“招商局文库”书籍将陆续与大家见面。

希望“招商局文库”书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并引起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对招商局及招商局历史研究的关注、支持。

招商局集团

2012年1月

目 录

前 言	i
序	iv
引 言	vi
鸣 谢	ix
生平介绍	x
第一章 在夏威夷的童年岁月	1
第二章 三个金币起家	18
第三章 在美国完成学业	34
第四章 1916 年的中国	46
第五章 在香港的商业活动	62
第六章 我的婚姻和家庭	73
第七章 第一次欧洲之旅	87
第八章 在华南和华中的过渡性工作	100
第九章 在上海和广州的政治历险	112
第十章 在固定的职位上安定下来	120
第十一章 第二次访问英国	129

第十二章	重返市政服务	139
第十三章	重组航运的意外来电	151
第十四章	日军的第二次侵华	161
第十五章	避难澳门	177
第十六章	惊险重重的韶关之行	187
第十七章	艰苦跋涉到重庆	198
第十八章	重返美国	211
第十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22
第二十章	返回美国后的活动	229
附录 A	233
附录 B	235
附录 C	237
附录 D	238
附录 E	240
编印说明	243

前 言

这本自传讲述的是一个有过最不平凡职业经历的人最精彩的一段人生经历。对这段经历的描述又因为蔡增基先生持有的独特见解而变得更加妙趣横生。蔡先生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他们在夏威夷归属美国之前就移居到了那里。蔡先生是在檀香山的华人社区中长大的，先后在华人和西式学校中接受教育。17岁时，他认识了来檀香山为自己的革命活动筹集资金的孙逸仙，自此便成为他革命事业的追随者。

1911年，蔡先生从麦金利高中毕业，当年夏天就踏上了回到他祖先生活的故土的旅程。到达广东之后，他才知道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革命并且已经独立。书中一部分呈现的就是革命胜利初期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到的广州。

蔡先生最初的从政经历是他20岁时进入广东省立法机关工作。这让他有机会结识了胡汉民、杨永泰等一批革命领袖人物。后来他幸运地获得了赴美学习的助学金并选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对约60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经历的描述别有一番怀旧

而浪漫的气息。

1916年初蔡先生获得了学位，学成归国。透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生动鲜活地了解到当时上海和北京的样子。书中还写到了他作为“归国学子”的第一次创业经历以及在徐世昌总统领导下的北京政府及在孙逸仙博士领导下在广州国民政府就职的经历。他曾经在广州市政府，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工作，有一段时间还和孙科联系紧密。1926~1927年，他在国民党中的经历也非常有意思。他的讲述能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内部是如何运作的。

接近尾声的部分还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讲述的是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后他惨痛的逃难经历。他先是乔装打扮逃往澳门，然后在盐商的帮助下偷偷返回了中国大陆的非沦陷区。他刻画的1944年饱受战乱摧残的中国以及衰败的重庆让我们仿佛能切身感受到那种悲恸的情绪。

战乱让蔡先生失去了对中国的抱负和希望，他于是决定回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他回到美国时已经53岁，后来一直工作到79岁才退休。

关于这本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我还要说几点。蔡增基先生（英文名 J. K. Choy，依据威妥玛式拼音法为 Ts'ai Tseng-chi）本人在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撰写了回忆录的初稿。1969年他联系了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后者将他介绍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蔡先生慷慨地提供了一份回忆录初稿给东亚研究所的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组，笔者相信在该项目组的帮助下，蔡先生进一步挖掘了记忆深处的细节，大大丰富了这本回忆录的

前 言

内容。此时的初稿仍需要进行编辑并对一些细节加以补正，所以笔者和夏连荫（Julie Lien - ying How）女士就此整理了一系列问题，蔡先生对所有问题给出了回复，有一些是书面的，另一些则是在莉莲·朱女士（现随夫姓秦，Mrs. Chin）的录音采访中解答的。莉莲·朱·秦女士是项目组为本书指定的编辑，她将采访中收集到的材料加入了初稿，并对全书进行了编辑。

本书叙述仍采用蔡先生写就初稿时的视角。因此当书中提到某个朋友现在住在香港或是某个事件发生在 30 年前的时候，都是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时间基准表述的。

另外关于某些人名的拼写可能存在一些不统一。因为蔡先生的祖籍是广东省香山县（后为纪念该地杰出的后代孙中山先生，更名为中山市），所以他在提及人名时惯于依照广东话发音拼写，尽管有些人名现在已经改依威妥玛式拼音法拼写，但本书中大多数人名的拼写方式遵照了蔡先生的拼写。

在此我们要感谢莉莲·朱·秦女士对原稿的精妙编辑，更要感谢原作者给予我们协助他完成这本精彩回忆录的机会。

何廉（Franklin L. Ho）

韦慕庭（C. Martin Wilbur）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组联合主任

1971 年 11 月 23 日

序

对于一个不是职业作家的人来说，被邀请为一本书写序言算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而被邀请给自己父亲的回忆录写序言的就更少见。我该从何说起呢？

我整理思绪，探寻记忆，组织自己的观点，把印象转化为语言，而且希望尽量避免带有个人偏见。想要靠一个晚上的凝神静思就匆匆完成这项工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该怎么为我父亲的一生做评注呢？父亲已近耄耋之年，但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又准备着开启一场新的政治战斗。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他人生的精髓？我敢肯定这是旺盛的生命力使然。有人曾说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像许许多多的钟表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弦数，发条走完了，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说法似乎只与生命的长短有关，所以我想要追加一个推断——发条的质量是有差别的，有些弹簧的弹性比另一些弹簧更强。你说这是生命能量也好生命动力也罢，没有它，人生就没有想象力，没有主动性，没有创造力，没有表现，也没有成就。

序

父亲一生这前八十年就是对上述生命力表现的最好诠释。

白手起家的人有劣势也有优势。劣势在于他们缺乏社会和经济基础作为创业的根基；优势则来自他们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在逆境之中更能锻炼和打造出他们的性格。没有先天注定的道德桎梏，我的父亲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儒家与维多利亚式的混合人生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恃强不凌弱”国位高则任重；言而有信；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原谅你的敌人。

这样的人生态必然算不得纯粹，这里面有尼采式的自律，让一个来自檀香山的乡下男孩儿自学了中国官场的言辞礼仪；而实用主义的理念则无疑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教授的结果，也正是这样的理念指引他在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坚持不懈，并最终取得胜利。

父亲二次创业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纪，而他却在一个可以说是半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事业并再次获得成功。比这更让人佩服的，也许要数他的自我学习能力。他通过长达三年的马拉松式阅读学习，自学了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拉斯基的社会理论，以及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这些他在投身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三十年中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

父亲是个复杂又简单的人，受到很多人的敬仰与爱戴，尤其是他“迷途知返的儿子”。

蔡守仁 (Daniel S. J. Choy)

美国内科医师学会医学博士

1971年10月

引言

描述我父亲的名词很多，比如唐·吉诃德，也比如革命家。而他则称自己是一个受理想驱动的实用主义者。当有人把他无私和慷慨的举动拿来与“苹果籽约翰尼”相提并论时，父亲就会摇头否认：“不，我不是什么圣人。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我的一些事业也许取得了与苹果籽约翰尼相似的结果，但是我行为的动机从来都是要服务地方，甚至是整个社会。我的行动准则可以用两句中国名言来形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父亲就像一个专注的艺术家一样，他不会吹嘘自己的成就，他总是谦虚地认为自己的工作简单而令人愉悦的，算不得什么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样客观，能够欣赏别人身上的优点并给予适当的认可。

他对于尼克松总统最近决定访问北京一事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国际关系格局的举动。他当即给

我们打了长途电话，并兴奋地称总统的决定是天才的一步。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倡导改善中美两国关系，正是这样的理念让他说出：“总统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是最重要的。”听到我说中国国内还面临很多困难，经济问题就不容否认之后，父亲回答说：“只要大问题解决了，小问题都会随之获得解决的。”

1911 年到 1945 年父亲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年里，他真的只是在和政治巨头们玩弄政治游戏吗？也许从表面上看只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但所有工作背后，是他对至高理想的不懈追求。

我如此坚信这一点，是因为即便在我们还年少的时候，父亲就常常向我们讲述他事业中的故事。我们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了父亲不懈奋斗中经历的喜悦与哀伤。我们在这些故事中也开始意识到现实的艰难，但我们还是相信父亲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故事中总是被他的正义感挑战，并受到他想象力的启发。这些故事培养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热忱，让我一生受益匪浅。所以看到他在百忙之中找时间把这些故事写成书与更多感兴趣的读者共同分享时，我也很受鼓舞。

这里写到的只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经历，而这一时期也是他形成自己的哲学和行为的一个重要时期。我希望以后他能再花些时间把他 1945 年来美国以后的生活也记录下来。这段经历是关于他如何白手起家，利用同样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他出生的国家实现他的信仰与希望的。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想看到的故事。

人首先要是梦想家，梦想越崇高，他们的世界就越大；而只

有世界越大，人们才能支配更多的资源。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理想充满信仰，而且又能脚踏实地地去实现它们时，他就可以把那些资源转化为丰硕的果实，让一个人的梦想成为所有人的现实，哪怕这个人的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知晓。

李蔡文仪 (Elsie Choy Lee)

密歇根州安阿伯市

1971年10月

鸣 谢

在此我要感谢李蔡文仪 (Elsie Choy Lee) 撰写的封面书法作品《和平》；感谢莉莲·朱·秦 (Lillian Chu Chin) 和乔治·格林 (George Green) 协助编辑手稿备注；感谢威廉·罗克 (William Rock) 为本书进行整体设计和排版。我还想感谢《旧金山纪事报》许可我引用台湾第一次选举时该报刊发的社论；感谢《纽约时报》许可我引用詹姆斯·赖斯顿 (James Reston) 关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评论。最后我希望感谢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博士 (Dr. Grayson Kirk)，他鼓励我撰写此书，得以让一个在他的大学中接受教育，随后在中国的重建中贡献了自己微薄力量的华裔美国人有机会将自己的日记公之于众。

蔡增基

生平介绍

1892 年 2 月 1 日出生于夏威夷

1911 年任广东省议会议员

1915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和外国服务领事
证书

1917 ~ 1919 年任香港工商银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1919 ~ 1920 年任广州市政厅财政局局长

1922 年在上海任商标局局长

1925 年作为中国考察团成员前往欧洲学习各国政治、经济和
军事情况

1926 年任广州政府土地局局长

1927 年在汉口任交通部铁路处处长

1928 年初在上海任财政局钱币司司长

1928 年在广州任广汉铁路总经理

1928 ~ 1929 年在南京任铁道部管理司司长

生平介绍

1928 ~ 1929 年在上海任沪宁铁路总经理

1928 ~ 1929 年在上海任沪杭铁路总经理

1930 年在浙江省任杭州市市长

1931 年在上海任财政局局长

1933 ~ 1934 年在上海任土地局局长

1935 ~ 1941 年在上海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

1952 ~ 1953 年在旧金山任和记公司 (Wo Kee & Co.) 总经理

1952 ~ 1953 年在旧金山任中国商会董事

1953 ~ 1955 年在旧金山任《华人世界》董事

1954 ~ 1955 年在旧金山任自由民主中国改革运动股份有限公司 (Crusade for Free Democratic China, Inc.) 第一执行董事

旧金山唐人街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副总裁兼经理

1967 年在旧金山获第五届旧金山基金会年度人际关系奖

1970 年任中国文化基金会主席

1971 年 4 月 20 日受旧金山监事会颁发荣誉证书

第一章 在夏威夷的童年岁月

在广东省中山地区^①，有一个叫上栅的小渔村。从那里步行到中国南海岸的澳门大约需要 12 个小时。这里的村民大多靠海为生，有时也在祖辈传下来的土地上种点能生长的作物。村民通过水路和陆路与澳门和香港进行贸易。他们将土豆等农产品送到这两个港口，换些衣物和稍微奢侈一些的用品，给单调的生活找一些盼头。这里就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

村里大约有 1000 户人家，大多数都是卢、梁、蔡家的人。卢家和梁家都因经商而闻名。晚清时期，太平军^②占领长江以南那会儿，一些卢家和梁家人在上海和汉口做茶叶生意，成了百万富翁。蔡家是当地的参政家族，他们在离村不远的下栅市集上开赌场，利用他们的精明维持生计。不过，我父亲一家从来都过着淳朴的

^① 清末民初时称“香山县”，1925 年更名为“中山县”——译者。

^② 太平天国运动（1848 ~ 1865）是试图推翻清政府（1644 ~ 1912 年统治中国）的一次起义。

生活。他们辛勤耕作，把农产品运到市集，卖给香港和澳门来的货船。我父亲名叫蔡元余，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亲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于是大儿子担起了照顾全家的任务。按照风俗，大儿子要帮助二儿子成家，而相应的，二儿子也要在三儿子长大后履行这个义务。1870年，我父亲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他向他的二哥要了些路费，移民到了夏威夷。

当时的夏威夷是一个君主制国家。美国在夏威夷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当时它还没有被并入美国，任何人都可以移民到岛上，所以许多中国中山人都选择去那里。移民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遵从一种模式。一个省份中同一个地区或临近地区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移民，形成一个家族链条，到海外之后也会定居到同一区域。当时夏威夷的中国移民主要都是中山人，他们平和、勤勉又守法。我父亲是他家族里第一批移民到夏威夷的，但是他到达夏威夷的时候，很多关系密切的远房亲戚都已经生活在那里了，只是他们分散在檀香山和其他岛屿上的乡镇中，除了新年或节日很少见面。糖类出口是夏威夷出口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中国移民为当地糖料种植园补充了劳动力。在1892年我出生时，很多中国移民都是小农、水稻种植者、蔬菜园工人、厨师、家仆、小杂货店或干货店主。作为第一代定居夏威夷的移民，他们成了支撑岛上经济的主力，为夏威夷成为当今的太平洋战略中心打下了基础。

在夏威夷辛勤工作了20年后，我父亲回到家乡结婚，新娘是邻村卢家19岁的女儿。这门亲事是新娘的嫂子撮合的，她一直都留在村里生活。在娶妻的问题上，我父亲遵循了中国侨民的一般模式，

就是回到家乡迎娶一位家里人为他选定的新娘。没过一年，新娘怀孕了，我父亲于是先返回夏威夷，为即将到来的家人做好准备。

我的祖母是个残疾人。她小的时候因为一次事故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又在 75 岁的时候失去了听力。我的母亲婚后一直作为祖母的护士和仆人照顾着她，尽管母亲本人也像那个时代所有良家妇女时兴的一样裹了小脚行动不便。三年后她去夏威夷和我父亲团聚，而这也是她在夏威夷拓荒生活的开端。在村里的时候，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到达夏威夷一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在新的生活中，所有人都要劳作，但是母亲从小受到的淑女教育使她无法胜任这样的体力劳动。于是，我的外祖母从中国送来一个女孩儿帮助她做家务，四年后这个女孩离开了。来的第二个女孩儿名叫悦怡 (Yui Yi, 音译)，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她虽然不识字，也不是很聪慧，但是心地善良，为人谦和。她总能温柔地化解我和弟弟之间数不尽的打闹，而且从来没打过我们。大约在她 20 岁的时候，我母亲为她找了个丈夫。她结婚一年后死于分娩。在她去世后，她的丈夫依然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也视他如家人。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租住的房子附近拥挤不堪，还总是住着很多修筑瓦胡岛铁路的日本劳工。很多日本人都很虔诚，每天早上祈祷，站在屋外，嘴里念念有词，频频拍手。他们吃得很简单，一般是米饭、腌菜和一点鱼肉。这些日本人比较情绪化又很团结，可以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也可能成为最无情的仇人。他们还非常勤劳，生活空间保持得非常整洁。劳工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赌博。每到周末，赌徒们就会支起桌子，把劳工一周的收入都骗光。

夏威夷当地人都是乐天派，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人从事警察、码头搬运工或神职人员之类的工作，几乎没有人经商。他们非常热情，甚至会邀请陌生人一起吃饭。年轻的夏威夷人对学习很不上心，放学后他们喜欢游泳、钓鱼、打棒球或进行其他消遣，有时也会在夜晚的街角拨弄着吉他唱歌。

这个时代檀香山的中国城十分混乱，主要由小商铺和贫民窟一样的出租房组成。这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有一个“红灯区”，所以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性”的概念。中国城里还随处可见鸦片馆和赌场，这些场所的老板都是些显赫的商人、鸦片贩子，或是移民局和法庭的翻译。夏威夷并没有旧金山唐人街的黑帮堂会，檀香山也没有出现过那些帮派斗争。但我仍清晰地记得1900年中国城的那场大火。那一年，夏威夷卫生局发现了几例瘟疫病例，并下令烧毁几栋房屋以防止疫情蔓延，但是火情失控，几乎把整个中国城都烧毁了。

我家隔壁住着两户中国人，李家和黄家，两家十分不同。李家的父亲是个看庙人，有三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几个孩子都没怎么上过学；而黄家的父亲是个看门人，他的妻子是个受过教育又精明的基督徒，他们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李家的门总是开着，我可以随时去找他家的孩子玩，或是在晚上听李家父亲讲故事。黄家的母亲是个严厉又冷漠的人，我只有在得到特殊的邀请时才能踏进他们家的院子。我与黄家唯一的偶然接触是在我后来去上公立学校时，刚好跟他家的大女儿一起上每周的英语和算术课。黄家大女儿很不幸因为脊柱畸形，走路

一瘸一拐。她晚上给李家的几个男孩补习功课，额外加收我这一个“学生”，教我九九乘法表和一些拼写。黄家的孩子都很不一般，大儿子查理（Charles）是岛上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中国人。他在斯普雷克尔斯银行（Spreckels Bank）工作了十多年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后来成为檀香山第一家由华人群体经营并拥有的银行的经理。那时的年轻人都将他视为华人社区中的楷模。黄家人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孩子们的母亲，因为尽管他们的父亲十分勤劳朴实，但是并没有太多雄心和才华。

虽然父亲有一些在中国耕作的经验，但是他在夏威夷算不上一个成功的水稻种植者。（当时夏威夷岛上种植的水稻主要为满足内需或出口到美国供移民到那里的中国人食用。大多数水稻种植园是由中国人经营并种植的，利润也很高。）我父亲在水稻种植园租了几亩地，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等待着收割。然而，下一季的庄稼质量却很差，父亲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不得不放弃这一投资。这片地已经闲置多年，第一茬庄稼的好收成主要是由于土壤里积存的矿物质和有机养分。第一茬庄稼将养分吸收殆尽之后，土地变得贫瘠，就不再适合种植水稻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轮种的技术。这笔巨大的投资过后，父亲放弃了农业，尽管他内心深爱着土地。^①

① 当父亲 1920 年最终回到上海和我们一起生活时，他还把他的农具用粗麻布包裹起来带了回去。我们每一次搬家的时候，这一包农具都跟着我们。1932 年我们搬进上海白利南路的房子时，这些工具终于派上了用场。尽管年事已高，我的父亲仍旧兴致勃勃地指导家里的园丁用老家寄来的种子种植南瓜和冬瓜等各种蔬菜。

我父亲休息的时候喜欢抽浓烈的中国烟。我们不能忍受那么呛人的烟味，所以他一在客厅抽烟，我们就都躲开了。他最喜欢喝的酒是一种 100 度^①的中国药酒（Ng Kai Pai）。每顿饭他要喝大约 1/5 饭碗的这种辛辣烈酒，母亲会监督他不能超量，但是她也相信这酒能够为他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补充能量，帮助他保持健康。^② 每年春节父亲会跟朋友来一次豪饮，聚会之后他会醉得需要被人送回家由我们照顾。他似乎很享受以这种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第二天他会跟我们说他完全不记得前一天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一整年他都不会再喝醉。父亲喝醉以后很好照顾，他十分温顺、安静，直到破晓的时候才醒来。^③

我父亲是个善良、慷慨、老实、单纯的人。他的人生哲学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他与母亲不同，不喜欢管束孩子，因为他

① 旧制，约等于标准酒精度的 2 倍。——译者注

② 我父亲到老年的时候都非常强壮。因为我家没有男佣人，所以我不在家的時候，重活累活都是由他来做。他不仅身体强壮，家里有孩子扭伤脚腕的时候，他还能担当正骨按摩师。75 岁的时候，他还徒手独自擒住了一个年轻的入室偷盗者，并且一直控制住他直到我把小偷捆起来等待警察处置。

③ 最近我的孩子告诉我，父亲跟我们一起住在上海的时候，会在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所有人起床之前，吃完早餐之后喝一整碗白酒。孩子们看见爷爷喝酒感觉很同情他，所以这么多年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我女儿说：“虽然从小受到不喝酒不赌博的严格教育，但我那时也知道爷爷喝酒并不是酗酒。毕竟，喝酒是他自我表达的唯一方式。如果他不喝酒，我想他不会如此平静和长寿。连奶奶回忆起爷爷在檀香山豪饮的日子都说，他要是不喝酒就难以维持体力，因为他的工作都是重体力活。我还记得奶奶回忆起爷爷轻而易举扛起 100 磅大米时，眼里都闪着光。”

认为人的性格好坏是天生的。他经常说：“龙在天上飞，蛇在地上爬。”

我们家并不十分富裕，父亲做厨师、面包师、日间司机和种地所赚的零零散散的收入只能勉强应付家庭不断增长的开支。为了维持生活，我们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每个人都努力增加家庭的收入。母亲养鸡并做些针线活；我的弟弟卖报纸；我则在放学后去一个办公室打杂。此外，我和弟弟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活：砍柴、做饭、收拾屋子、打扫院子。从这样的家庭生活中，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价值以及待人处事的艺术。我感觉我在青少年时期获得的对人性的认识已经与大多数成年人获得的一样多。（这个世界是塑造性格、了解人性的最好途径。）

由于我的父亲是个内向少言的人，我很少有机会跟他交流想法。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带我去镇上，让我骑在他的肩上看戏。我们小的时候，他其实很少跟我们一起玩耍，因为他白天辛苦工作，每天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了，后来他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作息。^①

① 父亲在生命中最后几年与我们一同在中国生活，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忙着陪我的孩子玩耍，经常带孩子们去公园，算是弥补了他年轻时错过的与孩子相处的机会。在上海的时候，我还经常陪他去看戏，他总是抽着烟，沉浸在戏中，而我们的交流通常是无声的。在家人团聚，所有人都轻松愉快地闲聊之时，父亲也总是保持着沉默，但是沉默的交流有时也可以和对话一样有效。

母亲跟父亲正好相反。她很外向，能说会道。^① 母亲还在村里的时候幸运地上过三年学，那时很少有女孩子读过书。她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因此她是由她母亲一手带大的。她的母亲希望我父亲能在结婚后把她们俩带到澳大利亚去，但是还没等到父亲回中国去满足她的愿望，澳大利亚就通过了禁止中国人移民的法令。

我的二姐比我大两岁。她文弱、温柔、天性开朗、对谁都很友善。她也很美丽，她的美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美丽女性的标准。她非常疼爱我，我每次放学回家，都能喝上她给我准备好的一壶热茶，那也是我最喜欢的饮料。我们还经常在家里一起玩些小孩子的游戏，因为我母亲很保守，不让二姐出去与其他小孩儿玩，她认为女孩儿就应该待在家里。^②

① 由于我继承了母亲的个性，因此从小我就和母亲是很好的朋友。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吵架或争论，但是最后总能重归于好。我小时候，她就经常向我倾诉，就一些重要的事情询问我的观点。我是她的顾问，她总是向我吐露心声。我是“妈妈的乖儿子”，是她的“宠物”，她的最爱。直到我5岁，她还让我坐在她的膝盖上，抚摸我，不过朋友和亲戚都不赞成这种做法。她以我的聪明伶俐和优秀成绩为荣，但经常无意间激起她朋友和亲戚的妒忌。她喜欢我是因为我在家最能干、最听话，总是能高效地完成劈柴、做饭等家务活，后来由于我的英语好，也负责家里的对外事务。遇到下雨天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们甚至能聊上几个钟头，我们无所不谈，有时还包括性的话题，虽然我们对这一话题都知之甚少。

② 我的二姐19岁时死于牙齿感染，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家人去世。我并不害怕，但是感觉一直精神恍惚，麻木，挤不出一滴眼泪。即使是67年后的今天，我仍经常梦到她，因为我的记忆里还刻着那些年她帮助我、关心我、每天照顾我的美好画面。这样充满爱的记忆是让人很难忘记的。

我弟弟很像我父亲。他比较沉默寡言，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会话多起来，一旦他打开话匣子，就会变得非常健谈。由于我仅比他大两岁，所以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①他六岁的时候遭遇了一次意外：母亲在家里拜神烧香引起了火灾，弟弟的双手和脸被严重烧伤，并且左手的几个手指也残废了。因为我母亲不相信西医，所以由她亲自为弟弟医治。她从不相信现代医学，认为只有中草药能够治病。多亏上帝保佑，弟弟才逃过了这一劫。

我母亲是个精明的女商人。她掌管家里的财务，还能将家里的储蓄借出去赚取 10% 以上的利息。当时，如果有人家因为结婚、生病或其他原因需要钱，他们会依照惯例组织一些朋友建立一个互助贷款协会。每个人都拿出相同数量的钱，凑足需要支付的开销。通常，朋友们会按第一次出资的数额继续按月出资，持续一年。每个月，参与出资的成员可以为贷款进行竞价，愿意支付最高利息的人可以得到贷款。这个拿到贷款的人在分期还清所有钱之前，不能再参与竞价。这一“友好的”贷款协会通常包括 10 ~ 11 个成员，他们对彼此的家庭财务状况知根知底；只有那些信誉良好的人家才会被邀请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我母亲就是这样用家中积蓄进行投资的。

① 从我离开家以来，我和我弟弟就很少有机会再长时间地生活在一起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着精神和现实中的联系。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本着中国家庭中互助的精神，分担责任、同甘共苦。我们互相帮助教育孩子。他的两个儿子在中国的时候，在我家学习、生活了大约七年，而我的儿子和女儿去夏威夷上大学的时候则住在他家里。

母亲不仅掌管家中的财务大权，也是一家之主及家庭医生。在家里人生病的时候，她会按照中医医书的指导给我们开药方。对于感冒、消化不良等小病来说，草药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对于大病的药效就值得怀疑了。还好我们凭借强健的体格最终都能在她的照顾下痊愈。^①

母亲一直以铁腕管理着这个家。父亲很依赖母亲，大事都由她决定。我们有任何关于花销、学习或其他重要的事情也都找母亲说。她管教非常严格，经常查看我们是否完成了课后作业，关注我们和什么样的玩伴一起玩耍，看我们在外边是否调皮，等等。由于她是个热心肠，邻居们经常来找她寻求关于家庭问题或小病小灾的建议，她也很愿意伸出援手，因为大家来找她满足了她的自尊心。在她的小世界里，她是一个突出的人物，像一位教区的牧师带领教民一样。也许我就是在从小帮母亲一起协助邻居的过程中学会了关爱他人。她阅读中文报纸，对政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很自然地，她倡导女性的权利，可她并不把这样的观点付诸实践，她觉得让家里的女孩儿受教育不划算，因为她们结婚之后就不能再给家里带来收入了。

我母亲严格按照儒家思想来管教我们。这样的生活之道在五部儒家经典著作之一的《易经·家人卦》里是这样表述的：“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母亲全心全意地坚信这样

^① 在我母亲晚年时，家里有人生病都求助于西医，连父亲也是如此，这总让母亲感到很失望。

的教诲，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晚上总是坐在圆桌旁，看着我和弟弟学习中文。

母亲也有和蔼慈爱的一面。我小的时候，她总是把我带在身边，虽是无意，但她让我在生命最初关键的六年里一直感受到了全心全意的关爱。正是幼年时期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才让我在成年后能够勇敢面对更多的困难。^①

我的父母从小在中国乡村长大，仅了解中国村庄中的生活方式，因此天性保守、迷信、民族意识强。在我 13 岁之前，他们完全用中文教育我。我从 6 岁起开始进入中文学校。中国城里有三四家这样的学校，接收的大多是本区域内的中国男孩。这些学校采取的都是轮换教学的形式，属于各个年龄段的三四十个学生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轮流上课。我们通常会在这里学习到 13 岁，然后转入美国公立学校学习。我就读的第一个学校有大约 40 名学生，老师是传统的广东人。学校的课程从早上 8 点一直持续到下午 4 点。我在这里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去了另一个约有 30 名学生的学校学习了两年。我就读的最后一所学校约有 20 人，我在那里学习到 13 岁。大多数课程都是以传统中式方法教授的，学生要朗读背诵儒家经典“四书”，还要练习书法。因为教室里只有一个老师，所以对学生的管教是十分宽松的。只有最有天赋的和非常聪明的学生

^① 她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央求她给我讲一些中国英雄的故事。她很爱看历史小说，所以这方面的知识丰富。阅读是她这一辈子唯一的娱乐。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她也会熬夜读报，看新闻和八卦消息。毫无疑问，她是家里对时事和重大新闻最了解的人。

才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思想。那时，我每天背诵 12 句中文经典，再写几页书法。在这六年的中式教育中，我能够像鹦鹉学舌一样背诵“四书”，但是根本不理解这些经典文句的意思，因为老师没有时间向整个班级的学生解释其含义，他每天都忙着教学生认字并监督他们练习书法。这样的体系和夏威夷公立学校强制义务教育体系相冲突。当夏威夷学校训导员来检查是否有未进入公立学校的孩子时，我母亲会把我、我弟弟和姐姐藏进一个高大的写字台里。她一直把我们藏得很好，直到有一天我在上课时间到街上玩耍，才被一个训导员抓住。那时我 12 岁，这也标志着我要开始进入美国公立学校学习了。

在公立学校学习的第一天我郁郁寡欢、不知所措。我不喜欢被强迫去上学，而且一句英文也听不懂。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个老师非常好，费尽心心地用手势跟我交流。她最终说服我在黑板上跟同学一起画画。由于我之前学过书法，所以我画马画得非常好。她对我的作品感到十分满意，并要求全班同学照着黑板跟我画。当我发现我的才华得到了认可，我立刻感到与同学相处时放松了许多。我于是决定到这里上学，并很快开始学习英语。

从那以后，我的少年生活变得非常忙碌。每天的日程从 5 点开始：因为我们没有冰柜，所以我只能每天早上骑车去市场买新鲜的肉、鱼和蔬菜；之后我要为全家准备早饭；如果时间充足，我还会喂好马、清理干净马厩，让它们为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早上 8 点，我步行去上学；下午 2 点放学后，我会去一个中介公司的办公室打杂，直到 5 点之后回家，为全家准备晚饭；整个晚上的时

间则用来预习功课。我每天如此繁忙是因为母亲和姐姐因裹脚而行动不便。她们无法去买东西、砍柴、扫地或从事其他体力劳动，因此这些工作都落在了我和我弟弟的肩上。从 13 岁开始，我便代表我家处理外边所有需要用英语的事情，因为我是家里唯一懂这门语言的人。

那时，夏威夷岛上的生活艰苦又野蛮。各处都有帮派，帮派中的成员来自各个种族。我们都必须加入帮派，不然就会受到有组织的流氓的骚扰。新来的男孩儿加入一个帮派时，首先要跟某个老成员打一架。我们一家生活在环境最差的帕拉马（Palama）郊区，这里的帕拉马帮派以粗暴闻名。作为帕拉马帮派的一员，我也参加了不少这样的打斗。一次，我在这样的入会仪式中被打了个乌眼青，为了不被母亲鞭打，我只好告诉她说我被蜜蜂蜇了。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她没有意识到男孩儿成长过程中需要展现好斗的一面，她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

成百上千的美国教师——大多是女教师——来到岛上向我们介绍美国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夏威夷民主化和美国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向学生提供普及教育这一开明的政策和美国教师们的辛勤工作。他们首先鼓励我去追求良好的教育和更好的生活方式。这些智慧的改革者激发了我自强的抱负，他们鼓励我去更好的学校学习。因此，我从条件较差的小学转到了颇负盛名的麦金利中心文法高中（Central Grammar and McKinley High School），这所学校主要接收白人学生，仅留很小一部分名额给其他种族的学生。我凭借良好的成绩和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好心引荐，突破了

学校的种族门槛，说服了公共教育部门的主管帮助我进入这所一流的中学学习。我在夏威夷成功获得了良好教育的例子说明：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穷人家的孩子如果有志向、有能力，也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①

尽管如此，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直到1911年我20岁时参加高中毕业典礼晚宴，吃了第一顿西餐时，我才真正进入实践层面。在这一重要的庆祝活动中，我仔细观察了其他学生如何使用勺子、刀叉，并观察正确的喝汤和切肉的方法。尽管美国政府呼吁不论种族与肤色，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各项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免费的教育，但是白人学生和其他种族的学生之间的交往仍然极少。

从华人角度看，夏威夷被美国合并之前，我们拥有更多的自

① 我在中文学校里的两个同学卢志娟和卢爱琴，都是我的表亲，她们的父亲是卢澡。后来志娟嫁给了黄欢和。黄欢和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是位知名律师，几年前去世了。爱琴嫁给了林荣贵博士，他是夏威夷大学的董事，同时也是一个民权领袖，现在还在檀香山行医。其他中国同学包括安娜·孔（Anna Kong），玛丽·李（Mary Lee）、埃斯特·殷（Esther Inn）、玉·英（Yuk Eng，音译）、邰有青（Tai You - ching，音译）、所罗门·何（Solomon Ho）、欧内斯特·古（Ernest Koo），以及哈利·孔（Harry Kong）。同学中只有安娜·孔、玉·英和我上了大学。邰有青和所罗门·何已经去世，其他的同学仍生活在夏威夷或美国本土，有的退休了，有的仍活跃在商界，有的在公立学校教书。我的美国同学有莱斯特·马克（Lester Mark），他是一位显赫的民主党党员；泰德·森特（Ted Center），他后来去了阿纳波利斯（Annapolis）；霍华德·凯斯（Howard Case）是《檀香山广告》的编辑，后来我回夏威夷时还见到了他。我在香港的工商银行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泰德还来探望了我。如果接下来十年里能有民主党总统入主白宫，那么莱斯特可能会成为未来夏威夷州长的候选人。

由。在君主制下，移民基本是免费的，只要缴纳一点注册费就可以归化入籍。合并之后，1924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和归化入籍。这一法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废止。从那时起，葡萄牙人、日本人、菲律宾人代替中国人成了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其次是菲律宾人，俄罗斯和葡萄牙人较少。这些人都定居在这里，成为居民，帮助建设夏威夷岛。在这些移民中，只有葡萄牙人和俄罗斯人有资格通过归化获得公民身份。由于受到普及免费公共教育和民主生活方式的影响，夏威夷岛上各种族之间的通婚十分常见，因此仅有很少一部分白人还生活在纯白人的世界里。即便如此，从政治和经济上看，这些白人也需要与其他种族建立民主、友好的关系。在那些年中，其他种族的人们已经获得了有保证的投票权，并且可以从事律师、医生、工程师、政府工作人员及军人等工作。通婚是增进不同种族之间了解、促进和平、消除种族之间社会差异的最有效方式。

成长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屿上的我，有幸在17岁时见到了中华民国的“国父”孙逸仙博士。1909年，孙逸仙博士到访夏威夷，宣传他在中国的革命事业。我是在檀香山《自由新闻》（*Liberty News*）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他的，那个会议是由活跃积极的卢信组织的。参加会议的不过20余人，大多是同盟会的成员，那时的同盟会还仅仅是一个小团体。当时，我知道同盟会是一个革命组织，出于好奇，在不久之前偶然地参加了一次会议并加入了同盟会。我是同盟会里最年轻的成员，经常在会上见到孙科，当时他是《自由新闻》的秘书。孙逸仙博士的任务是筹集资金，并

主持会议，向人们宣传他的革命运动。我记得他带着两个小行李箱，一个里面装满了书，另一个装着他的生活用品。他的一个同志曾长富是一个杂货店的收银员，后者送给了他一双鞋，还有别人送给了他一些衣物等等。孙先生的演讲体现了民主精神，当我问他为什么想发动革命时，他告诉我，中国的四亿同胞正受着五十万满族人的统治，而且清政府腐败专制。我告诉他我不想看到如此多的人民受到一个少数群体的压迫，我支持他的革命运动，愿意成为他的同志。从这个杰出的领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伟大，以及中国人民对进步和现代化的期盼。他的个性、学识、热情以及坚信无畏地推动革命才是改变中国现状唯一手段的执着，无不深深地吸引并影响了我。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而他面对的顽固势力又是那么强大。公众认为他是个空想家，称他为“孙大炮”，即吹牛的人。他远远超前于他生活的时代，人们不理解他，也不欣赏他。

他的到访使得我和卢信成了好朋友，卢信是当地《自由新闻》的编辑，也是孙逸仙博士最活跃的一个政治拥护者。他是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也是名中国学者。我经常去报社，参加同志们讨论未来革命的会议，并了解革命活动的进展。卢信毕业于一所日本大学，作为一名学者，他编辑并撰写了著名的《生活之道》(*The Proper Way of Living*)。

之后，卢信回到中国，成为同盟会的主席，这个组织也是1911年革命爆发时的总部。此后，他担任了广东立法机构谘议局副主席、北京参议院议员，以及革命政府和袁世凯掌握实权的北

方政府之间和会的秘书长。民国时期，他担任过农商总长、司法总长。当时我与他建立的友谊对我的人生有很大影响，与这两位先生的相识颠覆了我的想象。这个世界似乎非常动荡，由于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对中国的局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使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决定，要在毕业之后去中国亲眼看一看。

第二章 三个金币起家

一些心理医生认为，人到了 17 岁就应该知道自己想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了。我 17 岁的时候想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原因是我数学很好。这样的想法是基于我辩证和逻辑的思维，然而我的潜意识里却充满了那些我母亲在我还是小男孩儿时就一遍遍讲给我听的中国历史故事。所以，当我高中毕业后该决定自己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之时，我并不确定自己的兴趣志向在何方。我唯一确定的是我需要有更多的人生经历来指引我。在那样一个人生节点上，虽然看到面前有许多条道路，但是我知道我必须更加了解每一条路之后才能做出选择。我想要先审视社会的更多方面，再决定自己要开始哪一项事业。我想要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至少也要先看看我父母的祖国。

我母亲发现我在高中时上了大学预科课程，但是没有得到去大商行做职员的机会时有点失望。她还因为家里拿不出钱送我去美国上大学而觉得没面子。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母亲明智地决定

让我自己去外面闯荡。她尽己所能地为我提供了一点经济资助，包括三个面值 60 美元的“大金币”和一张前往香港的 S. S. 蒙古号轮船船票。我自己为这次航行做的准备则包括在拍卖会上花 2.5 美元买了一个结实的旅行箱，花 8 美元买了一条 8.5 磅重的羊毛毯。1911 年 8 月，在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祝福下，我从檀香山启程，开始了我征服世界的旅程。我最大的力量来自坚定的内心。在这段旅程中，我始终坚信“人生的目标在于看尽这大千世界”。

太平洋邮轮航线的蒙古号轮船是一条速度为 15 节每小时的慢速轮船。在 1911 年，乘坐轮船是一种相当艰苦的出行方式，只有身体强壮、心志坚定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这样的不适。床铺都是木头做的，而且没有任何铺垫；公共卫生间在船舱之外，而且里面连卫生纸都没有。盥洗室里没有洗脸池，只能从一个龙头里接水洗洗脸和身体。乘客要自带寝具、毛巾、肥皂以及其他必需品。同时，还有乘客蹲在甲板上，为了争抢锡锅里一点粗劣的中餐来果腹而相互推搡。

不过到了晚上，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晚餐一结束，甲板上就会像被施了什么魔法一般转变成热闹的中国庙会，本来船上连吃饭时都没有桌子可用，可这会儿却摆出了牌桌进行赌博游戏，还有贩卖精心烹制的中餐的摊位。这些营生都是由骗子们组织来欺诈乘客钱财的。不少乘客是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乘船回国的，那是他们在美国辛辛苦苦工作多少年才攒下来的。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乘客在这些赌博游戏中输光积蓄的事情，他们要么不得不乘船回美国重新苦干几年，要么就被困在香港无处可去；我甚至

还听说有乘客走投无路，直接跳船自杀了。

概括地讲，赌博对人其实是一种侵害。我的朋友卢信曾经说他反对赌博成性，因为一旦人们放纵自己赌博，就会渐渐产生贪欲，甚至想要占有不合法地属于自己的财物。从更大的层面来说，人生就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是下了不同赌注的赌徒。我本人从来没有参与过实际财物的赌博，但是在人生中其他一些方面以及政治上我也赌过。这样的赌博，其收益不在于钱财，而在于自我的满足感，在于一个人实现自己服务社会的目标。一个好赌徒就像一个好的运动员，胜不骄败不馁，因为一时的胜负只是人生这场更大的赌局中的一部分。如果人们能秉持这样的哲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失败者自行了断和胜利者耀武扬威了。

在船上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中国中产阶级中偏底层的人士，包括小商人、劳工和水手。在这段大约三个星期的漫长航行之中，我对于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对社会的看法有了很多的了解。我还听他们絮絮地讲述自己简单的生活——翻来覆去的都是生活的艰辛。想要与人相处融洽的一个最重要秘诀就是微笑着听他们讲话，我很庆幸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一点。

蒙古号轮船上的船员都是技术娴熟的中国船员，厨师和乘务员也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乘务长、主厨和医生是美国人。雇佣中国船员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好水手，还能保持清醒，不会因为喝醉酒而错过开船时间。我发现船员中很多人都是有政治意识的。他们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航行过程中，每天晚上翻译官和两名乘务员都会极具煽动力地宣传一些号召人们将满族统

治者赶出中国的内容。这些革命者对我很关照，鼓励我支持他们的爱国运动，还准许我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的伙食比提供给乘客的要好些。

在横滨停靠时，我的水手朋友们让我跟他们一起上了岸。在游览了一些景色之后，当晚我还被带去了他们所有同志一起开会的地方。很多人做了关于加速国内革命运动的演讲，而我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也被邀请用中文讲几句话。我肯定让我的朋友们感到失望了，因为我只会说一点我父亲村子里人们讲的方言，在场的人都听不懂。不会说中国的普通话让我尴尬得脸都红了，最后只好识趣地坐回自己的位子。这是我第一次当众演讲，也是一次非常难堪的经历。这件事告诉我，作为一个移民的后代，回到父辈的祖国面临的第一场战斗就是要学会普通话，否则肯定是要在众人面前出丑的。

下一站当轮船停靠在马尼拉时，我去拜访了一个和我同宗的族人，并在他工作的冷饮店里待了几天。当时这里的美国长官伦纳德·伍德将军（General Leonard Wood）正在带领人们进行美国占领后的改革。城市中的警察和士兵都穿着卡其布的制服，其中小部份是美国人。这里整体的气氛是充满活力和乐观的，反映出了本地人对于我们在岛上实行的进步的殖民政策充满信心。作为美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我还给我的朋友们讲了夏威夷并入美国后取得的进步。

离开菲律宾后再航行四天，我们的船终于到达了它的目的地——香港。船在优良的港口停船抛锚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被

大大小小的中国帆船围住了，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旅馆业务员涌到船上来竞相拉拢旅客到他们的店里住宿。这样的人声鼎沸和推搡拉扯下，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的景象。乘客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行李，否则就可能被趁乱抢走。在同志们的护送下，我平安上了岸，然后直奔我舅舅卢新平经营的店铺去了。店铺的位置离滨水区不远，我把行李放下之后，就去城里逛了。对于一个在夏威夷广阔海岛上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里街道上的人山人海令我觉得眼花缭乱。人们几乎是摩肩接踵地在街上行走，人行道上已经全是人，而且还有人不断地涌上街道。令我尤为感兴趣的是路边卖水果和中式糕点的小贩，橘子、蛋糕的价格便宜得离谱，只要一分钱一个，我走一路就吃了个饱。

当天晚上我就随朋友一起去了广州。我们乘坐的河船上挤满了人。无论是船厅和所谓的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还是统舱里，甚至连甲板上都挤满了乘客。在我们所在的二等和三等舱里，有艺人轮流为乘客们表演歌唱和曲艺节目，结尾还少不了做做产品宣传，有卖独家秘药的、卖书的以及卖其他商品的。乘客们似乎并不介意这样的推销，而是自顾自地谈笑，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这样的嘈杂持续了一整夜，所以我们谁也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船到了广州，在河中心就抛锚停船了，所以有上百只舢板小船涌过来摆渡乘客上岸。放眼望去，能看到河口处停泊的帆船上的高高桅杆，还有沿江大道上的一些现代建筑。向北岸看去能望到石室圣心大教堂高耸的塔尖，这座教堂是用巨大的花岗岩石块砌成的。除了教堂还能看到观音山，这两个地方都是广州最著

名的地标景点，高高在上地俯瞰着城市中建筑的屋顶。而南岸的方向则有一家水泥工厂和林立的楼房，再远处则是延伸向天际的看不到边界的农田。

我到达广州的六周之前，中国的革命者们刚刚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我错过了统治中国 268 年的清朝政府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过渡的激动时刻。在这场革命中，改革和进步战胜了腐朽的统治。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的话，这是四亿汉人战胜五十万腐化堕落的满族寄生虫的胜利。这些满族人在依靠剥削汉人生活了几个世纪之后，已经失去了他们往日的雄风、进取心和尚武精神。^①

① 在 1911 年之前就有很多小规模、无结果、不成功的反对清政府的起义。1910 年，湖北省武昌的士兵们在黎元洪的带领下，组织了一次成功的革命，并宣布脱离北京的统治而独立。孙逸仙博士从美国回到中国接管了革命活动，并在南京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长江以北的省份仍然处于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清廷已经无法控制革命的蔓延，因此他们请出了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因为他曾经是最有实力和经验的总督。袁世凯前往南京出席和会并与南京政府就关于中国未来的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包括：清朝皇帝退位；孙逸仙博士辞去中华民国总统一职；任命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总统。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与五国银行团协商并签订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他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巩固。这五国分别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更希望由保守的前清官员而不是革命党人执政。为了安抚孙逸仙，袁世凯任命他负责全国所有新铁路的修建工作。

然而，袁世凯也没有逃脱“权力使人腐化”的定律，他开始策划阴谋颠覆中华民国。他怂恿自己的顾问古德诺博士（Dr. Goodnow）根据自己的观点撰写了一本著作来宣扬中国还不适宜采取共和制，并借此开始为自己的登基大业做准备。到 1916 年，袁世凯废除了共和国制度，自封为中国皇帝。以云南为（转下页注）

革命带来变化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民国的五色旗取代了原来的黄龙旗，还有男人们也不再蓄长发梳辫子。如果偶尔发现了还没有剪掉辫子的乡下人，准会有一群人蜂拥而上，不顾他的反抗甚至哭泣，强行剪掉他的辫子。此时整体的环境氛围是生机勃勃的，因为所有人都对中华民国抱有巨大的期望。

也有少数食古不化的坚持支持清朝统治的人，不过他们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想法。《易经》中说在革命结束之时，“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对于当权者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对这类隐藏的异议给予适当的宽容。此时的革命者们对于自己的敌人采取的正是这样的政策。在船上或火车上卖药卖货的小贩们可以随意和乘客聊些政治话题；茶馆里的客人们也可以随意探讨政治，或是对当天报纸上重要的社论、新闻发表评议。

革命期间，很多人自愿加入了革命者的军队，他们有的曾经是军人，有的则是土匪或海盗。现在部队集中到了广州，当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这些人的温饱并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几个月后，我担任广东省议会议员之时，广东省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决定，这些不好管教的乌合之众应当被强制分散到乡下

(接上页注①)代表的南方各省成功起义，反对北京，袁世凯忧愤成疾，不久就去世了。

孙逸仙因为对五大国长期的压迫感到失望，转而在苏联寻求帮助。在苏联的帮助下，革命党人以广东为基地建立起了新的政权，并且有效地联合了广西、湖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共同反对北京政府。米哈伊尔·鲍罗廷 (Michael Borodin) 及其他苏联革命者组织并协助领导了北伐。

孙逸仙博士在北伐军占领北京之前就去世了，后来蒋介石成为民国总统并将南京定为首都。

去。^① 接受这样安置的一些新兵曾经是土匪，而曾经是海盗的新兵则不愿意去从事这种军事农业劳动，因为他们基本上只会做水手。为了抓住这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广州市的城门关闭了三天。这在城中引发了小规模慌乱，有人当街斗殴造成了轻微的公共财产损失；商铺全都停止营业给商业活动造成了一些损失；由于整个城市实行了戒严令，所有的通信停止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不过最后，广州城还是恢复了安定和秩序。

我的朋友和我通常会在一个有好几层楼的大茶馆里吃早饭，或者按照这里的习俗称作喝早茶。茶水的价钱因喝茶的楼层不同而不同。有一天，我的朋友想为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而略微庆祝一下，于是领我去了高一些的楼层，并且选了一张正中间的桌子坐下。按照习惯，我们每人从写满各种茶水的目录上选了一壶。在我们惬意地喝着茶的时候，侍者还送来了各种点心，包括中式的饺子和糕点，都是广州最有名的小吃，里面填着精心调味的虾肉、火腿和鸡肉等馅料。茶馆的建筑样式秉承了中国建筑的一贯理念，形状是规整的矩形，四周都是窗户，窗户的形状也规整统一。所有家具都是由轻质的柚木制成的。每个茶桌的大小不尽相同，但是四周都坐满了客人，他们多数

^① 陈炯明将军也是一位老革命家，他在北伐之前就与孙逸仙博士政见不合。他主张在中国实现联省自治和松散的联邦宪政。虽然他因为背叛他的政治领袖和国民党的政治观念而受到谴责，但他其实是一位诚信之人，后来在香港去世，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

是穿着中式长袍的男性客人，也有少数客人穿着西式的套装，但是会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不露出里面的衬衣。这是一个相当高档的茶楼。这里的氛围充满文化气息和魅力，宁静的气氛只有在店小二对前往柜台结账的客人高声说出他要支付的钱数时才会被偶尔打破。

早饭之后，我告别了我的朋友，前去拜访卢信。他是在我启程之前不久回到广州的。当时他是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长，就住在沿江大道的同盟会总部里。卢信热情地邀请我也住到那里，并且任命我为广东省议会的 20 名代表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是唯一熟练掌握英语的人。我在议会的工资是 120 元一个月，由广东省政府支付。我用这笔钱付了一年的房费，就算在广州安顿了下来。

这样的职位让我有机会接触中国更高社会阶层的人士。在广东省代表大会中，共有 120 名成员，分别代表着广东省的各个区县、财政厅以及广州的各个行业协会。我借此获得了直接研究中国领导层秘密和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的难得机会。卢信是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接触现实的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

卢信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员，他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思想家，是一个民主、勇敢、有社会意识的杰出人物。在他面前，我也会不自觉地变得沉稳和谦恭。他百忙之中还会花时间教导我，指引我通过阅读大量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作品来获得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了解。他认

为好的文句一定要背诵下来，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精妙细微的差别；而历史书则要一边读一边用红色墨水批注标点和重要段落，以备将来参考引用；至于哲学作品则要广泛涉猎，为的是训练一个人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人的人生哲学。

政治家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日常工作包括出席会议，拜访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参加聚会广结善缘，还有就是为友方提出的法案进行游说并避免政敌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作为一名还在学习和练习中的初级政客来说，我采取了一种机智的寡言策略，尽量多听多看，并对从我这个小世界中听到看到的内容进行消化和吸收。在每周的例会中，我从不树敌，并且成功地结交了议会中几位竞争党派的领导人。在卢信之下，有两位竞争党派的领导人脱颖而出，分别是唐天如和杨永泰，他们都是极具政治敏感的杰出领导人。唐天如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被选为撰写满族历史的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愿意为了原则而战，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再后来他成为吴佩孚的首席行政秘书，吴佩孚是曹锟政府的军方领导人。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曹锟为总统的政府控制着长江以北的地区。^① 杨永泰则是一位聪颖过人、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也是把控人心、挑拨党派之争的大师。他教会我的第一课就是：只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才谈得

① 1949年时唐天如仍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居住在香港。

上治理国家。^① 唐天如和杨永泰是来自同一个省份的老乡，然而他们的道德观和处世哲学却完全相反。他们两人后来都在各自效力的军事领导麾下找到了自己使命的召唤。^②

那时的广州还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城市，街道狭窄，到处都是淤积的污水，缺乏现代的排水系统。过去修建的“五条中央水渠”已经被废物阻塞，成为蚊虫滋生的基地，到了晚上，有数以百万计的蚊子在广州城活动。最宽的街道就是临江的沿江大道，交通工具包括黄包车、轿子、舢板和小船。每天有成百上千的舢板和小船在内河上通过，而这些河流既是居民饮食用水的来源，也是洗漱等生活用水的来源。当时的广州城内一辆汽车也没有，从城市的一头到另一头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上行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只有最有技巧的行人才能躲过各种抬轿子和挑担子的脚夫，尤其是那些脚夫，好像因为他们负重就自然地享有对人行道的独占权似的，行人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挤到宽

① 后来几年，杨永泰协助蒋介石阻挠其他一些有实力的广州政治家以及孙逸仙博士的副手汪精卫和胡汉民成为这个国民政府中的官员。（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但是他从来不信任也没有合理利用过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州人的才能来为国家效力。）后来我再也没有和杨永泰的政治活动有过任何关联，不过每当他在国家改革中遇到问题而向我寻求有建设性的建议时，我都愿意提供帮助。杨永泰和胡汉民之间的仇视对立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政治秘密。还有人怀疑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一事也有杨永泰的参与。不过，杨永泰的政治生涯也在1936年11月他被暗杀后戛然而止。

② 杨永泰选择支持蒋介石，而唐天如则把包票压在了吴佩孚身上。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中国后四十年的命运。他们也都是充满争议的人物，只有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去评说了。

石板铺就的马路中央去。

作为中国南方的大都市，也是珠江三角洲的货物集散中心，广州绝对是一个政治、工业和商业的中心。这里是清政府统治时期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而且每年还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和来自本省 82 个区县的国内游客来此旅游。^①

在工作日里，议会每天都要召开例会解决重要的事务，会议从下午 1 点持续到晚上 6 点，甚至更晚。通常的立法程序是宣读秘书长提议的各项法案，然后成员们讨论决定是通过还是否决。大多数具有争议的议题都是涉及公民权利或是行政长官对已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的问题。由于我是当时议员中最年轻的一个，所以各个政治派系的领导对我都很友善，而我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亲密关系跟他们交换选票，用来支持对我们有共同利益的或是反对与我们利益冲突的法案。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地参加他们热衷于举办的各种聚会，留心从他们谈论的各种政治八卦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因为在这些场合里，我作为一个禁酒主义者往往是头

① 我经常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我喜欢沿路的风景，也喜欢看商店里展示的象牙、玉器和其他珍玩。饭馆里卖的都是有名的广东特色食物，同时也可以作为在这样的游玩之后歇脚的场所。

我并没有什么乡愁，因为好朋友的陪伴和有意思的工作让我觉得任何地方都像我的家一样。当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会到繁忙的街道上散步，逛逛博物馆或风景名胜，看场电影，拜访朋友，或者看看书也好。我独自一人几乎走遍了大部分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大街小巷。一次长长的散步于我就是一次思考和组织自己思想的机会。很多令我烦恼的复杂问题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找出解决办法的。不过，有亲密无间、设身处地为我着想的朋友陪伴当然还是更好的，那样我就可以向他们袒露我内心深处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了。

脑最清醒的一个。

议会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莫过于孙逸仙博士来此就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倡导的单一税制做演讲。他在这次访问期间并没有提及更多重要的、迫在眉睫的关于广东省的政治议题。尽管如此，他的来访仍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显示了他对于民主制和议会是受欢迎的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柱的信仰。可能是由于疏忽失察，也可能就是因为缺乏敬意，总之，在我就职于议会的那一年时间里，无论是广东省的政府官员还是军事统帅都没有赏光莅临过议会这个重要的代表人民的机构。

在广州的这段时间里，我还回到我祖籍所在的上栅村探访了一番。在那里我受到了堂兄（即我父亲兄长的长子）遗孀的热情款待。我在家族的老宅里住了几天，其间我还去离上栅不远的外坡村探访了我的外祖母。

在中国生活的第一个年头，我变得成熟、自由、自信并且独立。在广东省议会工作的这一年，我对人性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政治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可能获得的经历。这些无价的宝贵知识彻底消除了我的自卑情结和通常会与胆小怯懦、目光短浅联系到一起的“岛屿”思维。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良好的教育，那才是我实现未来人生目标的先决条件。我确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因为我还很年轻。

在卢信离开广州前往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之前，他还和广东省当局一起为我安排了一项助学金来资助我回美国完成学业，理由是我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值得称赞的贡献。更让我感动的是，

他是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替我安排好这一切的，直到马上就要启程前往北京之时才告诉我。这样一位真正的朋友做出的善举是源于他对我的高度认可以及对我的潜力的信心。他费尽心力地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剩下的部分就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了。

这个助学项目总共资助了 21 名学生，其中只有我一人是前往美国，其余的人都是去日本继续深造，因为他们都是曾经留学过日本的留学生。为了确保我能够进入省政府最终资助的候选人名单，我亲自前去拜访了当时的广东都督胡汉民，因为我知道我和我的支持者有些不合。不过胡汉民很亲切地接待了我，而且这算得上是一次非常随意的面谈了，他当时头发没梳、脚上还穿着拖鞋的样子可谓难得一见。行政工作对他而言是很辛苦的，他既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也没有处理省内各项复杂事物的天分。他最擅长的是政治宣传和“宫廷阴谋”，尤其精于玩弄使那些杰出人物都无法接近孙逸仙博士的把戏。^①

当我前去拜访胡汉民的时候，我建议符合大学入学条件的候选人受到优先照顾，他对此表示认可。也正是在这样的选拔标准之下，我成为仅有的几个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之一。

最终，我成功地获得了这项助学金，包括 500 美元赴美的旅费

^① 胡汉民后来几年在国民党内排挤了许多像卢信这样有能力的老同志，因此才让蒋介石在孙逸仙博士去世后取得了党内的支配地位。令人遗憾的是胡汉民没有宋朝（960 ~ 1279）宰相王旦那样的气度，能在自己退休时举荐虽然是自己的政敌，但是有真才实学的寇准来接替自己的宰相之位。寇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他阻止了辽国军队攻过长江以南，让那里的人民免受外族的欺侮和屠戮。

和每月 80 美元的生活费和学费。我为长途旅行而买了两本中国文学作品选集，还有一套《中国哲学的二十八个流派》和一套《资治通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我都在仔细研读这些书籍。

在我启程前往美国的时候，中国又在酝酿新的变革。当时袁世凯已经取代了孙逸仙的总统之位大概一年时间，他还没有暴露出他要恢复君主制的狼子野心。鉴于孙逸仙博士是自愿辞职并支持袁世凯继任的，所以革命者们也做了各种妥协，愿意与之合作。袁世凯是一个心志坚定、有很强行政能力的领导者，而且手下有很多既经验丰富、能力出众，又有行政工作背景的人才。人们都以为和平与团结的局面终于要来临了。整体上人们都是乐观的，只有少数极有远见的领导者才会怀疑袁世凯怀有的是只为实现他个人荣耀的邪恶野心计划。他们指出：清朝末期袁世凯曾经支持过康有为的立宪运动，后来却为了得宠于慈禧太后而毫不犹豫地背叛了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爆发时，衰败无力的清廷邀请已经赋闲在家的袁世凯出面处理危急的局面。于是他私下里与革命党人接洽，称只要同意由他出任民国总统，他就让清朝交出帝国皇权。从任何层面来讲，袁世凯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对民主政府没有任何信仰。他是一个真正的君主主义者，他一生都在与独裁权力打交道。所以他当上总统后一直在筹划摧毁共和体制，让自己重登王位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北洋军阀一直还在他的掌控之下，而且其实力并没有因为清王朝的覆灭而受到削弱。这支军队维持着长江以北地区的和平和秩序。而革命党人则

第二章 三个金币起家

还没有在长江以南组建起统一的军事力量，而且他们既有的军队在武器、装备和训练上也远不及北方。这就是我离开中国时，笼罩在政治地平线上的乌云。问题在于，狂风暴雨何时会爆发？爆发之后共和国的命运又将走向哪里？

第三章 在美国完成学业

前往美国的旅途还算平顺。1912年3月，我乘坐神鹰丸号（*Shinyo Maru*）从上海出发。在那之前，乘客先要乘小船驶出吴淞口，我在小船上又遇到了孙科和他的两个妹妹，他们也都要去美国。护送他们登船的还有宋嘉树，也就是著名的宋子文和宋氏姐妹的父亲。他个子不高，但体格结实，虽然定居上海多年，却还是保持着海南人的黝黑肤色。那时他和孙逸仙博士的关系非常密切，虽然他的二女儿还没有嫁给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但是他的大女儿宋霭龄，也就是现在的孔夫人当时已经成为孙先生的私人英文秘书。

行船经过神户时，我和孙科一家一起上岸。孙家人想找一家高档日本餐厅享受一顿正宗的日本料理。进入餐厅之前，我们必须脱掉鞋子换上日式拖鞋，想起自己一只袜子上有个大洞，我犹豫着不愿遵从日本服务员的要求。不过后者一味坚持，我也别无他法。当孙家的一个女儿看到我袜子上有洞的时候，她笑称自

己的袜子上也有洞，这回她可有伴儿了。显然我们在日本服务员面前很没面子，不过有人和我一起面对的时候，这种尴尬也成了趣事。要是日本人知道孙家人的身份，恐怕这件事就要上报纸头条了。

第二天早上重新登船起航之后，我们在新登船的乘客里发现了一位优雅迷人、温柔和蔼的年轻女士，她是中国驻旧金山副领事谭学燮（Tan Hsüeh - hsu，音译）的妻子，要去美国和丈夫团聚。谭夫人是在中国和日本长大的，所以她的日文流利，中文也很好。在航行途中，孙科跟我提到了他即将迎娶自己在夏威夷的表妹，并且邀请我做他的伴郎。我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而且我本来就打算在夏威夷逗留几天探望一下我的家人和朋友。停船一周之后，孙科在萨姆·戴蒙夫人（Mrs. Sam Damon）的乡村别墅里举行了婚礼。戴蒙夫人出生于广州，是一位老传教士的遗孀。戴蒙夫人家是夏威夷一个最显赫的家族，她的祖先是很多年前从新英格兰来到夏威夷岛教化岛上居民的传教士。时至今日，他们依然是岛上居民的道德仲裁人，同时也确保“蓝法”得到严格的遵守，即在安息日严禁世俗活动，商店都不能开门营业，所有人都不能工作。

孙科结婚后，我们一行人以及他的新娘马上一起登上 S. S. 西伯利亚号前往旧金山去了。我们在船上遇到了蓝天蔚将军和他的秘书任传邦（Jen Chuan - pang，音译）。任传邦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来成了沪宁铁路的执行董事。蓝将军是一位革命英雄，此次是受民国政府派遣前往美国考察那里的政治情况。

我们到达旧金山领事馆之后，副领事和当地华人代表前来迎接蓝将军。中国代表团慷慨地许可我们一行人享受了不少他们的优厚待遇，还将我们列入参加各种宴会的人员名单中。不过由于还要前往东部，时间紧迫，我并没有接受邀请参加这些为欢迎蓝将军而举行的宴会。^①

在旧金山的时候，我还遇到了曾经的同学安娜·孔（Anna Kong），她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读一年，即将前往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继续深造。我们说好一起坐火车去东部。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牧师，她自己是一名非常虔诚的教徒，也是一位迷人、聪慧的年轻女士。在前往纽约的途中，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宗教和美国的生活方式的话题。^②

我本来打算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学习法律，但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优良的教育设施和杰出的教学团队令我印象深刻。而纽约这座大城市作为一个学术、金融和政治中心，能够为个人提供的无数机遇也令我格外兴奋。于是我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

① 旧金山当时是一个开放程度很高的城市，唐人街附近和北部海岸上都有“红灯区”作为吸引游客的项目。房子里的人会公开地在过往行人中拉客，而且这个行业群体还认为她们的存在有助于维护这个城市的繁荣。我去过一次商业街上的大型购物中心，买了一些衣服，我并不知道这里的着装风格与东部完全不同，所以当我到了纽约之后，不得不重新买了几套西装，因为我担心我的旧金山风格西装会让我显得可疑。

② 安娜·孔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后嫁给了梅华全，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后来回到上海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广东省政府支付了我的全部学费，所以我不需要在假期里去打工赚钱，于是把时间全用在了学业上。^①

想要获得学位，我需要修习英语、逻辑学、美国政府研究、近代史、体育和外语。所有本科生在毕业之前还必须先通过游泳考试，很多中国学生之所以没有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最难的课程要数近代史，因为要读十几本参考书。通常情况下，有半数新生无法通过这门课，因为他们没有时间读完所有指定的阅读材料。我在高中就学过近代史，所以可以轻松通过。此外我还选了大学里的速成班课程，通过刻苦的努力，我在三年

① 大学一年级的時候我参加了许多校园活动。最壮观的一次莫过于让一年级新生从二年级学生守卫的旗杆上把棋子摘下来的活动。一年级新生试图通过猛攻的办法冲散高年级学生来抢夺棋子，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数是否占优和战略是否有效。抢旗子活动之后紧接着是两方成员之间的拔河比赛，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被拉过粉笔划定的界限的一方是输家，惩罚措施是被裁判用胶皮软管喷水。一年级新生还要先学会学院的所有歌曲。二年级生可以点名要求他们唱任何一首歌，不会唱的会被扔进洛氏图书馆前面的两个喷泉里。新生还必须戴着标明新生身份的帽子。学生们还会举办各种聚会，但是地点保密，只有举办聚会的班级才知道，为的是防止其他班级组织突袭。我升入二年级之后，我所在的班级在布鲁克林举行了一次吸烟会。我们分成小组，通过不同的路线前往集会地点，为的是摆脱新生的跟随。为了这次聚会，我们在当天早些时候就抓来了六名一年级新生，然后用运货的小面包车把他们带到晚上聚会的地点。这次聚会非常成功。我们准备了一大桶啤酒作饮料，还有六个新生供我们消遣。每次有新生拒绝表演我们指定的内容时，负责惩罚他们的二年级学生就会往他们头上浇啤酒。我所有的同学不管吸烟与否都带了烟斗来，以此作为成人的标志。为了这次聚会，我还特意蓄了小胡子，这也是二年级学生才有的特权。那时这些年轻人之间的恶作剧是我们发泄多余精力的途径，也是同学之间增进感情的方法。

内不但修完了本科毕业所需的课程，还修了一些研究生课程并最终获得了领事证书（Consular Certificate）。我每个学期的平均分是22个学分，暑假还能获得6个额外学分。我尽我所能修习了尽可能多的课程，而且都是由最好的教授们授课的：我的哲学教授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政治学教授是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社会学教授是富兰克林·亨利·吉丁（Franklin Henry Gidding）；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是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R. A. Seligman）；国际法学教授是约翰·巴西特·穆尔（John Basset Moore）；法理学教授是门罗·史密斯（Monroe Smith）；宪法学教授是威廉·D. 格斯里（William D. Guthrie）；侵权法教授是麦金太尔·库利（McIntyre Cooley）。我在1915年毕业时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和外国服务领事证书，这个证书通常是要再花两年的时间才可能获得的。

我在学校就读时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我很喜欢宿舍生活的自由自在。我们可以随时进出，甚至外出几天不回来住也没有人管。因为学生被当作成人对待，学校相信我们是有自制能力的。我所居住的利文斯顿楼（Livingstone Hall）里面住的大多是研究生，这使得整栋宿舍更有一种宁静的学术氛围。在面积巨大、天花板很高的大厅里，摆放着舒适的皮椅，学生们可以在这里打发时间，可以聚在一起探讨各种话题，也可以盯着巨大壁炉里燃烧的木柴发呆。整栋楼共有九层，有两部电梯，全天候运行。楼里没有食堂，所以学生们要么在学校的公共食堂吃饭，要么在附近的餐馆里吃饭。到晚上，还会有至少两名守卫值班，以防止

有人擅入。

自立精神在大学的各个学院中都很普遍。每到期中和期末，所有学生的成绩都会被张贴在布告栏里。两门课成绩不合格就会被开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一个人要想在大学里完成学业，就必须是个成熟、有自制力的人。有一位教中文的弗雷德里克·赫斯（Frederick Hirth）教授就不采用考试的方法，而是在期末邀请每个学生到他的办公室里喝茶，同时评价自己的学习成果。总之，平日用功比考试前抱佛脚重要得多。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研究是完全自由的。教授们鼓励独立思考，而且经常会针砭时弊，批评社会和政治中的权力滥用和贪污腐化。比尔德写了一部阐述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的著作，指出了共和国建立者们内在的实利主义动机，这使得他受到了保守派群体的强烈抗议。杜威则向学生们教授激进的经验主义，训练学生们在按照他的著作《我们如何思维》（*How We Think*）列举的规则衡量一个问题之前，不要轻信任何权威。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是教育学必读参考书之一。这些学术巨匠们教会了我道德诚信和学术诚信；他们就是儒家学派里所谓的“君子”，他们倡导学术勇气，就如《易经》中描述的那样：“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共有 12000 名学生，其中有 60 人是来自中国各省的留学生。在中国学生中间，也有几位是杰出的革命者，他们都是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出于政治避难的原

因来到美国的。^①

基本上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说普通话，也就是中国除福建和广东之外各省通用的语言。和他们一起相处让我也学会了讲普通话，这在后来对我非常有益。政治话题在他们之间很流行，而且他们基本上会按照自己所属的地域结成派别。华北、湖南和广东的同学会凑在一起，因为他们的脾气相投，大都直白、坦率而且争强好胜；而来自四川、湖北、江西、浙江和江苏等地的同学则是另一派，因为他们的说话方式婉转，世故而且比较消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被前一派推举为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

当时袁世凯正在准备恢复帝制，他委任他的顾问弗兰克·J. 古德诺（Frank J. Goodnow）教授写一本书，古德诺教授正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行政法学教授。这本书的目的是向西方社会宣传中

① 这些革命家包括：钟荣光博士，他是一位中国学者，后来成为广州岭南大学的校长；黄芸苏，他曾经是旧金山《少年中国日报》（*Young China Daily*）的编辑，也是中国驻旧金山和檀香山总领事，还是孙逸仙指定的广州特别代表。他们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在纽约共同创办了《民气日报》作为反对袁世凯的工具。这份报纸至今还在运营中。我曾经给他们帮过忙，但是一直没有成为报社的一分子。钟博士很多年前就去世了，而黄芸苏现在还生活在旧金山。当时还有五名女同学，其中两个是巴纳德学院的，另外三个是师范学院。在哥伦比亚学院就读的只有七名男同学，我的班上有两名，一位是来自马尼拉的 C. S. 薛（C. S. See），另一位是来自中国的 T. T. 刘（T. T. Liu）。另外四人分别是来自纽约的谭辉和来自中国的陈耀荣、唐荣礼和 M. C. 蔡（M. C. Tsai）。刘学习的是哲学和社会学，后来他回中国，在燕京大学教书，再后来又返回美国，几年前已经去世了。薛学习的是经济学，后来回马尼拉成了一名银行家，他也在几年前去世了。谭辉在广州中央银行工作，蔡现在在香港，生活比较拮据。

国还不适宜建立共和国政体，只有君主制才能保证中国的统一。当古德诺回到美国以后，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请他来讲讲他对于中国君主制的看法。为了让这个活动更完善，也为了给大家多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随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又请来了政治和历史学教授查尔斯·比尔德，他告诉学生们说：你们回到中国后要做中国的甘必大（Gambetta）。他说甘必大花了三年的时间在法国各地走访，宣传民主理念，最终使得法国人民决心支持第三共和国。可惜的是，当时没有人把比尔德的话当真。这些学生学习的大多是工科或者是与民事、行政工作相关的学科，而且他们大多倾向于现实主义，采取中立的政治立场。他们回到中国后，都满足于成为公务员，服务于政治官僚机构。这些学生本来就多是来自富有的中国家庭，在美国求学时也满足于消极、平和的生活状态，这与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往往会选择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立场，回国后大多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人物。这也是中国在过去 60 年中在政治和军事事务上都深受日本和欧洲模式影响的原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 60 个学生，没有一个人尝试为在中国建立共和国而做出努力。他们要么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个人事业，要么继承了“伪预言家”古德诺未完成的事业，支持中国的反动和独裁统治。

物质享受和万能的美元是最吸引在美国的留学生们的东西。他们不关心政府是不是遵照宪法和民主制度建立的，而是满足于成为工程师、管理者和金融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学习采矿

工程的同学对我说，他根本不觉得中国需要什么政治进步，采矿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在他看来，我学习政治科学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足够好。这个学生和当时其他大部分来自上层社会人家，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了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权阶级成员一样，本能地希望维持中国的政治现状。正是这样的心态作祟，才使得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留学美国和英国的归国学子中无一人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反而是有不少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搭上了革命者胜利的便车，从民国成立之初就在政府中谋到了一些肥差。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学习政府学、法理学和国际法学。否则我也会陷入这些和我关系密切的中国同学一样的思维模式中去。我的很多工科朋友都拿我的专业来取笑我，并且直白地告诉我说这是选错了行。

在大学里的第一个暑假中，我参加了一个在纽约州伊萨卡市（Ithaca）的康奈尔大学举行的中国留学生研讨会。参会人员被安排在伊萨卡市的圣人楼（Sage Hall）中，这里是学校的一个女生宿舍楼。一些学生政治家，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研究生们组织了这些会议，并选举了他们的朋友为研讨会的主持者，还有一人被选为《学生月刊》（*Students' Monthly*）的编辑。大多数参会人员都可以参加研讨会举办的各种活动；还有一些是小规模人员参加的休闲游戏或严肃的政治问题讨论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还在一次用普通话进行的会议上加入了讨论

活动。^①

我在大学里的第二年，也就是 1913 年时，中国爆发了“二次革命”。虽然我对革命者抱有强烈的同情，但是我不能公开参与任何相关的活动，因为我担心如果我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现存政府的不满，我这份由广东省政府支付的助学金就有被收回的风险。我知道当时在美国也有中国民族主义者联盟（Chinese Nationalist League），我虽然支持他们，却从来没有加入他们，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在大学里的第二年，我还加入了纽约国民卫队第五团第一炮兵营。每周我要到一个军队的军火库里学习如何调整和发射炮弹一次，还要学习如何驾驭没有马鞍的马。炮兵并没有固定的训练坐骑，都是训练之前随意挑选一匹马。我不止一次选中了难以驯服的烈马，不过我很享受学会控制它们的过程。

社会学课的内容包括一次探访模范监狱长奥斯本（Osborn）管理的新新监狱（Sing Sing）。他带我们在监狱里各处参观，并告诉我们监狱里有一套完善的自制体系。我们在空间巨大的食堂里

① 在哥伦比亚的时候，我在纽约华人社区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包括许家和李家。许家人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父亲是长老会教堂的牧师，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总共生了五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所有的女儿都嫁给了中国留学生，并且跟随自己的丈夫回到中国生活了。他的长子欧文（Erwin）几年前还是纽约市的总工程师。李家则属于中国浸信会。他们的父亲也是牧师，并且是一位著名的帮会斗争调停者。他的女儿梅布尔（Mabel）是巴纳德学院的学生，非常有天赋，聪慧且进步，后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梅布尔成为我们家一位非常亲密的老朋友，每次来中国都会看望我们，当我的孩子到纽约学习时，她还会帮我辅导他们的学业。

和几百名囚犯一起吃了午饭。社会学课的同学还去听了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的演讲，内容是关于计划生育的。艾玛·戈德曼是一位高壮的红发女子，谈及社会底层群众的悲惨状况和无力养活众多家庭成员的问题时毫不掩饰。我们还旁听了在卡耐基大厅举行的一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之间进行的辩论。布赖恩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曾两次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巴特勒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颇有口才的演讲者。他们之间的这次辩论是两位知识分子伟人之间的宏大论战。巴特勒以其逻辑性见长，而布赖恩则更有说服力。前者反对禁酒令，后者则支持禁酒令。和其他所有辩论会一样，听众们本来就是选边站队的，就算听了辩论也没什么人会被说服改变立场，只有少数保持开放思维的人才能够从中获取对辩题的一些更深刻的看法。在这次辩论中，我从双方都听到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论述，不过我依然秉持儒家观点：“唯酒无量，不及乱。”喝酒有喝酒的用处，这是不可能用法律来禁止的，但是喝酒的量可以靠一个人的自制力来控制。

到了1914年，我和黄兴成了亲密的朋友。他当时住在纽约，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的妻子徐宗汉是广州人，他和第一任妻子生下的儿子黄一欧则是一名运动健将，也是一个好学生，我在他家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晚间时光。

我第一次去唐人街的时候，天气很冷还刮着大风。我把手插在厚重的大衣兜里，走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商店。让我惊讶的是，

店里所有人突然都站了起来，好像准备着要对我发起攻击或把我扔出店外。直到我把手从衣兜里拿出来，他们才松了一口气，但还是把我狠狠数落了一番，并且叮嘱我走进任何商店时都千万不要把手插在兜里。当时美国所有的华人聚居地都在经历帮会争斗。商店里的人都以为我是另一个城市里的人派来射杀他们的枪手。

在我 1915 年离开美国之前，我还去旧金山参观了在那里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所有当时的展览馆现在都已经被拆掉了，只有美术馆至今还伫立在旧金山，让人们能够回想起当时盛会的壮观景象。

第四章 1916 年的中国

1916 年的冬天，我乘坐天洋丸号（*Tenyo Maru*）的二等舱回到了中国。我的旅伴是钟望荣，一个出生在夏威夷的华裔美国人。钟望荣是一位著名的运动员，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棒球队里的明星，毕业于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专业，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东方。他想为中国人民服务，后来也的确将青春献给了这里。

海外华人中，有很多这样无私地关心社会的人，他们想要为建设中国出力，但最终往往是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国家谋生。^①

船到横滨前的三天，我们遭遇了一场台风，直到船驶入港口才停歇。在风暴中，所有舷窗都关紧了，造成了一种幽闭的氛围，连最有经验的水手都晕船了，饭厅里只有几个乘客。作为一个优

① 每当看到那些在美国以政治避难为借口，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民国政要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些无人颂扬的英雄，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也无比高涨起来。罗伯特·菲斯在《中国的纷争》（*The China Tangle*）一书中揭露，这些人在二战时期挪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用于稳定中国货币的美国贷款。

秀的水手，我仍可以在船里到处走动，并正常用餐。船上一些女乘客和几个牧师变得有些歇斯底里。在他们看来，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哭泣着祈求上帝的救赎。

到了上海之后，钟望荣和我虽然对这个大港口丰富的商业、政治和文化活动感到惊奇，但是更被这个中国城市中，包括两个租界里生活着的穷困潦倒的人们所经历的艰难和痛苦所震撼。上海和巴黎一样，剥削着生活于其中的妇女们，因为这里也随处可见妓女的身影。最可悲的景象莫过于这些站街的妓女在两个外国租界的主干道上通宵走来走去，寻找嫖客。连那些裹着“三寸金莲”的女人也不得不在雨雪中不知羞耻地展示着自己，这样才能有钱养家糊口。中国妓女的命运是艰辛坎坷的。中国有句话叫“玩物丧志”，我完全可以加上一句“玩弄毫无希望的女人，丧失的是人的灵魂”。中国政府无视自己的职责，任凭街头混混可耻地剥削这些可怜的妇女。如果一个政府能容忍如此暴行、无视人民温饱，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野蛮堕落、封建落后的社会。

钟望荣和我在上海有不少大学同学，其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荣礼，他在闸北区经营他岳父的一家纺织厂；还有陈耀荣，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在自家船上的杂货店工作。唐荣礼和陈耀荣在各自家里招待了我们，还带我们游览了上海的重要景点。他们两位都是我们的挚友，后来我们在全国各地奔波，每次路过上海，都会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陈耀荣更是极为热心，后来我们在上海身陷困境的时候，他曾多次慷慨解囊帮助我们。

我还顺道去拜访了卢信，我的老朋友和资助者。他此时已经离开了国民党，成为原清政府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和中华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的政治和财务顾问。唐绍仪曾代表清政府与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者进行和平谈判，最终的结果是小皇帝退位。卢信在上海替唐绍仪经营金星人寿保险公司。我去他公司拜访他的那天早上并没有见到他，因为他只有下午才过来上班。公司的业务经理以为我是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富有的海外华人，没准能成为他的一个大客户。于是，他让助理大方地款待了我，请我吃了午餐和晚餐。第二天我见到了卢信，得知经理对我照顾周全，他很满意。而这位经理，尽管没能卖给我保险以赚一笔丰厚的佣金，但关照了老板的一位好朋友，他也感到很高兴。

我到中国的时候，正逢袁世凯推行君主立宪制，登上短命的洪宪帝位。我想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局面和君主立宪派政治力量的第一手消息，于是出发前往北京。我此前从未到过北京，也迫切地想看看这个古都。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二等通票，经沪宁铁路、津浦铁路和京津铁路最终到达北京。火车到达南京之后，我乘渡轮跨过长江，到浦口登上津浦线列车。我在德国制造的二等车厢里坚硬的座椅上睡了一夜，天亮之后又行驶了六个小时，然后在天津火车站转车，上了京津线，前往中国的首都。

一路上，我首先看到的是江苏省肥沃的农田，然后是长江以北贫瘠的土地。火车每到一站，都会有小商贩和农民以极低的价格

格向旅客出售食品——水煮鸡蛋和萝卜都只卖一个铜板。^①

战乱时期农民变成土匪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甚至会拦截火车，所以火车上通常会部署武装警卫。

我乘坐的火车在日落时停在了北京的前门火车站。城墙下巨大的城门和威严的瞭望塔都让我印象深刻。警察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我雇了一辆黄包车前往金鱼胡同和米市大街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火车站旁边是使馆区，四周被围墙围住，有武装警卫在附近巡逻，还有警察看守在门口。我乘坐的黄包车进入了一条与使馆区围墙平行的宽阔街道，到一片空地后拐向了另一个方向。大约 45 分钟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一栋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现代建筑。三层是男子宿舍，二层是教室，一层有办公室、餐厅、会议室、剧场和一个作为公共读书室的大厅。地下室有健身房和其他教室。这个地方无论是在风格、氛围还是文化、社交活动方面都非常美国化。在这里我感觉比较自在，所以就把它选作了我的临时居所。

把行李都放进房间之后，我到楼下的餐厅用餐。服务员说因为很晚了，所以只有“鸡子儿”。我以为“鸡子儿”是指鸡，所以就点了一个。然而当他给我端上来一个煮熟的鸡蛋时，我才意识

^① 铜板是当时中国人的标准货币，一个铜板仅相当于 1/6 美分。有 1 分和 2 分两种铜板同时流通，南京以北多用 2 分的，南京和上海之间则多用 1 分的。人们在市场上用铜板购买蔬菜、肉和鱼；只有商业公司之间采用银圆交易。当时按每天汇率的不同，一个银圆可能相当于 150 ~ 200 个 1 分铜板不等。即便是考虑到货币增值的因素，当时农民阶级挣的钱也只勉强够糊口的。

到自己误会了，于是又多要了几个。在中国，一般都用“鸡蛋”来表达母鸡生的蛋，而北京人则习惯说“鸡子儿”。这是我关于北京话的第一课。几天之后，我专门找了一个“老北京”来教我一些重要的北京方言。

在宿舍里，我遇见了一些檀香山的老朋友，包括以前的邻居、在盐务署 (Salt Gabelle)^① 的黄福以及交通部的程康恩。我们经常管程康恩叫“刚果人”，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很像那个遥远国度的原住民，而且他也非常友善。第二天他带我去附近的东安市场，东安市场是一个大市场，商铺和摊位很多，出售小商品、水果、衣服和杂货。我们在市场里的一家小餐馆吃了饭。北京人闲来无事经常会到这里逛逛，他们会反复光临同一家古董店，为中意的铜器或玉器砍价，直到店主终于接受买家的价格为止，就当这是交个朋友，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买家和卖家都不着急成交，通常是先谈成了朋友，然后才做成了交易。（当然买水果和日用品时这条规则就不适用了。）我在青年会停留的几个月中，经常到市场吃饭，买些葡萄、苹果、梨、大枣等水果。葡萄和京白梨非常好吃，河南来的大枣也很脆嫩，之后环游世界时我都没再吃到过这样好吃的水果了。

我的朋友“刚果人”也带我去大栅栏看京剧。^② 大栅栏是个热闹又高档的购物区，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最好的皮草、中药、文房四宝和日用品。首都的地方戏是全中国最好的，一些老主顾去

① 盐务署是当时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食盐垄断机构。

② 当时的京剧名角包括杨少楼、刘鸿生、姜妙香、梅兰芳、程砚秋和白牡丹。最有名的女演员有刘喜奎和十三旦。

那里主要就是为了听最好的戏。冬天的剧院里没有暖气，地面就是冰冷的土地。听了一晚上的戏之后，我的脚都冻僵了，为了让双腿的血液流通，“刚果人”和我会选择快步走回三英里外的基督教青年会。通常走到半路，我的双脚就能暖和起来，待进到温暖的室内，更是会被一股极其舒适的感觉包裹住。

在传统中国戏剧中，台上没有布景，任凭观众自由想象。舞台上也很少用道具，而是用象征手段代替。比如两张间隔几英尺的桌子，中间搭上一个板子，象征河上的桥；一把椅子后边插上树枝，代表小山和树林。演员在台上走几圈，代表他走上了旅途，如果他手里挥舞着藤条，就代表他骑着马；如果他在舞台中心抬起脚，就代表他跨过了门槛。观众看演员的每一个动作，就知道其中的含义。大多数男演员都画着脸谱。黑脸代表忠诚、正直；红脸代表无情和邪恶；白脸代表奸佞和残忍^①；不画脸谱的则代表学识上的正直和忠诚。

每场演出至少会上演三出戏，情节都是经典的古代故事，而且都是已经反复上演无数次的曲目了，所以哪怕是不识字没读过书的人也能把这些故事烂熟于心。第一出戏通常是武戏悲剧，然后是一出文戏正剧，最后一出则是浪漫的爱情喜剧。在第一出戏里，武将的角色一般是黑脸或红脸，表演伴随着吵闹的锣鼓声，描绘出战场上军队进攻和撤退的情景。第二出戏的主角可能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或是什么大人物，剧情会是他经历审判或者是苦难，

^① 红笔一般代表忠勇使义，此处作者观点有误。——译者

最终苦尽甘来，以此说明生活中德行良知终将战胜奸佞邪恶。第三出戏里的女主角通常会穿上红色的绣花鞋和精致美丽的裙装，在舞台上她们可以不受传统习惯的约束，通过妩媚挑逗的眼神表现待字闺中的少女含羞带怯的万种风情。而男主角的角色则简单易懂得多，不管是采取直白坦率还是温柔委婉的策略，总之在大幕落下之前，他肯定能够抱得美人归。

北京城是由明朝的第二个皇帝建立的，^① 时间是在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这里的街道很宽，有些甚至有美国的四车道高速路那么宽，这种设计的目的在于即使城市被围困，也可以在城中演练军队。这里还有很多宫殿建筑群，里面有湖，被称为“三海”，还有面积可观的庭院，也是极尽宏伟华贵。有些建筑已经对公众开放，包括展示了各种玉器、三足青铜器以及以往朝代的各种餐饮器具的博物馆和作为慈禧太后夏季行宫的颐和园，园中湖滨还有完全用石头建造的石舫。天坛祈年殿也是开放的，它是一座庄严宏伟、简洁朴素的圆形祭塔，里面有柱子作为支撑。以前的帝王每年在这里进行祭祀大典。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资格祭天，各个级别的皇子仅有资格在播种季节来临之前拜祭土地，祈求五谷丰登。

同样对外开放的还有雍和宫，是一座喇嘛庙，里面供奉了上百座面容狰狞的佛像，据说这些神明都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这里还是各种放浪淫荡行为的展览地，年轻的王公贵族结婚前会被送到这里观看那些下流的场面，算是他们人生中关于性爱的第一

^① 明朝，1368 ~ 1644 年。实际是由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建立。——译者

堂课。^①

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是最受时尚群众欢迎的休闲场所之一，那里以园内种植的树龄几百年以上的松柏而闻名。人们可以在树下围着小圆桌品茶聊天，在园中轻松地散步，在各个茶桌前停步和朋友闲聊几句，最后围坐在一起稍事休息，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惬意地度过了。坐在桌前喝茶嗑瓜子的时候，我们还能观察往来的时尚人群或者闲聊一些政治话题直到晚饭时间。周末的时候，我有时会去西山。那里距市中心有大约半日的车程。而工作日里，我通常会去位于城西的琉璃厂逛逛，那里是著名的书画古玩中心。我对画在丝绸卷轴或者扇面上的毛笔工笔画非常感兴趣。我当时还非常喜欢收集绝版的或古旧版本的中文书籍，直到现在这也是我的一大乐事，因为这些书都是用字体较大的木质印版印刷出来的，所以别有一种古老、充满文化气息的美感。^②

北京有一种我在中国其他城市里感受不到的独特氛围，除了仿佛为了适应现代交通而修建的特别宽阔的街道之外，这里还有数不胜数的宽敞民居。最典型的中式房屋是四合院，就是一种带院子的平房集合体，房间的窗子上都糊着纸，所有窗子都朝向院子内部，这样的设计能够给主人创造一个私密、宁静的环境。煤炭在北方的价格不高，到了冬天，人们会用铁炉烧炭取暖，所以房间里通常都很暖和。

① 喇嘛是藏传佛教的僧侣，原是西藏地区的统治阶级，该地区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② 我收藏的精美画作和稀有图书都被留在了上海。

当时北京那些举止有礼的仆人也很有名，他们忠诚、勤劳、诚实。一个好的男仆就像是《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星期五，能做饭、打杂，能服侍主人起居，甚至还能作园丁。这样的仆人通常会一生追随一个家庭，很少有转投别的主人的。所有富裕的家庭都有自己的仆人。在北京生活过的人肯定都梦想回到这里，因为这里的舒适生活确实令人难忘。

这里的警察也很有效率，温和有礼而且诚信可靠。他们维持城市治安的工作做得很成功，这里很少有入室行窃或者其他严重犯罪行为，扒手和持枪抢劫之类更是从来没听说过，在拥挤的市场里或是公共娱乐场所闲逛是完全安全的。也正是因为这里法律完善、治安良好，才使得摊贩们晚上可以出来在街边摆摊，靠一盏煤油灯照明，贩卖古董、家庭用品、衣物和其他五花八门的小商品。

每天清晨，街道都会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白天还会至少洒一次水，防止尘土到处飞扬。洒水的工具是拴在长杆上的竹篮。城市里的用水需求基本上是靠打井取地下水来满足的，所以人们用辘轳拴着竹子编成的密实竹篮从井里打水的景象随处可见。

北京城里没有公共汽车或电车，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骡子拉的车、黄包车和少数汽车。地方士绅们坐的是骡子拉的车，车夫侧身坐在最前面赶车，腿搭在车外，只能乘坐一人的车厢内，乘客要盘腿坐在正中，这样才能防止头撞到车厢的四壁。这种单人乘坐的车通常是用骡子来拉的，而喂养得很壮实，毛色闪亮的骡子也会让主人很有面子。

北京偶尔会遭遇沙尘暴，强劲的北风裹挟着戈壁滩上的沙尘

一路南下。赶上沙尘暴可不是什么美好的经历，所以我总是会随身带着一条围巾，遇到沙尘就把围巾围在脸上。沙尘暴一般会持续几个小时，其间所有商店都会关紧门窗，街上也几乎看不到人，所有的室外活动也都会停止，直到恶劣天气结束后，一切才会又恢复正常。沙尘暴简直比暴风雪还可怕，因为后者至少没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街上经常能看到满族妇女，她们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她们脸上会抹很厚的胭脂水粉，还佩戴着不但高高竖起，而且向两边突出的独特头饰。她们走路时也要小心翼翼地掌握平衡，因为她们穿的鞋样式非常特殊，鞋跟居然是在鞋底中央的。她们都很高，时刻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庄重姿态。作为征服者，她们已经养尊处优地生活了几个世纪，每天就是打打麻将、逛逛集市或者去戏院看戏。这些贵族妇女虽然仪态高贵，但容貌大多乏善可陈，而且还有很多人脸上有麻子。清朝法律规定，满汉之间严禁通婚。满族的风俗是父母为自己的儿子选定一个年长一些的妻子，这样她就能够像个姐姐一样照顾好自己的丈夫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城里还住着一些曾经的太监。这些人看起来精神萎靡，无论样貌还是性情都更像女人。他们之中大部分靠在富有的满族家庭做仆从勉强度日。我父亲家乡同村的一个百万富翁的儿子在北京居住很多年了，他发现我是单身并且暂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之后，就认真地向我提建议，让我找一个太监做仆人，再包养一个女演员做情妇。如果我是一个腰缠万贯、游手好闲的人，那我一定会高兴地接受他的建议，但是我只是对他说，我在

北京不会久居，就不用体验这样的生活方式了。据说中国北方最漂亮的姑娘出自天津附近的一个叫杨柳青的村子以及山西省省会附近的大同。这些姑娘都缠足，所缠之足被称为“三寸金莲”。她们还要学习如何梳妆打扮，以及如何讨好她们未来的丈夫。这完全是一个被男人主宰的世界。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形式的中国还残留着的各种陈规陋习亟待废除。

北京的餐馆也是全中国最好的，一般做的都是鲁菜。东兴楼是达官显贵们最爱光顾的地方，这里的厨子曾经是清朝末代娃娃皇帝的主厨；正阳楼的羊肉做得最好；便宜坊的北京烤鸭是最棒的。小一些的馆子也都有自己的特色，绝对是享乐主义者和美食家的天堂。在北京，如果客人参加一次正式的宴请，他可以只吃自己最喜欢的一道菜，然后就离开前往其他地方举办的下一个宴会。这样的风俗使得人们一个晚上可以参加多个宴会，因为在这里拒绝宴请是很不礼貌的，除非被邀请者是真的身体不适，或者是想要跟邀请者断绝来往。

北京还是中国的教育中心。在这里的高等学府包括由美国庚款基金资助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些学校培养的都是将来要去美国进修的学生。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聚集到这里，在医学院的学者和科学家门下求学。

北京的酒店也很不错，其中最著名的是六国饭店和北京饭店。规模小一些的收费相对便宜。其实各省来京的人都可以免费住在本省在北京建立的会馆里，不过也有很多人不愿意住会馆，因为

有无数的小旅馆可以为他们提供住宿。

外国官员及他们的随员都住在外国使馆区。这片区域里的警察和守卫都是由各国自己的军队负责配置的。海关总税务司也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而中国人则被禁止在这些区域居住。

黄保南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一个同学，现在是财政部的一名官员。在他的介绍下，我在《晚星报》（*Evening Star*）的编辑部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确信这份报纸其实是受财政总长周自齐资助的。这份报纸走的是亲德路线。我的两个同事是 L. S. 吴（L. S. Wu）和陈清文，他们俩都是新加坡人。我经常和陈清文一起在东安市场吃午饭，我们两个主要负责在一盏昏暗的电灯下校对稿件，吴先生负责从其他报纸上搜集内容并剪下来交给我们排版。我们谁都没有做过独立的采访，因为这份报纸满足于转载别家发布过的旧消息。我们也会花钱购买外面的评论文章，通常是由我们从来没在办公室见过的当事方撰写的。陈清文和我都很谨慎，我们从不向吴先生打听这些文章作者的身份。我在这里工作了三个月，主要是为了赚取生活费。最后因为长时间在昏暗灯光下工作，我的视力都变差了，不得不去找眼科医生配了一副眼镜。这段时期的工作经历让我意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媒体存在的。在北京的知识分子读者群体极为有限，没有一家独立的报纸能够靠自己支撑运营。

在北京我有幸结识了蔡廷干将军，他是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联络员。当时他是支持袁世凯的复辟运动的，但是我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他从没有企图说服我加入他的阵营。蔡将军与我同宗同

源，他就是在我父亲的祖先世代生活的那个乡村里长大的。他后来去美国接受教育，师从最好的中国学者，所以他的中文和英文都非常流利。我到总统办公室去拜访他，他不但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出乎我意料地邀请我陪他一起走回家并留下吃晚饭。他们一家住在南池子，家里的家具都是简单的中式风格，有几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书架，全都是没有刷过油漆的。房子正中有一个煤炉，整个房间都靠烧煤取暖。将军的妻子和孩子穿着也很朴素，完全没有一个有权势的高官之家可能会显露出的娇纵之气。晚饭的食物也很简单，但是健康美味。蔡将军有一个不大的藏书室，里面摆满了书。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会抽时间读书。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了三遍。藏书室旁边的房间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硬木棺材，他骄傲地向我展示并且说将来自己死后要躺在这个棺材里下葬。（在中国，富有的老年人在家里或是在殡葬用品店里存放一口棺材是种习俗，为的是确保自己死后能够被体面地安葬。）

那之后我经常到蔡将军家里拜访，并且见到了他的一些朋友，大部分都是海军人员。他们会在一起打麻将，筹码都很小，也就一块钱。然后他们会吃简单的晚餐，比如离开之前吃一碗豆子或杏仁奶酪。将军曾是第二批被送到美国深造的幼童中的一员。他们学成归国后受政府雇佣，每月的工资是四两银子（一两银子约合中国银圆一元四角）。这些归国学子都是从最底层职位做起，政府没有给他们实权，但是会充分利用他们的英语技能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当日本进行封建主义改革时，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归国学子带来的变革并继而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相反，清政府则

满足于维持现状，所以一直压制这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进步人士，最终为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创造了可乘之机。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中，蔡将军损失了一艘鱼雷艇，遭到革职，后来不得不在香港和澳门靠教英语为生。此外，他还在瘟疫爆发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穷困潦倒，在老家的村子里做了一个农民。消沉了几年之后，他才被自己曾经的同学介绍给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从此东山再起。

蔡将军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民主的官员之一。他是老子学派的忠实信奉者，所以也过着简朴自然的生活。他的不足在于过分以自我为中心而抵制进步。他认为所有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主义者都是国家的死敌。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并且成功地为袁世凯谈妥了五国银行团贷款，让袁世凯在与孙逸仙博士的争斗中稳住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外来势力支持袁世凯的托词是，他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是维护中国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①

这一政策带来的悲剧结果就是孙逸仙博士不得不放弃自己在中国建立宪政政府的梦想，转而联合苏联共同抵制西方势力。^②

① 时至今日，还有许多目光短浅的美国人抱有同样的论调，称要维护台湾所谓的强有力的统治者。

②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学生们可以找到一个中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间接原因。近些年来，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们，其中包括学者、思想家和开明人士，不纠结于主义，只是宣扬美国认同的民主。但讽刺的是，西方大国不仅没有支持这些人，还无视这样的声音，一味地将第二个袁世凯——败退台湾的独裁统治者蒋介石美化成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的人。西方大国如果还没有学会不能在亚洲扶植反动统治者的道理，那么他们就会永远受到亚洲人民的反抗。

在北京，会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内容的媒体是由日本人出版的中文日报《顺天时报》和由杰出的陈友仁主编的英文版《北京公报》（*Peking Gazette*）。几年后陈友仁成为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并成功地迫使英国政府将汉口的租界还给了中国人民。陈友仁出生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曾经在英国学习做出庭律师，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但是完全没有接受过中式教育。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他抱有极强的爱国之心，并且放弃了英国国籍，只为回到祖国服务于人民，他为重申人民在过去被殖民主义者们践踏的权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富有建设性贡献的陈友仁也是接受良好教育的海外华人的代表。虽然当时我并没能见到他本人，但是我一直是他文章的热心读者，我真心钦佩他敏捷的智慧和犀利的评论。

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在南方最为活跃，所以我在 1916 年春末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肇庆。在清朝时期，肇庆是两广西江区域的政治中心。当地有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组建的省级军事政府。我在广东省议会时的老朋友杨永泰现在是这里财政部门的领导，他把我介绍给了岑春煊。（我恰巧是唯一一个美国留学归来而自愿加入反袁运动的人。）岑春煊也是一位著名的管理者，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曾护送慈禧太后逃往陕西西安。由他来担任反对袁世凯、维护共和国运动名义上的领袖再合适不过了。岑春煊是个正直、坦率、积极、果决的人。他在政治上一直没能东山再起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支持者，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有活力、有建设性的拯救这个国家的计划。他其实是一个属于

过去的角色，一直不能融入不断变化着的近代中国。

在岑春煊的管理下，我对中国老式行政管理方法有了不少的了解。他坚信传统的行政原则：“皇帝不能做宰相的工作，宰相不能做尚书的工作”，这也是中国关于政治劳动分工的理念。我与岑春煊的关系正是这样的，作为他的外交部门负责人，他授予我很大的自由，我可以按照我认为妥当的方式为他处理许多重要的外交事务，而他从来不会干涉我的工作。在后来的几年行政工作中，我也贯彻了他的教诲，在执行我的一些政策和计划的过程中，把工作交给有能力且忠诚的副手们去做。

支持袁世凯的君主主义者尽了一切努力要将他扶上龙椅，他们甚至伪造了一份刊登支持袁世凯复辟运动报道的《顺天时报》给袁世凯看，而事实上该报是反对君主主义的。袁世凯身边围绕的全是他的长子袁克定率领的宫廷护卫，而后者又一心盼望着父亲登基，将来好由自己继位。恢复帝制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在文武官员、高级将领以及社会各界领袖的请愿之下，袁世凯同意登上皇位。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酝酿着巨大的风暴。云南军事长官唐继尧宣布独立，并发表了讨伐袁世凯的公告。突如其来的反对声浪才让袁世凯意识到拥护他登基的意愿并不如支持者和他儿子所说的那样广泛一致。被阴谋戏耍的袁世凯忧愤成疾，没过几天就去世了。这样的惨败也注定了洪宪帝制的覆灭。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继任总统。

第五章 在香港的商业活动

在中国北方和南方进行了初步的政治考察之后，我确信中国的未来还充满不确定因素，因为这里既没有司法独立，也不能通过合理的法律程序保护人民的权利、自由和财产。虽然建立了民国，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引入宪政和法制。我对这样的中国已经不再抱有幻想，甚至考虑干脆回到美国继续学习法律，因为整个国家都处于军阀割据的动荡不安之中，我也不想再在政治游戏中碰运气了。最终我决定暂时放弃中国一段时间，到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香港去做点生意。因为处于英国占领之下，香港有自己独立的司法和执法体系。因此，很多富有的内地人和政治难民在逃离或是被驱逐之后，都选择了此处作为自己的永久居住地。

香港那时是一个有深港的繁忙口岸，街道狭窄，也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1917年秋天，我的朋友陈天斗说服我和其他几个人一起筹建工商银行有限公司——第一个由归国学子在香港建立的金融企业。陈天斗也来自檀香山，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民国元年（1912）

时曾担任广州市政工程理事长，后来在香港的广州银行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娶了一位非常富有的香港妻子，于是野心勃勃地想要在这里组建一家中国的银行。袁世凯倒台后我又去了一趟北京，并在那里遇到了陈天斗。我们聊到了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失望，但是他说服我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于是我转而投入银行业。

我成功地说服了我的朋友刘惠民入股，他毕业于纽约大学，认购了 2 万美元的股份，我自己也认购了 5000 美元，这样就凑够了我承诺认购的数额。陈天斗自己认购了 7000 美元，他在香港的其他朋友们则认购了剩余的 23000 美元。^①

薛仙舟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后来又去德国留学。民国元年时曾担任中国银行的代理行长。鉴于他在银行业界的声誉，而且又是陈天斗的朋友，所以他也被邀请加入了我们，然后他又推荐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陈公衡作为我们银行的经理。陈公衡曾经是中国银行满洲营口支行的经理。^②

① 其他集资者还包括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蔡慕贞、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的陈耀荣和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孙科。他们共出资 10 万港币，满足了我作为发起人需要筹集到的资金数额。

② 薛仙舟还推荐了美国留学归来的林天木和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王最古（Wang Tsui-ku，音译）。银行开业后，我的其他朋友也加入了银行的管理层，包括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黎耀生和毕业于哥伦比亚工程学院的陈伯庄。黎耀生做过一段时间的香港分行经理，陈伯庄后来成为汉口分行的经理。黎耀生后来担任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职务，先后做过铁道部副部长、广九铁路公司总经理和国立交通大学校长。陈伯庄后来也担任了许多职务，比如铁道部工程处处长、沪宁铁路公司执行董事。陈天斗在陈济棠将军主政时卷入了广东省的政治斗争，在香港被暗杀。薛仙舟很多年前已经去世。我在沪宁铁路和招商局工作期间，陈伯庄一直是我重要的同事之一。

因为这些归国学子的参与，工商银行有限公司也被称为“归国学子银行”。我是银行的董事及副董事长，在陈天斗因故休假的几个月里也曾经任银行的代理董事长。

在组建银行的几个月里，我和陈天斗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爬上太平山顶，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银行的计划和面临的问题。在山顶上，我们可以看到九龙的灯光，还有海湾对面的新界以及山下的万家灯火。我们还能听到西角饭馆里的中国音乐，那里是夜生活的中心地带，也是妓女们的营业场所。

我们把重要的生意和社交晚宴都安排在餐馆里进行。因为那里有美味的食物。中国的晚餐在晚上 11 点开始，会一直延续到午夜之后，而客人们回到家中大概就是 2 点多钟了。晚间活动通常是 8 点钟开始，晚餐前人们会先打几圈麻将或是扑克，如果觉得饿了可以先点一碗面条或其他简单的食物垫垫。同时还有歌女在旁边唱歌并弹奏古筝等助兴。

我对香港的这些社交生活并不怎么感兴趣，我也很少去俱乐部什么的，因为我也不喜欢打麻将或扑克，不过偶尔我会去那里和俱乐部的会员们一起参加午宴或晚宴。^①

① 当时我和胡家、张家、杨家、陈家熟识。胡惠德博士的母亲和姐姐曾经在他还在英国学习医学的时候在家里为归国学子举行聚会。张心湖一家曾邀请我们到劳勃生路的花园球场里和他家的儿子、侄子们一起打羽毛球，他们也都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杨瑞枝毕业于纽约大学，他的妻子经常请我们到她位于干德道的家中做客。陈家也来自檀香山。陈芳是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甘蔗种植园的建立者和所有者。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生了几个儿子和女儿。其中一个儿子陈席儒（Tony）陪父亲一起回到了中国并在这里安家。陈炯明将（转下页注）

我第一次在香港停留的这段时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口都要受到管制，只有获得许可证的货物才能被运出去。商界和金融界也是一片混乱，港币甚至出现了溢价，1港币约合98美分。很多当时投资购买美元的香港人都赚了大钱。

我们的第一家银行开业时，商界对于我们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以及能否有生意可做都抱有怀疑的态度。我努力说服了亲戚朋友们来投资，凑够了香港银行许可经营规定的法定最低实付资本，然后我们又想办法从香港和菲律宾的其他小投资者手中获得了一些认购。我在广东省议会里的老朋友李思轅此时是马尼拉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当我们筹建银行的时候，我说服他也成为发起人和股东。我去马尼拉的时候，他就是我与当地华人群体的联络员。^①

在马尼拉我还遇到了C. C. 李 (C. C. Li)。他是当地的伐木业巨头，他希望我留在岛上帮助他们在当地建立起一家中国银行。我对这个提议不是没有动心，甚至打算放弃香港的公司留在这里，

(接上页注①)军成为广东地区独裁统治者时期，陈席儒就任过广东省的省长。陈席儒曾就读于耶鲁大学，他的儿子陈永善也追随了父亲的足迹。永善是个聪明的学生，同时也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我在美国时和他并不相熟，后来在香港的时候和他成为朋友。他坚持要我每隔一天陪他去西角吃一次晚饭，并邀请我到他家留宿。我和他的父亲也很熟，并经常和他的父亲一起吃早饭，还能吃到他家在澳门附近的农场里种的葡萄。后来永善成为广州军工厂厂长，但不幸被政敌暗杀。

① 我最后一次听到李思轅的消息是说他在新加坡。

可是当地炎热的气候却让我水土不服甚至生病。^①

在菲律宾的中国人大多是福建人，少数几个是广东人。他们控制着岛上的大部分零售业，很多人都成了百万富翁。尽管他们还保留着很多来自他们中国家乡小村庄的习惯和思维方式，但是他们都已经变成了精明能干的商人了。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后人现在仍然居住在这里并且成为知识和政治活动中的活跃分子。那时菲律宾还处于美国的统治之下，当地人对居住在那里的华人也没有任何歧视。^②

从菲律宾回到香港之后，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发展银行业务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阻碍，我们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过程。按照中国的传统，一个人完成学业后就该马上结婚而不是去忙事业。我们银行的竞争对手们总是嘲讽地暗示说因为我是单身汉，所以每天晚上会把银行的钱都带回宿舍，第二天早上上班再带回来。起初由于我们不了解英国银行的运营管理，委托我们出具的很多支票和汇票都被当地银行退回了，原因或是背书不规范，或是没有遵守英国银行的通行做法。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

① C. C. 李后来成立了马尼拉最大的一家中国银行，并且终身任董事长一职。我的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施宗树博士协助建立了这家银行，不过他本人几年前也已经去世了。

② 现在菲律宾政府已经通过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中国人不得参与零售贸易，而且在菲律宾出生的中国婴儿也不能自动获得菲律宾国籍，而是要等到年满 21 周岁时才可以提交归化入籍申请。这些“二等公民”也没有受到台湾当局或联合国的任何政治保护。如果这些歧视性法律不能在近期废除，这些人必然会转向中国大陆政府寻求保护。

张支票正面两条双横线中间写有“& CO.”的标记，就表示这张支票是一张“划线支票”，必须通过银行才能兑现；如果双横线中间写的是某个银行的名字，则说明只有这个特定的银行才能兑现这张支票。为了了解这些规则，我仔细研究了英国的银行法，并且认真通读了《格兰特银行法》（*Grant's Laws on Banking*），以保证我们的银行时刻了解英国银行的经营做法。

在小银行中工作的人只有掌握多方面的技能才能应付各个部门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管理账簿。我从来没有为此而后悔过，尽管这项工作烦琐而乏味，但做会计的经历教会我对待数字要极其认真，我每天都会耐心地全面检查我自己的工作。^① 由于每天在银行里我还要担负各种其他的职责，我越发意识到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念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人的心志总是容易被琐碎和机械的工作消磨掉。

对于我们的银行业务来说，最为关键的阶段就是吸引存款，没有人来存款，银行就无法用别人的钱来赚钱。通过对存款情况的调查，我发现只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设立了存款部门。当时我们让自己的律师先去确认有没有任何限制其他银行开设存款部门的法律规定，确认没有之后，我们就马上着手组织开设了这项服务。

^① 有一次我到汉口的分行检查，发现会计部门正为账目上的余额出入而惊慌失措。我向主管会计询问了情况，得知他们只是反复核对各项总额，所以并不能发现错误出在哪里，于是我要求他们把每一笔总额的计算过程都重新检查一遍，很快就找到了问题所在。

在吸收存款这件事上我们可谓是奋勇争先的一家，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追着潜在储户请他们来存钱的地步。我们广泛散发各种存款的宣传材料，甚至将其直接塞进住户的门缝里。起初，有一些富人家的佣人们来我们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账户，后来是孩子们，最后劳动者们也陆续都来存钱了。在那个年代，穷人们是怕进银行的，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专为富人们建立的机构。除此之外，香港的银行受各种繁文缛节的限制，要兑现一张支票或是汇票得花费几个钟头的时间。结果就是，社会中的穷人们只能把自己攒的钱寄放在可靠的朋友家或是商行里，又或者藏在家里不为人知的隐秘地点以保其安全。那些聪明一点的则会用这些钱来放高利贷或是借给自己圈子里的人。

吸收了足够的存款之后，我们银行的基础也坚实了不少，还在上海、汉口和天津开设了分行。我多次去汉口和上海出差，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些分行吸收更多的资金，以及争取更多归国学子和他们的朋友们对我们银行的热情支持。^① 第一家分行开业后，陈伯庄成为经理。我随后前往汉口出差的主要目的也是检查以及帮助促进那里的业务。

在蔡廷干将军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詹天佑博士。詹博士在汉口很有威望和影响力，当其他的归国学子听说詹博士对我们的银

^① 我最初去汉口是为了鼓动那里有实力的广州人群体为银行投资，这个群体的领袖就是詹天佑，他是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也是中国最伟大的铁路建造者之一。他一个人就认购了银行5万美元的股份。另外外交部代办吴仲贤、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广州买办、渣打银行和茶叶出口公司也都认购了股份。

行感兴趣时，也就都一致支持我们的银行了。^①

我在汉口待了几个月，一方面吸引资金，一方面组建分行。工作之余，我还参加了许多宴会，并在汉口和附近的大城市里游览了一番，包括湖北的省会武昌和工业中心汉阳。这三个城市是中国中部的交通集散中心。^② 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都以汉口为终点，而从上海和深圳来的船只也要在这里停泊。外国势力在汉口很强大，英国、法国、日本和德国在这里都有租界，分享着他们在中国的特权；不过如同在中国其他城市中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汉口的外国势力也开始归还他们的特权。黄鹤楼就在武昌，它本是一座建在山顶的要塞，现在成了著名的风景名胜。人们喜欢在这上面喝茶、算命。武昌和汉口中间隔着长江，汉阳和

① 这个兄弟会中最有名望的成员包括矿业工程师王宠佑博士、律师张履鳌、铁路工程师颜德庆、汉阳铁厂厂长 K. Z. T. 吴 (K. Z. T. Wu)、火药厂厂长刘庆恩、汉口海关监督吴仲贤。另外一个归国学子群体则组建了隆昌有限公司 (Loong Chong Co., 音译)，这是一家建筑和工程公司。这些人包括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蔡国祖、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孟越春 (Mon Yuen - chung, 音译)、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卓唐成和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郭科继 (Goh Ka Ghee, 音译)。这些归国学子彼此都是要好的朋友，而且曾经每周都到原德国租界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或是举行其他形式的聚会。

② 汉口、武昌和汉阳在历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要地，也是蜀国的刘备和吴国的孙权争夺的重点。当时武昌是吴国的首都，孙权为了阻止刘备回蜀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不过最后正是他的妹妹帮助刘备逃回了蜀国。汉阳还有二乔的墓碑，二乔是三国时期一对著名的美女姐妹。姐姐嫁给了孙权，妹妹嫁给了周瑜，周瑜是孙权手下的大将。据记载，当时掌控北方的逆臣曹操曾说等到自己打败吴国以后，就要把二乔关到铜雀台作自己的玩物。汉阳还有孙权最主要的谋臣鲁肃的墓碑。

汉口之间则隔着襄河，襄河是汉水的一段。河上有在两岸之间定时往来的蒸汽船为这几个城市中的居民提供摆渡服务，而到了市内，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黄包车和轿子。有个流行的说法是这几个地方的本地人都不太好打交道，即“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不过我觉得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人并没有多大区别。

詹天佑博士也是如此。多亏了他的大力支持，汉口分行顺利开业了。他为人传统，秉承了简朴保守的生活作风，在并没有介绍他女儿给我认识的情况下，就委托蔡廷干将军撮合我与他女儿共结连理。由于我根本没见过他的女儿，我被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后只好跟将军说我还没有供养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妻子的能力。

1918年我再一次去汉口检查分行状况的时候，遇到了将要成为我妻子的姑娘。当时有一位我之前并没见过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的黄日新要与郑秀兰小姐结婚。婚礼计划于晚间时分在一座现代教堂举行，新娘要穿戴白色的婚纱和面纱，男士们则必须要穿燕尾服。由于我是当时少有的拥有燕尾服的年轻人，并且恰巧将其带在出差的行李中，一个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就将我介绍给了黄日新，我也接受了他让我做伴郎的请求。这次帮忙的回报大大超出意料，我就是在这次婚礼上见到吴佩珍小姐的，她是新娘的外甥女，也是伴娘之一。

那时，我们的银行还成为一个对银行业感兴趣的归国学子的训练营，许多后来中国最著名的银行家最初回到中国寻找工作时，都曾在我们银行的各部门工作过。董事会中的一些成员后来也都

身居要职，其中之一就是孙科，也就是孙逸仙博士的儿子。孙科先后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做过广州市市长、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立法院院长和行政院院长。我在香港的工商银行工作期间，经常与孙科一起去澳门；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去拜访了他的母亲，也就是孙逸仙博士的第一任妻子，一位真诚而热情的基督教徒。她和我母亲还是亲戚，都来自离我父亲居住的上栅村不远的外坡村。因为和我母亲是同姓的堂姐妹，所以老夫人对我自然多了一份母爱般的关怀，并且说服我加入基督教浸信会。于是在1918年初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孙科夫妇、孙科的妹妹和我一起澳门滩接受了加拿大牧师约翰·L. 加洛韦（John L. Galloway）的洗礼。^①

孙科和我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所以当1919年他被邀请前往广州组建现代市政厅的时候，坚持要我和他一同前往并负责市政厅的财政工作。^②

我接受了孙科的邀请后就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因为我实在找

① 加洛韦博士和他的妻子后来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他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了，那之后我便再没听到他的音信。

② 对于我而言，我很难拒绝他请我帮忙的要求，这是政治冒险，也是他第一次在陈炯明手下工作。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又是亲戚，从小一起在檀香山长大，后来又一起在纽约上大学。我和孙科一起去广州之前，我总是到孙逸仙在莫利哀路的住处去拜访他，跟他一起探讨中国及世界的重大问题。孙先生身边有两名忠诚的保镖，有访客前来拜访时，他们会先打开小窗查看来者的身份。房子的面积不大，家具也很简单。我虽然没能为他筹集多少革命资金，但是会经常向他讲述我对中国社会重建的看法。

不出恰当的理由回应他直白的评论：既然我过去曾自愿辅佐过其他政治家，为什么现在反而要拒绝同他一起为建设这个有意义的政府而合作呢？^①

① 我知道在薛仙舟董事长的带领下，银行的管理必将走向失败，因为他过于学术化，并没有作为真正的银行家的资质和强有力的管理能力，将来肯定要产生呆坏账。几年之后，他批给王宠惠兄弟的扬子电气公司的大额贷款把银行拖入了不得不关闭汉口分行的境地。第一次革命胜利之后，薛仙舟曾经被短期任命为中国银行代理行长，但是他并没有职务所需的金融工作实际经验。他被认为是银行业的好学生，也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长期担任金融学教授。尽管如此，他的学识并没能为他提供在商场上的实干经验。

第六章 我的婚姻和家庭

我第一次见到吴佩珍小姐是在婚礼前一天黄日新举办的一个非正式晚宴上。她穿着一身当时女学生们的惯常装束，短上衣和长裙，发型也是经典的优雅样式，全部向后束起并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她坐在长桌的末端，安静地听着人们的对话。我马上就被她的美貌、魅力以及甜美温柔的性情吸引住了。为了和她说上话，我邀请她和我为了主人而干杯，她红着脸微笑着答应了。

在婚礼宴席上，新郎的许多年轻朋友都来灌他喝酒，我兴致高昂地帮他挡了不少。我完全是有意这么做的，为的是吸引佩珍的注意力，我想我那时已经彻底爱上她了。当天晚上，我跟和我一起住在青年会的朋友 Q. L. 杨（Q. L. Yang）说，吴小姐是婚礼宴会上除了新娘之外最美丽的女人。杨把我的话转告给了另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又把这话告诉了新娘。新娘是位极有洞察力的女士，马上就猜到我已经爱上了她的外甥女。她觉得虽然我们两人有十岁的年龄差距，但是会很般配的一对。所以在我还不知情的时候，新娘就已经去向佩珍的家里人推荐我作为他们女儿的理想丈夫人选了。（佩珍

的姨妈居住在汉口，那一年里，我总共去了汉口不下六次，每次还要经过上海，佩珍一家居住在上海，不过直到我最后一次去汉口，才终于由一个朋友正式介绍给佩珍的家人。)

那次拜访中，我看到了佩珍平时居家生活的样子。她穿着简单的服装，没有化妆，也没有佩戴任何首饰。她的父亲吴惠甫是一位亲切和蔼、受过良好教育的长者，脸上挂着让人觉得容易接近的笑容。他的父亲是在东南亚生活的广州人，他本人在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工作，还是本地广州商人俱乐部的成员，经常参与俱乐部的活动。他本来信奉儒家学说，后来娶了一位基督徒妻子，也就是我未来妻子的继母。他们都是中国浸信会教堂的活跃教徒。继母是一位旧社会的圆滑老练的夫人，她在客厅里亲切地接待了我。佩珍的亲生母亲在她 12 岁时就去世了，那时起她就如姐如母地照顾着自己年幼的弟弟，此时她的弟弟也已经长成了一个 12 岁的好孩子了。我留在她家吃了晚饭，佩珍话不多，但对我总是保持微笑。

当天晚上我回到青年会，介绍我去佩珍家的朋友陪我进行了一次长长的散步。他说吴家愿意把他们的宝贝女儿嫁给我做妻子。我一直没敢太向佩珍献殷勤的原因就是想等对方先释出一些积极的回应。此时听了朋友的话之后，我美滋滋地接受了这份好运并且立即开始着手赢取美人的芳心。三天之后，她答应了我的求婚。

在举行了非正式的订婚宴之后，佩珍的一些年轻的亲戚陪我们到郊外的百松园游玩。这里本来是一片私人领地，现在已经对公众开放。我和佩珍两人单独乘坐一辆马车，她纤细的肩膀上披着一条红色的披肩。我至今还记得她坐在我身边用非常严肃的口

吻和我讲述我们结为夫妻的意义的样子。虽然那时她才只有 18 岁，但是她的思想比我以为的要成熟得多。我对她说的每句话都表示认可，因为我并不只是出于一时的热情，而是真心实意地爱着她。

我订婚的消息让我那些住在上海的以归国学子为主的老朋友大为吃惊，因为我一直是个众人皆知的单身汉，每次我到上海，他们都会热情地招待我这个孤家寡人。所以此时好多人都抱怨说我结了婚，他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躲开老婆出来和我享受一个愉快的朋友之间的夜晚了。

我在上海待了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和佩珍一直待到晚上。一个月之后我不得不返回香港之时，我们已经如胶似漆，我甚至提议两人私奔。但是她从小接受的良好教育不允许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临行前她送给我一本圣经，叮嘱我要诵读，并祈请我们在天上的父代她照顾好我。佩珍一直非常虔诚，也正是因为如此，她在我们婚后能够一直支持我，并与我共同分担那些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我回到香港后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了结我在银行的事务，其间每天都会给佩珍写中文情书。遗憾的是这些情书以及其他我离家时与她往来的书信在最后一次战争中都遗失了。工作完成后我回到了上海，并于 1920 年 10 月 9 日与佩珍正式完婚。^①

① 我们是在广州浸信会教堂结婚的，由牧师 R·T·布赖恩（R. T. Bryan）主持了仪式。牧师的妻子是佩珍的老师兼好朋友。之后我们在大东饭店举办了庆祝宴会，一直持续到破晓才结束。男宾客们甚至不肯让伴娘们离席。一方面，他们想要像大学时一样热烈地庆祝，因为我是同学之中最后一个结婚的单身汉；另一方面，这样的婚礼庆祝也是符合中国传统的。

婚后我们去杭州度蜜月。虽然佩珍身体瘦弱，我们还是走遍了西湖周边山上所有的寺庙景点。我们会在古松之间停下歇息。佩珍很讨厌虫子，每次看见了就停下不肯走，这时候我会不顾她微弱的抗议抱起她走一段，以免让她踩到虫子。那时的我们多么快乐，可是不到年底，我们就被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动荡之中。

辞去了香港工商银行副董事长和代理董事长的职务之后，我带着佩珍于 1920 年 11 月经香港回到广州与孙科会合。我们乘坐的是中国的 S. S. 中国号轮船，当时船上还有多位显赫的南方政治人物，也是要乘船前往广州组建临时政府对抗北方各路军阀的。这些人包括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逸仙博士、代表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家伍廷芳以及广东政府前行政长官胡汉民等。

在船上的餐厅里，这些大人物们一起围坐在中间的一张长桌边，而我和我的妻子则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被打扰；另一方面，虽然我和孙逸仙博士、唐绍仪、胡汉民都是熟人，但我也并不想莽撞地去和他们攀谈。饭后，我们很惊讶地发现孙先生离开了自己的朋友向我们走来，并坐在了我们的小桌子旁。于是我们突然变成了餐厅中受瞩目的焦点。孙先生莅临我们的餐桌对我妻子而言是种荣幸，作为一位年仅 19 岁的新婚少妇，她优雅得体地接待了尊贵的客人，并没有因为意外地遇到前任总统而表现得过于兴奋。她不愧是一位天生的淑女。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广州就像是有一段延长了的蜜月，除

了一些工作上不顺心的经历之外，佩珍对这趟广州之行格外满意。尽管她是在这里出生的，但是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上海生活了。在这里停留的六个月里，我们逛遍了所有重要的风景名胜，吃遍了所有美味的餐馆。我们之间的感情仍然如胶似漆，所以到哪里都是手挽着手——这样的举动在 50 年前可是会被路人指指点点的。人们一直盯着我们看，不过我却觉得很骄傲，谁不愿意看美女呢？

当时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处于敌对的状态，北方由徐世昌总统领导，并受到北方各路军阀的支持。1921 年 5 月，孙逸仙在南方成立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辅佐他的有唐绍仪、伍廷芳博士、温宗尧，同时他还受到滇系军阀领导人唐继尧将军、粤军领导人陈炯明将军和桂系军阀领导人陆荣廷的支持。那时真正掌握中国权力的人是各路军阀，而政府领导人则只是有名无实的领袖。陈炯明将军刚刚率领粤军从福建漳州南下攻克广州，于是他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邀请孙科在广州组建一个现代化的市政厅，我被任命为财政局局长，陈伯庄被任命为副局长。^①

① 其他主要的局长包括日本留学归来的许崇清；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的程天固，负责教育；魏邦平，负责警务，他也曾经留学日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胡宣明博士；法国留学的黄垣。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这个城市的组织法，以及寻找适合的人选填补财政、警务、教育、公共设施和市政工程等各部门中的重要空缺。我引荐了我在哥伦比亚的老同学，也是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同事陈永善做副局长；还有在广东省议会时的同事陈仲山做秘书处处长；还有美籍华人杨永堂做调研处处长，因为他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工程师；此外还有财会专家区兆庆做财会处处长。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基本上是市政府本来的雇员。

我们部门负责收税，包括地方税、向“红灯区”收的“花捐”以及市属财产税。每年从妓女身上收的税款就能达到 60 万元之多。这样的税制继承自旧政府，我们无法废除它，因为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替代方式解决政府的财政需求。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进税收方式并增加城市的财政收入。“花捐”被承包给出价最高的竞价者。陈炯明主张禁止吸食鸦片和赌博，所以这些地方都收不到税。等财政局正式组建完成并开始正常运转之后，我发现市里一些公共土地被国民党的一些高官们偷偷卖了出去。我于是下令逮捕这些人员并且成功地把其中一些人关进了监狱。这种严格执法的强势作风使国民党在城里的组织将我视为眼中钉，甚至扬言要了我的命，这些人大部分是国民党党员。自此之后，虽然轻微的贿赂案件仍时有发生，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再发现任何严重的丑闻。在严格的监督下，我们设法解决了腐败的问题。不过孙科建议我应该随身带把手枪或是安排带武器的保镖全天候保护我的安全。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且开始带枪防身。有一天下午 5 点，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有一群面露凶光的恶徒朝我走来，领头的口中还喊着他们饶不了我。他们已经走到了距我不过 10 英尺远的地方，我站在原地没动，保持着镇静并掏出了手枪。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干，一对一还是一起上。让我惊讶的是领头的人改变了主意，带着那一群流氓散去了，不过直到走出我的射程，他们才放弃狠狠地盯着我手里的枪。上帝保佑我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还让我的敌人大失颜面。之后，这些无法无天的国民党成员改变了策略，开始骚扰我的妻子，趁我去

上班的时候朝我家窗户上扔石头。孙科对此也无能为力，他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存在的黑社会因素，而警察部门则是由一个保守、不受政府控制的军人魏邦平管理的，他从来不参加我们任何的市政会议。

那段时间广州的政治可谓复杂，甚至说得上是混乱不堪，因为广东省政府和南方临时政府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同时对这个城市行使行政管理权。孙逸仙和陈炯明在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陈炯明主张各省自治，而孙逸仙博士则坚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过陈炯明确实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而且知人善任。在他统治广东的时间里，广州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平稳和繁荣，而且人们也普遍支持他的统治。在这场争议中，我选择支持孙逸仙，而我的老朋友陈伯庄则加入了陈炯明的阵营，并且成为他在北京的代表。尽管政见不一，但我们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①

受够了这些层出不穷的状况，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财政局。为了避免和孙科闹僵，我并没有立即正式离职，而是先让我的副局长代理我的位置，好让孙科有时间寻找继任者，而财政局也不至于无人主事。当行政工作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谁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时，还谈什么保护公众的利益？

1921年我们一家回到了上海，并且在白保罗路安顿了下来。

^① 在武汉政府中，我又设法让孙科说服当时在铁路规划局工作的陈伯庄重新加入了我们的阵线。这就是政治。

除了我们的大女儿坤仪以外，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在这栋房子里出生的。^① 我的老朋友卢信此时还在为唐绍仪主管金星人寿保险公司，他邀请我作为专家顾问研究一下他的公司如何扩大生意。这个公司现在的日常开支太大，所以我建议他削减公司总部的开支，转而在全国各地增开尽可能多的分支机构。卢信想请我做总经理，但是我没有接受这个邀请，因为我知道他的下属们都不会同意降低自己的工资和公费支出的要求。最后我同意做他的顾问，只在

① 坤仪 (Catherine) 是在我们回上海不久后出生的，主治医师是在英国学习受训的牛惠霖医生。因为我的妻子奶水不足，我们尝试用牛奶喂养坤仪。当时我们严格遵照一本名为《如何照顾和喂养婴儿》(How to Care for and Feed Babies) 的指南准备牛奶定时喂她。但是让我们发愁的是她还是经常会哭闹。我曾经用表演歌剧场景的办法哄她睡觉。老一辈的亲戚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孩子这是饿了，但是我们从不把他们的话当回事，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按照科学的方法喂养婴儿。直到几年前人们才发现定时喂奶不过是 20 世纪 20 年代流行一时的风潮，所以坤仪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一定经常在挨饿。

在有了照顾坤仪的经验之后，我妻子觉得应该按照上海人的习惯给我们的二女儿文仪 (Elsie) 请一个乳母。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年轻、健康、好脾气的乳母来喂养文仪，文仪被喂养得白白胖胖的，我们都笑称她为“胖福娃”。不过断奶之后没多久她就得了百日咳，体重也降了好多，那之后几年，她的健康状况一直让我们很担心。

我们的三女儿 (Beatrice) 比文仪小一岁，但是她不幸夭折了。由于照顾她的乳母的疏忽，她得了感冒，然后又感染了肺炎。在那个年代，肺炎是致命的疾病，尤其对于婴儿来说。之后她被安葬在了上海闸北区北部的浸信会公墓里。

这场悲剧发生三年之后，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守仁 (Daniel) 出生于 1926 年 5 月 29 日。他是由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妻子波尔克 (Polk) 接生的。我的妻子用母乳喂养守仁，奶水不足的时候再补充一些奶粉。我的妻子对守仁的照料无微不至，最初 2 年内，守仁都是由她亲自照顾，两岁之后才由女仆来照顾到五岁。他的姐姐们也是如此。

每天下午才到公司去。

卢信和他的助手们其实还是要参与中国的政治。当时的议会议长吴敬立（Wu Ching - li，音译），还有交通系的智囊郑绍国（Cheng Shao - kuo，音译）都经常到他的办公室来集会，为推翻控制北方的军阀吴佩孚而交换意见、制定计划。

1922年卢信担任黎元洪总统领导的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到首都去在他的部门里面做秘书。我离开上海和他一起去北京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又被他委派回上海筹建中国的第一个商标局，地点就设在新中福大楼。因为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签订过相关条约，所以外国公民的商标和著作权必须到我们的商标局重新注册，否则就不能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我在商标局工作了半年，之后因为卢信离开了农商部，他的继任者就指定新的人选接替了我。

北京政府原本有一套良好的公务员系统，一个部门如果更换了最高长官，部门里的官员和副手们仍然可以留任，继续为公众服务。可是当南方政府掌握了政府的控制权之后，这个优良的系统就被废止了，行政管理变成了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一旦最高长官更换，整个部门的官员都要一并撤换。老政府中还有一种礼貌谦和的气氛，所有官员之间都很友善，上级对下级也很和蔼，如果是一个短暂的汇报或交谈，而办公室里又恰巧没有空余的椅子时，上级甚至会一直站着与下属交谈或是听取他们的汇报。

卢信是1923年从农商部辞职的，我追随他重新回到了金星

人寿保险公司，在那里又工作了一年。虽然卢信经常不在，但是他对这个公司的控制力还保留着。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不设法削减总部的开支，恐怕公司很快就要面临灾难。我们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建议他放弃这个公司，把所有的一切都交还给唐绍仪。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我们一起彻底离开了这家公司。^①

我在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那段时间，我们一家的生活相对悠闲，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参加我家附近的广州浸信会的活动，我和我妻子都是浸信会的成员。^②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会和坤仪、文仪一起度过美好的晚间时光，她们都喜欢站在钢琴旁唱歌，这架钢琴是我为佩珍从德国买来的。如果晚上有朋友来访，我的女儿

① 几年之后，卢信成为曹锟总统的司法总长，但是这次我没有再加入他。他娶了朱启铃的一个堂姐妹，朱启铃曾经是袁世凯的内务总长。他的母亲和姐妹都是基督徒，和他一起在上海生活。卢信离开司法部之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当时我还在铁道部工作，他的遗孀曾来向我咨询如何处理一些复杂的家族事务。卢信的一个儿子去美国接受了教育，但是后来不幸在上海的一次政治混战中被杀。那之后我就与他的家庭失去了联系。“十年之间一个家庭会遇到诸多变故”，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我的老朋友卢信一家。作为个人来说，卢信在革命中及后革命时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为他挚爱的这片土地做出的贡献必将被人们铭记。

② 我经常在教堂的场地上和其他教友一起打网球，其中包括设计了所有基督教青年会建筑及其他许多中国建筑的建筑师李锦沛。我帮助南方浸信会布道团的罗丝·马洛（Rose Marlowe）女士管理教堂附属的崇德女中，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执行秘书长李耀邦当时兼任学校校长。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我对这一机构的关注则是到日本侵略者1937年占领上海之后才被迫停止的。我们曾经聘请R·T·布赖恩夫人和玛丽·莱恩（Mary Lyne）女士担任音乐和英文老师，还聘请中国学者担任中文老师。这所学校的毕业生遍及中美，我的两个女儿就是在那里上的小学。

们会为他们演唱她们母亲教会她们的中国民歌和赞美诗。^①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我的家庭成员也越来越多。当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我的弟媳玛丽（Mary）带着我的父母和她自己的

① 作为长女，坤仪一直扮演着好姐姐的角色。她总是整洁干净，而且要求文仪听她的话。她意志坚强却唯独很怕疼。我家里一直把她小时候第一次去看牙医的故事当笑话讲。医生给她拔牙的时候，虽然她母亲和护士两人按着她，她还是拼命挣扎，以至于混乱中一颗好牙反而被拔了下来。

文仪身材比较娇小，却是个勇敢的小姑娘。她喜欢动物，曾经在公园里抓过蚂蚱和青蛙。她总是陪在她祖父的身边，到五六岁的时候还和祖父睡同一个房间。她从祖父身上不但继承了早起的习惯，还继承了他的人生观。那时冬天，她也会和祖父一起到室外放鞭炮，而她的姐姐和妈妈则躲在关紧的窗子后面观看。

守仁还小的时候，我又一次开始了活跃的政治生活。我不在家的时间很多，他3岁的时候，我和他妈妈一起出国了一年多，对他的照顾完全是由保姆在我妻子继母的监督下完成的。后来他跟我们说，当我们回国时，他都不知道我们是他的父母。他是个活泼的小男孩儿，喜欢动物，也喜欢制作东西，而且受到全家的宠爱，想要什么都可以。

孩子们的教育都是由我亲自指导的，他们不但要去上学，课余及暑假里还有家庭教师授课作为补充。当他们上了中学之后，我引导他们读好书，并且每周分别和他们探讨感兴趣的话题。在这样的闲谈时刻里，我鼓励孩子问我问题，如果我不知道答案，我也会直白地告诉他们，并承诺会帮助他们去寻找答案。我的两个女儿都从家庭教师那里接受了良好的中国文化教育。坤仪毕业于纽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她曾经和丈夫谢富成（Francis Tse）一起住在辛辛那提，她的丈夫是俄亥俄大学自动化教授。坤仪1969年去世。

文仪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她和丈夫李祖安（Joseph Lee）一起生活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她丈夫是密歇根大学建筑系教师。他们共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守仁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他现在就职于纽约伦诺克斯山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并兼职做内科医生。朝鲜战争期间他曾经加入美国空军医疗队，改进了治疗烧伤的敷料（aeroplast），这种敷料见效非常迅速，比原本的纱布药膏快得多。现在他和一对儿女一起生活在纽约。

小女儿来上海探望我们。我妻子为家庭的付出使她比我有权利要求的更多，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她曾经悄悄地卖掉自己的珠宝首饰来贴补家用。我的父亲和我们一起生活了十五年，直到去世。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搬了几次家，从白保罗路到北四川路上的永安里，最后搬到了极司菲尔公园儿童游乐场对面的白利南路。^①

我母亲在我们搬到白利南路之前回中国来和我们一起住。我父亲 81 岁的时候，我的弟弟带着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来中国探望我们的父母。我们在花园里举办了一场宴会，和亲朋好友们一起庆祝父亲的生日。那是一次美好的家族团聚，大人们和十个孩子都住在一起。每天晚饭后家里大部分人会去公园的草坪上散步，大一点的孩子们相互追逐嬉戏，小一点的孩子们则围着我要看我手表上会发光的指针。

① 我们最后居住的是一栋砖石结构并配备现代设施的三层楼房。门前有可以作为网球场的庭院，旁边还有一个三亩地左右的花园。花园里有个鱼塘，鱼塘边有柳树围绕，还有用挖池塘的土石堆成的小山。我们的园丁在这里种了不少果树，有无花果树、桃树、枇杷树和柿子树。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庭院的球场周围种了玫瑰、木兰和菊花。从初春到霜降，花园里一直会是花团锦簇的艳丽景象。5 月和 6 月是玫瑰盛开的季节，竹栅栏上爬满了细小的花苞，入口处的玫瑰和各种鲜花会让园中满是馥郁的芬芳和丰富的颜色。每年玫瑰盛开之际，我和妻子都会邀请女子学校的毕业班来花园中举办聚会。每当我们出门参加宴会回来后，我也总是喜欢沿着草坪散步半个小时，我们的看门狗莱奥（Leo）会陪我一起享受这份宁静。工作时间之外，我也喜欢带孩子们到极司菲尔公园去。我们会在公园里散步，看花园中绽放的鲜花和小动物园中的动物。有时孩子们还会在人工湖上划船或是在儿童游乐场里玩耍。

父亲在生日三个月之后突然病倒了。当时只有我和他在家，他突然觉得胃疼得厉害。我到他房间里的时候，他说自己恐怕将不久于人世。我打电话请来了我们的家庭医生张汝可，他告诉我父亲可能只剩下三周的生命了。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又请来了最著名的中医大夫，可是他们也给出了同样悲观的诊断。

我们把父亲移到了房子一层的一个房间里，安排亲朋好友日夜轮流看护。我父亲一直很惜命，每次家里人谈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都会一声不响地起身离开，所以我一直担心当这一天到来时，对死亡的恐惧会让他格外难熬。不过令我惊讶的是，他在生病两个月后，已经克服了这种恐惧，反而可以平静地说自己要去见祖先了。父亲是佛教徒，我们请了僧人来探望他并为他诵经，让他获得精神上的快乐与平静。

父亲去世前一个月，我的弟弟不得不返回夏威夷去，因为他的假期已经无法再延长了。父亲命令他为了他一家人的生计赶快回去；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些，可能他知道我应付得来。经历了三个月的病痛折磨之后，父亲在病床上平静地离开了人世，他去世时全家人都围绕在他的身边，只是少了我弟弟一人。^①

我们为父亲举办了中式葬礼。朋友和社区的成员们送来了无数的丝绸卷轴，上面的内容是赞颂他生前正直的品格以及教育了好的子女。上海市政府也派来了一个乐队，跟随在亲朋好友送葬

^① 父亲去世前一周，我们的看门狗莱奥从敞开的窗子跳进父亲的房间。我们本来是不允许莱奥进屋的，但是它跳上父亲的床，舔着他的手和脸，仿佛是在向经常与自己一起在花园中消磨时光的亲善的老朋友道别。

的队列后面。我们将父亲的遗体安葬在了闸北区的公墓里。在这个悲痛の場合，家庭成员按照习俗都穿着白色的礼服，我也穿上了正式的晨礼服以示对父亲的尊重。父亲向来寡言少语，但是他在中国这最后几年和我们一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光是平静而安详的。我在政治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从未令父亲失去对我的信心，而对于我的孩子们，他也有着同样美好的期望。

第七章 第一次欧洲之旅

1924年北京发生了政变，北洋军阀有权势的高级将领段祺瑞成为北方政府的临时执政。^①段祺瑞曾经到德国留学，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力主加入协约国，还平息了“辫帅”张勋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段祺瑞还邀请交通系的领袖，有“财神”之称的广东人梁士诒于1925年4月负责组阁。梁士诒曾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而且多年来执掌交通大权。追随他的那些广东部下也占据了交通部内所有的关键职位。

梁士诒此前已经赋闲并移居香港，此次是途经上海回到北京。他到上海的时候有他的两个十分信任的副手随行，一个是他在广州政府时期的省级军事助理卢勉，另一个是曾经的驻西藏代表陆兴祺。他们两个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前往北京新政府中任职。陆兴祺还是徐树铮将军的个人代表。徐将军是段祺瑞信任的政治副手，

^① 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室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执政办公室。

几年前曾带兵收复外蒙古。徐树铮还一直是段祺瑞的政客集团安福系的领袖。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时候，徐树铮正在欧洲。

我到达北京之后，交通次长郑鸿年邀请我加入他部门中的财政重组委员会。我是在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时候通过卢信认识郑鸿年的，那时他在上海避难，经常去拜访我的朋友。陆兴祺希望我去欧洲加入徐树铮将军的考察团。徐将军当时刚刚被任命为考察欧美及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在陆兴祺的介绍下，徐将军从巴黎发来邀请，让我到巴黎去与他的考察团会合。当时安福系与交通系是紧密的盟友。因为从来没去过欧洲大陆，所以我痛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决定随团去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郑鸿年次长好心地准许保留我在交通部的职位，并且在我赴欧洲期间仍按月把我的工资汇给我在上海的家人。大体上说，我在代表团中代表了交通系的朋友们，因为我当时在交通部财政重组委员会的领导是叶恭卓，他同时也是交通系的领袖。

前往欧洲之前，我回到上海探望了我的家人，然后在 1925 年 1 月 24 日乘坐一艘日本船离开上海前往大连。大连是满洲最重要的港口，距离上海大约四天的船程。因为这个城市是由俄国人建设和发展的，所以这里有宽阔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建筑，还充满了俄国风情。在日俄战争之前，俄国曾经希望把大连变成它在亚洲的出海口，这样俄国的船只就可以由此进入温暖的水域。后来日本人在战争中取胜并占领了这个港口，这里于是成为南满铁路的终点站。

我在大连的时候入住了一家由铁路公司经营的现代化的旅馆，

那里的环境非常干净，食物也很美味。我从大连搭乘南满铁路的列车前往哈尔滨，我乘坐的列车和美国制造的那些列车很相似，环境整洁，配有各种完备的设施，不过服务比后者更好。

到达哈尔滨后，我被指引到了华人居住区里一家连暖气都没有的旅馆。时值隆冬，我又冷又难受，更糟糕的是因为吃了旅馆提供的变质食物，还染上了痢疾。于是我决定去医院就医，并且在那附近发现了一家规模很小的红十字医院。我住进了医院的头等病房，并接受了陈医生的治疗。陈医生也是广东人，在英国接受了医学教育。他很高兴地接收了我这个病人，因为他在这里感到孤独，很愿意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和他有“共同语言”的“文明人”给他做伴。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在这里不但有暖气，还可以享受陈医生的友谊，我的痢疾也完全被治愈了。

哈尔滨的冬天非常寒冷，比纽约的冬天还要冷。这里的居民要穿厚重的皮大衣和帽子才能抵御这样冰冷刺骨的寒风。这里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一种开放式的马车。为了御寒，陈医生建议我住到城中欧洲人聚居区里的现代大酒店去。那片地方的氛围非常俄国化，居民也大多是白俄难民，他们在这里过着波西米亚式的欢快生活。酒店每晚都有舞会和卡巴莱歌舞表演。我在那里住了一周，以准备我的欧洲之行，我买了火车通票，还把钱都换成了美元，因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在苏联和欧洲都是自由流通的。

我乘坐中东铁路列车从哈尔滨到了赤塔，这段铁路是中国和苏联联合管辖的，而赤塔则是苏联和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一个小

镇。苏联和日本只靠掌控这一地区的交通主干线就可以在东北享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影响力让我感到十分震惊。从中国的这一部分领土上经过，感觉却像是经过一个日本或苏联的省份一样。从赤塔到莫斯科这段旅途，我搭乘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列车。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穿越西伯利亚的行程变得艰难，但是沿途还是充满了美丽的森林和一望无际的农田。起初我乘坐的是卧铺车厢，但是没多久它就出现了故障，于是我被安排到了一等车厢，然而又遇到了同样的背运，最后不得不挤进了三等车厢，而那里本来就已经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苏联人，其中大多都是农民和工人。虽然这里的食物很差，不能洗澡，连充足的休息都不能保障，卫生状况恶劣，但是这也让我有了一个近距离观察苏联人民的机会，我认为他们是民主、单纯、天性愉悦而友善的。

在莫斯科，外国人只能住在指定的两家大酒店里，一个是大会，一个欧罗巴，我选择了后者。那里的苏联店主狠狠黑了我一笔，仅房间和洗澡的费用就收了我 5 美元。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游览的第一站就是红场上的列宁墓。我排在长长的前来致敬的队伍中，看到了列宁的遗体穿着卡其布的衬衫和裤子躺在那里，头和脚两侧各站着一个卫兵。这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革命家神态安详，仿佛是睡着了一样。在莫斯科停留的三天里，我还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芭蕾舞表演。这里在 100 多年前曾被拿破仑付之一炬，而后又被重建。芭蕾舞表演规模盛大、精美绝伦，由共有超过 100 名舞者和超过 120 件乐器的乐团伴奏，观众们大多都是农民或工人的打扮。在莫斯科其实还能发现一丝淡淡的亚洲氛围，这

里有很多鞑靼人，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这座城市，内城还有鞑靼人入侵时带来的大炮，那里至今还被称作“中国城”。

离开莫斯科，我登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一站不停地经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和德国直达终点。火车一出苏联边境，我就觉得又轻松自由了起来，因为我在苏联的时候一直谨言慎行以避免惹上任何麻烦。去过了这个共产主义的集权国家之后，我更加意识到了个人解放和自由的宝贵。

到达巴黎之后，我住到了中国使馆附近的巴比伦街上的考察团总部，徐树铮将军也住在这里。我以前从未见过将军本人，他身高体壮，头很大，脸很宽，一双黑色的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很有穿透力。我还发现考察团里此时共有五位成员，分别是在法国留学的王治焘和朱佛定；在英国留学的林子丰以及另外两名将军宋子扬和褚其祥。除此之外，将军的妻子、一名女仆和一名男仆也跟随着他。男仆负责给整个考察团做饭，我们白天会吃简单的中餐，晚上偶尔会出去吃法式或意大利晚餐。当地的法国女房东则负责给我们洗衣服和寄送邮件或物品。

因为我们的住处离著名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不远，所以我经常去那里买些礼物寄回家。在那里购物很容易，因为会有穿着礼服的翻译人员一直陪着我。^①

我们在巴黎待了三个月的时间，我逛遍了城里主要的景点，

^① 我给我妻子买了一件大衣和一个小穿衣镜，给女儿们买了衣服，还给家里买了一条超大号毛毯和一套皮沙发。

包括教堂、剧院和博物馆。在这里我第一次走进了天主教堂，里面的装饰让我想起了杭州的大寺庙。我还去看了歌剧，花了 25 法郎买了最好的位子，当时的汇率是 125 法郎兑换 1 英镑。另一晚我去看了《疯狂女郎秀》，这是欧洲最好的表演之一，演员人数众多，都穿着华丽的戏服。表演的一部分焦点在舞蹈演员身上，她们一半是金发女郎，一半是红发女郎，通常都来自英国，因为英国女孩儿是最好的舞者；另一个舞台上的焦点是那些容貌美丽、身材姣好的裸体法国女郎。她们非常出名，舞蹈只是她们节目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她们最重要的作用是展现人体之美。这些裸体女郎在表演结束后会由专门的保镖护送回家，而其他的舞蹈演员则通常只是和男性朋友一起走，并没有专门的保镖。

我也去参观了卢浮宫，在那里花上几天的时间完全不成问题，因为里面展示了众多大师们的名作，让人流连忘返。还有些规模小一些的博物馆，都是只收一点儿门票费。

巴黎最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地铁。在这里乘坐地铁很容易，因为每一站都有清晰明了的地图，标注了不同的线路和站点。这些地图比纽约地铁里张贴的那些地图可强多了。城市里也有很多出租车，但是司机都非常鲁莽，也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果就是行人要想穿过一条宽阔的街道是艰难而危险的，所以当我想要穿过一条大道的时候，总是干脆乘坐出租车，因为在路边等着过马路是非常考验耐心的。

在巴黎，如果你不懂法语，可以买在巴黎出版的英文《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泰晤士报》，它们都与原版同时发行，所以获取

信息完全不是问题；兑换货币也很方便，无论是在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Company）还是托马斯库克旅行社（Thomas Cook），都能兑换；此外，随身携带一本英法字典也可以让我在遇到不会说英语的法国人时方便地找到恰当的词语。

巴黎人是最自由自在的人，对外国人也很友善，对其他肤色的人完全没有种族偏见。所以就算有一个漂亮的法国金发姑娘和一个有色人种男士手挽手走在街上也不会引起什么特别的关注。外国人在巴黎可以自由地活动，而且像客人一样受人欢迎。如果我可以选择自己在哪里生活，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巴黎，因为在这里我感到轻松自在，也不会有邻居对我个人的事情说三道四。法国人已经掌握了最完美的生活之道，而且知道如何做出美味的食物以及怎样成为好情人。

考察团的任务包括参观工厂以及军事和海军设施，我们会聆听专家讲解的军队和海军战争方面的政府机构和项目，还会参加法国当局做的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讲座。我们每天的例行流程是早上7点听徐将军讲孟子学说。徐将军本人也是一位学者，并且非常崇尚孟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民贵君轻”的理念。然而，我不知道将军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孟子学说的真谛，因为他其实是一位独裁主义者，完全没有民主自由意识。上午我们通常是去参观工厂，下午听专业讲座，晚上再把将军写给段祺瑞的冗长的每日工作汇报译成电码，通过电报发回北京。我们的团长看待事物的观点非常主观，而且总想在所有问题上都表现出权威。这样的结果就是，有的成员默认他的观点以取悦于

他，另一些成员则保持沉默，在任何讨论中都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方法。觉察出我有不同意见之后，他经常会到我的房间探询我对一些重要外交问题的看法，因为如果他当众询问我的话，会让他显得很没面子。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熬夜，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领导还在工作，下属就不能离开，而将军经常要到午夜甚至更晚的时候才去休息。我们每个人都睡眠不足，除了将军本人，因为他中午还有午睡的特权，而我则每天都提不起精神。在我们又去了伦敦和意大利之后，我实在无法继续忍受这样的折磨，我跟我的一个同事说，如果我继续在这种严苛的上司手下工作，恐怕要减寿十年了。^①

离开法国前往英国的时候，我们的考察团要乘船经过加来和多佛之间的海峡。登船后，水手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搪瓷脸盆，是为遇到恶劣天气晕船时准备的。这段海峡是我经历过的所有航行中最艰难的一段。我们的小船一路上都在狂风暴雨中颠簸，大部分乘客都晕船了。虽然我还能全程保持平衡，站立在船上，但是我不得不闭上眼不去看其他乘客抱着脸盆呕吐的情景。幸运的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船顺利抵达了多佛。然后我们又从那里乘火车前往伦敦，几个小时之后就在滑铁卢车站下车了。

^① 为了表彰我们的考察团为促进中法关系做出的贡献，政府向我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我在法国参加重要的外交宴会时会佩戴这枚勋章。我的妻子和女儿们特别喜欢勋章的颜色和样式，这枚勋章也一直被她们视为传家宝，因为这也是我唯一一枚由政府颁发的勋章。然而，在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的时候，勋章和证书都遗失了。

我们在伦敦待了一个月，我游览了所有的景点，通常是乘坐地铁、公交车或出租车。我去了伦敦塔，看到了展示在玻璃罩子里的精美的皇冠宝石。我还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在海德公园听站在肥皂箱子上的演说家们就感兴趣的话题直抒胸臆，然后又沿着曲折蜿蜒的小路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美丽的景色。我还去参观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里面种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英国植物学家就是把南美洲的橡胶移植到这里之后才建议将其引入马来半岛的，于是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就成了世界上主要的橡胶生产地。小朋友们在父母的陪伴下欣赏着彼得·潘的雕像，这座雕像也是这里令人难忘的地标之一。不列颠博物馆里陈列着来自各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国家的动物制品和艺术品。我还去了第二届温布利展览会，它和1915年我在巴拿马参观的万国博览会很类似。我在剧院看的一出表演名为《不，不，纳内特》（*No, No, Nanette*）。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伦敦人的良好教养和对外国游客的殷勤。^①

在莱姆街上有一片华人的聚居区，里面居住的大多是水手和他们的家人，很多家庭成员也是中英混血。那里当时还没有任何

① 我第二次和妻子一起去伦敦的时候也发现了这样的特点。有一天我们一起到城郊拜访一个朋友，但是出了地铁之后怎么也找不到他家的位置。我们看到有一辆出租车，就打算请司机把我们载过去，但是司机看到我们离目的地其实已经很近之后就主动提出陪我们走过去。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并感谢了他的善举。每次我想到英国人民的乐善好施时就会想起这件事。他们其实是保守而内敛的人，除非有人引荐，否则很难在伦敦结交朋友。英国人和中国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喜欢喝茶。

大规模的华人商业机构，而且整个伦敦只有两家不错的中餐馆，一家在牛津街，另一家在皮卡迪利广场。

伦敦的社会状况与巴黎和上海类似，皮卡迪利广场附近也能看到很多站街拉客的妓女在夜幕降临之后四处寻找生意。这样的社会弊病源于人口过剩和就业机会短缺。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过剩的问题，伦敦繁华地段的每个街区上都有计划生育诊所。我也到这些诊所里进行了考察，并且收集了很多关于那里使用的计划生育手段的信息。中国当时在这一问题上还完全没有意识，即便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医生，回国后也很难再获取这方面的信息。

我们在巴黎访问时，中国的驻法公使是陈篆。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杰出外交家，也是一位精通中法文化的学者。他帮助徐将军制定了考察活动的一些草案，以防活动出现什么偏差。但是当将军去了伦敦之后，他身边就再没有这样明智的顾问来指导他的行动。在伦敦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巧舌如簧的中国使馆代办，这个人名叫朱兆莘，他为了满足将军的虚荣心，为将军安排了一次在伦敦大学做讲座的机会，题目是《中西方音乐对比》。我试图说服将军不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样的题目需要演讲者对两种音乐都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是将军封闭的思想和自大的情结导致他最后还是站在了智慧的英国听众面前，而他对这一题目的肤浅认识也暴露无遗。听众们提出的问题让他非常难堪，虽然坐在最后一排，我依然感受到了他的演讲带来的耻辱。将军就像是一条离水的鱼，不知所措地被晾在台上。

伦敦之行以后，考察团又前往了德国，但是我独自返回巴黎处理了一些事物，然后直接到意大利和我的同事们会合。我是坐火车从巴黎前往米兰的，途经瑞士，但是我并没有做任何停留。到达米兰时是当天下午，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旅馆经理会说英文，并且给我安排了一间带独立浴室的客房。^①

米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路边有很多高大的建筑。我整个晚上都在街上散步并欣赏橱窗中的商品，但是并没有买什么贵重的东西。有的建筑旁边有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小商店，展示着各种古董、鲜花和礼物，但是我完全没有受到诱惑，因为我的行李箱里实在没有地方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火车前往罗马，和考察团其他同事会合。当时他们住在一家现代化的旅馆里，我和林子峰分到同一个房间，他也是广东人。我们开始先去参观了这座圣城，当我们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一个考察团成员竟然用手去捏教堂入口处摆放的两尊小天使雕像胖胖的脸。他竟然在这样庄严的地方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立刻就受到了其他成员的一致指责。虽然圣彼得大教堂的庄严肃穆令人印象深刻，我却觉得临近的圣保罗教堂更有艺术气息。我们还乘坐意大利政府的飞机在罗马上空盘旋了一周，

^① 发现酒店里没有浴巾之后，我叫了客房服务。但是过来的女仆却不会说英语或法语，而我又把我的英意字典落在了巴黎，所以我想用手势说明我需要浴巾，但是她依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最后她把经理叫来了，后者忍俊不禁地告诉我，女仆还以为我的手势是在调戏她。当所有事都说清楚之后，我们三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架飞机是一战后德国人留给意大利人的战利品。通过空中俯瞰，我们对古竞技场和古代罗马水道有了更清晰的观察。

我们的考察团受到了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政府的热烈欢迎。我们到哪都会受到盛情款待，我们还到无名烈士陵园，爬上了长长的台阶去表达了敬意。徐将军在他的两个少将的陪同下检阅了意大利皇家卫队。我们还去里窝那参观了当地的海军学校。我们在罗马参观了菲亚特汽车工厂和其他工厂，并且惊讶地发现它们都非常现代化（都是一战之后建造的）。我们在罗马时正赶上夏天最热的时候，而且到处都是苍蝇。意大利人的食物中有一样与中餐相同，就是面条，这也是他们的主食之一。这肯定是马可波罗在几百年前从中国介绍到意大利去的。另一样我们没见过的食物是一种有彩虹颜色的冰淇淋。

在意大利又待了一个月之后，我向考察团提出辞职，并于1925年夏天经法国返回了上海。离开时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再在徐将军手下工作，不过我并不想当面顶撞他，而且还希望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和考察团一起完成剩余的欧洲国家考察项目，那我就不得不陪同将军一起回到中国，到时就更不容易请辞了。后来事实证明，我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当将军在12月10日回到上海时，我还去为他接风洗尘，但是随后并没有陪同他一起北上返回北京，因为我已经不是他考察团的一员了。1925年12月29日，当火车停靠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小站上时，将军被他的敌人刺杀了，有传言说背后的主使者是冯玉祥将军，而原因则是出于个人恩怨。当时和将军乘坐同一辆火车的我

曾经的同事不是被恐吓就是被打伤，连手表、钱财等也被士兵抢走了。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徐将军会有这样的悲惨结局，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不是真正能够建设中国的人，他的思想封建而闭塞，而中国应当属于有朝气、有远见、有智慧的进步人士。

第八章 在华南和华中的过渡性工作

结束欧洲之行回到上海后，我打算先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再决定我的下一步政治行动。我听说孙科此时正在上海休假，他现在是广东政府的政府委员，于是我前去向他咨询南方此时的政治情况。我们讨论了一些政治问题，我告诉他我对安福系没有一个统一中国的可行计划感到失望。孙科当时是反共的西山会议派的一员，我对这个派别的领导者略有耳闻。^①我同情他们的运动，而且孙科邀请我到广东去帮他重新组建三条重要的铁路线，即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和广三铁路。我对他说我已经答应带我妻子去北京旅游，等我从北京回来之后我会考虑他的提议。不过当我的安福系朋友请我留在上海帮助他们组建银行的时候，我则告诉他们我已经决定加入南方政府，因为我相信拥有良好政治组织的南方政府最终将统一中国。

^① 他们是叶楚傖、邵元仲、林森、唐绍仪和邹鲁。

1925年秋天，我和我妻子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中途在南京下车游览了一番。我们住在下关的一家旅馆里。下关是长江沿岸一个港口，到城墙围绕的南京城坐黄包车还要走一小时左右。南京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都城，而且他的陵墓也位于此。朱元璋其实被安葬在一座小山上，只有正面一道围墙，整个建筑中间有一条隧道可以通往墓穴，但是具体的安葬地点则没有明确的标记，所以整座绿树覆盖的青山都成了他的墓。我们还去了五洲公园^①，这个大公园里面有好几个湖，水中长满了莲藕和荷花。最后我们还爬上了高高的城墙，并且在上面散步了半英里左右，从那里不但可以欣赏到城市周围的乡村和远山，还可以看到长江的全景。

我们在南京待了两天后继续北上前往北京。到北京后我们住在 P. S. 吴 (P. S. Wu) 和他的妻子梅布尔 (Mabel) 家。P. S. 吴和我在我们还都是单身汉时就是朋友了。他是一位来自旧金山的美籍华人，毕业于普渡大学。他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工作时曾经被土匪绑架，不过政府支付了赎金，并将土匪整编入军队之后，他就被释放了。他的妻子是一位来自芝加哥的美籍华人。^② 我妻子和我参观了城市里的主要景点，包括中央公园、紫禁城、天坛和雍和宫。

1925年10月，在我们到达北京之后十天左右，浙奉战争就

① 即玄武湖公园。——译者

② 这些朋友现在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圣马特奥。

爆发了。为了避免被困在北京，我们搭乘了能赶上的最早一趟火车返回上海。可是到了浦口，我们却无法渡江返回下关，因为通往上海的交通已经被阻断了。于是我们只好又搭乘同一辆列车返回天津，在铁路公司一个买办朋友的帮助下，我们买到了太古洋行前往上海的渡轮上的华人舱船票。既然已经在天津了，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在英国和日本租界内游览了一番。天津是北方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大连、上海、香港、广东之间都有贸易往来。这里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可以在这里生活，其中英国租界是最富有的地区，这里最重大的社会活动是全年各个时节都可以举行的赛马大会。

回到上海之后，我决定在 1926 年初陪同孙科返回广州重组各条铁路。我们乘船经香港到广州。因为香港当时正在举行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罢工活动，所以船停靠在香港水域之后，我们就只能换乘一条小船前往广州。在香港的中国仆从和工人都离开了英国雇主家庭或工厂，要么回内地老家去，要么暂时和城里的亲戚朋友们住在一起。

广州当时也出现了各种政治运动，人们心中都怀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南堤俱乐部成了西山会议派成员的主要社交圈子，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老朋友及其他一些进步的政治家们。我经常和孙科、吴铁城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吴铁城是一位参加过二次革命的老同志，革命失败后曾经到檀香山政治避难。伍朝枢博士是当时的广州市市长，他见到我之后就向孙科提出让我帮他在广州

组建一个现代的土地管理部门。^① 因为孙科和伍博士在工作上一一直合作密切，于是让我为广州建立一套现代的土地管理系统。^② 我巧妙地向伍市长提出我接受这一任务的前提是广州必须进行一次精确的土地普查和权属登记，而且要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到香港、马尼拉和上海的外国租界考察这些地方的土地管理系统。得到市长的准许之后，我就离开广州，开始了我的考察行程。此时香港的罢工还没有结束，而且香港和广州当局之间的关系也陷入了僵局，因为英国人怀疑这场罢工就是由广州政府在背后煽动的。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我拜访了在广州沙面的英国总领事壁约翰爵士（Sir John Brennan），请他为我到香港考察土地制度提供协助。壁约翰爵士慷慨地满足了我的请求，并为我出具了一封致香港当局的介绍信。^③

整个考察期间，我在香港待了两周，在马尼拉待了一个月，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主要是学习他们的土地普查和登记制度。在马尼拉，我发现他们采用的是托伦斯不动产登记法（Torrens sys-

① 1916年我回中国途经夏威夷时第一次见到吴铁城，我记得他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人。1926年伍朝枢博士任广州市市长。他是著名外交家伍廷芳之子。他和他的父亲都曾到美国留学，并且都就任过驻华盛顿大使。

② 当时已经组建了一个研究土地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包括：俄勒冈大学毕业的吴尚鹰，哈佛大学毕业的邓穗仁（Teng Sui-jen，音译），以及香港大学毕业的傅秉常。他们希望采用德国人在山东青岛实行的土地制度，即对不动产自然增值课以重税。

③ 这件事让我和壁约翰爵士成为朋友，直到几年后他从上海英国领事馆被调回伦敦外事办公室为止。

tem)，于是推荐广州政府采取同样的方式。1926年5月29日，我的妻子在上海租界生下了我们的儿子蔡守仁。当母亲和孩子都调养好了之后我就独自回广州汇报我的工作成果去了。我建议政府新建的土地局采取土地普查和不动产登记制度。

我回到广州之前，那里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动。伍朝枢市长被驱逐到香港。因为孙逸仙博士邀请苏联人帮助重组国民党，而国民党中有一部分党员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些右翼成员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这个名字的起源是他们在北京西山召开了一届国民党代表大会，会议宣布解雇苏联顾问，并开除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不久之后，吴铁城成为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虽然孙科也是西山会议派的一员，但是并没有受牵连，并被任命接替伍朝枢的广州市市长。这还要多谢张静江这位位高权重的资深政治家从中调停，才使得孙科能够免于被蒋介石发配到莫斯科。^①

孙科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他要求我继续在广州组建土地局。当时广州市连一张精确的地图都没有，我于是第一个引入了三角测量法对广州进行普查，并进行登记。支撑这项庞大工程的资金来自前期测量工商业区域的高价地产，以及登记和签发地契收取来的费用。所以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中，土地局几乎没有向广州政府索要任何拨款。我引入了澳大利亚的托伦斯不动产登记法，即由政府向权利人颁发产权证书。政府先对一片区域进行普查，

^① 那段时间，直到北伐结束，蒋介石一直是个共产主义者，并且支持鲍罗廷领导的广州共产主义者们。

然后以发布公告和在日报上刊登广告的方式通告该区域的地产权利人或其代理人在一个月之后与他们的左邻右舍一起前来确认普查划定的产权界线是否准确。整个城市的地产权利人们都很配合这项工作，因为划定明确的产权界线完全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新签发的有法律效力的地契也是对他们所有权的最好的法律证明文书。整个土地改革工作算得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受到广州的这些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政治家朋友们的感染，我决定就在这里安家落户。我派人去上海把我的父亲、妻子和三个孩子都接来广州。他们也是先乘船到香港，我再到那里去迎接他们。当船靠岸之后，我立刻上去找到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在船舱里，因为我妻子之前一直要照看老父亲、两个女儿和只有两个月大的儿子，所以根本没时间收拾行李。她让我带着两个女儿坤仪和文仪到甲板上去看看港口，我父亲可以暂时照看一下婴儿，这样我妻子就可以收拾东西准备下船了。

我们没有登陆香港，而是直接坐上了去广州的河船，因为此时香港的罢工还没有结束。好在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当河船抵达这个珠江边上的大都市之后，我们先是在沿江大道附近的一栋混凝土楼房二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下来，这里也是广州城最繁忙活跃的运输区域之一。^①

① 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每当我妻子要给儿子喂奶，我父亲就会领着我的女儿们到阳台上看街景。到了周末，我会带着女儿们到沿江大道的南堤俱乐部吃午饭，还会给她们买冰淇淋。周六晚上我会和妻子一起去俱乐部看电影，而且在那里，她还可以见到我的朋友以及他们的家人。

此时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开始，他的军队中还有两名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和 V. K. 布柳赫尔（V. K. Blucher），后者常被称为加伦（Galen）。誓师北伐之前，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正式在广州成立，孙科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

孙科邀请我来主管铁路工作，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并请胡继贤来接替我在土地局的职位。他是我在哥伦比亚的同学，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他至今还一直在广州生活。我的新职位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重组广东省台山市的新宁铁路。这段距离不长的私人铁路线是由美国归国学子建造的，当时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我们派出一个三人小组前往台山接管这条铁路的管理工作。^① 他们在那里的卓有成效，先是裁减了冗余的人员，然后对铁道进行了修整，最后还厘清了财务状况。他们和股东们密切地合作了几年的时间，待一切步入正轨之后才主动提出离开，将铁路的管理权又交回到了股东手里。

北伐是一次史诗般的大事业，很像中世纪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北伐受到了所有充满爱国热情的人民的支持，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论强大还是渺小、不论健康还是病弱，没有人不鼎力相助。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包括充满魅力的孙逸仙夫人和她的女仆，已经瘫痪、坐在脚夫抬着的躺椅上的张静江先生，法学家徐谦，孙科和他的夫人在内的一行人在我的陪同下，乘坐由我负责的列

^① 这三个人分别是留学日本的陈铁珊；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刘菊可的和毕业于纽约大学的钟启祥。

车前往韶关。至于其他从陆路、水路采用各种交通方式北上的狂热的政治追随者们则更是不计其数。

北伐军启程后，我回到广州了结了一些事务，同时悄悄地把我的家人送回上海，因为那里还处于北方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控制之下。^① 我的家人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离开广州，乘坐河船前往汉口与孙科会合，他们一行人则是于1927年春天由陆路到达汉口的。

在这个华中重要的港口城市里，我与京汉铁路公司沟通并获得将他们的行政楼二层作为交通部的办公室的许可。与此同时，武汉政府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组建了起来。^② 而蒋介石领导的那部分北伐队伍此时也已经击败了孙传芳的部队并占领了上海，然后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了绝对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北京则还处于北方各个军阀的统治之下。

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努力帮助孙科管理铁路工作的。当时我们控制着广东省内的铁路、粤汉铁路湖北段、株萍铁路江西段以及京汉铁路在湖北省内的一小段。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拖欠员工三个月的工资，所以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和我们一起来到汉口的工作人员找到满足日常需要的资金来源。幸运的是我

① 当时的上海并没有直接处于敌人的控制之下。公共租界由英国人掌控，法租界由法国人掌控，我的家人就受到了这些友好的市政当局的保护。

② 武汉政府的总部在武昌和汉口，无论是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都宣称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

认识当时的交通银行经理曾武初，我们曾在香港的工商银行一起工作过。我一到汉口就马上去拜访了他，并询问为什么他的银行不能进行商业贷款。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银行根本没有白银储备来承兑银行发行的纸币。于是我向他建议，由他的银行借款给铁路公司 40 万元来支付员工的工资，然后由交通部下令铁路公司只接受用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来购买车票。铁路公司收到的纸币会用来优先支付离汉口尽可能遥远的地区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一旦纸币开始流通到乡村，他们就要过两三个月才能回到汉口承兑。银行和交通部就可以同时通过这个办法解决双方的财务问题。^①

我在汉口的时候，鲍罗廷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们为京汉铁路准备两列有乘客车厢的火车，外表要刷成国民党旗帜一样蓝白相间的颜色，随着北上军队的节节进发，火车也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鲍罗廷的个子很高，讲一口美式英语，毕业于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他的个性非常强势，无论行动还是言谈都很果决。他的权力很大，国民党的任何官员都不可能做出他敢于做出的大胆举动。毫无疑问，苏联在他背后的财力和武力支持才是让他能够行使如此大权的原因。

为了切实了解一下铁路的状况，我亲自到粤汉铁路去做了一次调研，途中我在长沙停留了一天。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郊外有河流穿过，还有美丽的乡村景色。

^① 这是一个当传统方法都行不通的时候寻找新的解决之道的例子。我在中国的这些年里，很多政府当局都愿意起用我，因为我总是能够帮他们筹来资金，为濒临破产的企业或崩溃的财政带来新的机会。

长沙的下一站是株洲。我从这里开始调查江西省境内的株萍铁路，并且在醴陵停留了一天多的时间。醴陵因其地多美女而闻名。我参观了这里的瓷器厂和第一座现代化桥梁，在株萍铁路的终点，我还去考察了萍乡煤矿，那里最初是在晚清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由德国工程人员创办的。我还看到了在煤矿接待大厅里悬挂着的张之洞的照片。萍乡煤矿此时的运营状况很好，它的管理者是贵州人沈湛溪，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采矿系。

汉口的财务状况当时非常混乱，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所有机构都是自主运行，完全靠自己寻找资金来源的。不过交通部本身的麻烦就让我忙得分身乏术，自然不可能再去顾及其他部门的困扰。对于铁路公司来说，最糟糕的问题就是工会代表争夺铁路管理权的问题。这些工人代表团特别难对付，总是提出一些不可理喻的过分要求。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轮番上阵，像鹦鹉学舌一样反复重复同一套说辞，想要磨到我同意为止。这样的行为当然会让我耐心尽失，甚至感到非常愤怒。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让这些弄清楚自己位置。既然每个劳工代表团体都抱怨铁路雇员的服务差、工作效率低，我就答应任命这些劳工为所有乘客车厢的巡视员。他们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唐生智将军和他的军队已经认定这些列车都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当这些工会领导出现在车厢中时，他们要么是挨了士兵的打，要么是被士兵赶下了车。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劳工代表来向我抱怨或提要求了。我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了我在中国遇到的大部分劳工问题，那就是利用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来为公众谋

求利益。

当时还总有开不完的委员会议，再加上我同时兼任数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所以我设法加快了各种会议的进程。首先我从不等候迟到的成员，只要参会人数达到要求，会议就会准时开始；其次我会选择会议议事项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优先讨论，并通过鼓励活跃的讨论来迅速做出决断。这些做法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意见，因为其他成员也都希望速战速决，以便去参加其他会议。

因为武汉和南京政府都想要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施加一些影响，所以孙科派我到上海去与英国出资的沪宁铁路的总经理协商获取这条铁路控制权的问题。南京政府发现了我此行的目的之后，立刻秘密发电报通知该铁路的执行董事，也是他们的代理人对我实行逮捕。英籍的罗泮辉博士是这条铁路的秘书长，他是广州人，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看到了这份密电之后，将这个消息转告了我。他一大早就来到我的住所向我展示了南京政府这份电报的复印件，并建议我马上离开上海。于是我立即躲到了陈耀荣的家里避难，他也是我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同学。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才买到了一张去汉口的英国渡船的船票。乘坐英国船是个安全的选择，因为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一方政府的干涉行为，因为他们想要保证出于国际贸易目的的长江自由航行。

到了汉口以后，我向孙科汇报英国人已经决心保卫他们在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利益，为此他们会在上海安排强大的军队，并且派战船在长江上来回游弋以保卫他们的船只。如果岸上有火力向他们射击，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战船上的炮火还击。我试图

说服孙科放弃武汉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中一直缺乏团体间的通力协作。孙科为此非常气愤，并指责我背叛他加入了敌人的阵营。这次争吵的当晚，我乘坐一艘英国船只悄悄地离开了汉口，回到了在上海的家人身边，过上了平静一些的生活。孙科一直在汉口和共产主义者们一起，直到南京政府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完全主权。^①

我回到上海后，我的亲朋好友们都劝我到日本、香港地区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度假散心一段时间。他们都听说了南京政府要秘密逮捕我的命令。不过我决心和我的家人一起平静地留在上海生活，因为我已经离开了武汉政府，现在只是作为普通市民居住在上海。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也并没有什么人来骚扰我们。上海成了我的避难所，几个月后，南京和汉口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平息了。

① 国民党中那些政治人物的所谓忠诚和主义会按照他们的自身利益随时改变。

第九章 在上海和广州的政治历险

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后，孙科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工作，于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担任财政部部长。财政部在筹集资金方面一直面临着困难，按照以往的惯例，紧急性财政支出通常由银行提供的临时贷款来填补，但孙科无法获得这些银行贷款，因为他在南方或北方的浙江银行集团里都没什么影响力，而南京政府过去的短期预付贷款恰恰是由这些银行提供的。浙江银行集团的领导机关中国银行甚至在财政部提议将造币厂的机器作为抵押的前提下，仍然拒绝向孙科提供小额贷款。

面对这样的困境，孙科邀请我到南京帮他解决与银行之间的僵局。我建议他在财政部下面成立独立的钱币司，负责为政府寻求短期贷款。孙科表示同意并任命我为组织者，负责在上海成立钱币司。钱币司成立后，我得以向浙江银行集团施压，迫使他们向政府提供短期贷款。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在发行可以流通的纸币，但是这两家银行对于纸币发行量和与流通中的纸币

相当的银行储备则根本没有任何官方监管。因此我开始推行监管货币发行的法律，并威胁将要调查这两家银行的银行储备。由于政府过去一直没有对这两家银行进行正式检查，因此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银行储备，所以不得不向财政部妥协，同意继续向政府提供短期贷款。作为交换，钱币司答应延迟调查。我这样做也是因为担心将这两家银行的真实现状公布于众后会造成恐慌。不过这已经足以警告他们应对自己的银行进行整顿了。

此时共产党在广州发动了一场起义并占领了这个城市，但很快就被忠于政府的军队镇压了下去。在我的建议下，孙科提议南京政府应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这一提议被采纳后，钱币司负责对所有苏联在上海设立的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进行清算。当时苏联政府从华中地区采购了大量茶叶，我用苏联商业机构的资产抵偿了他们应当支付的货款。这也是在我仅几个月的短暂任期内，钱币司唯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

孙科到国外进行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察后，我便辞职了。国民党政界元老张静江十分认可我的能力，尽管之前我从未与他见过面，但通过他的介绍，我受李济深的邀请于1928年4月来到广州，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张静江和李济深是知己好友。北伐战争期间，李济深留在两广地区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也被公认是南方地区的军事领导人，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和威望仅次于蒋介石。李济深急于恢复粤汉铁路以改善军事运输状况。当时的粤汉铁路是由广东省政府重建厅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管理的，但是实际控制着铁路经营的却是机械

师协会的成员。机械师协会成员通过各种勒索手段从粤汉铁路榨取利益。由于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这个工会组织势力十分强大，数月前还曾帮助广东省政府镇压过一次共产党人起义。协会中的成员虽然是粤汉铁路的正式员工，按时领薪水，但他们并不工作，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粤汉铁路购买物资时从中收取的佣金，最终结果就是粤汉铁路损失了大量的资金。举个很小的例子，连从粤汉铁路北部终点站韶关运往南部终点站广州的水牛都经常会不翼而飞。

过去几个月里，我举家搬往广州又搬回上海，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现在为了去广州，我不得不向陈耀荣借了 500 元作为路费。到达广州后，我以前的同事兼好友卢勉向我简单介绍了那里的政治形势。卢勉当时是李民欣的秘书，李民欣是李济深将军在军中重要的副手，时任海关负责人。除李民欣外，李济深将军还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政治助手冯祝万。冯祝万是广东省的财政厅厅长，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我拜访了李民欣和冯祝万，还和冯祝万成为好朋友。^①

第一次见李济深时，我建议他先改造广东省内的广九铁路、广三铁路和粤汉铁路三条铁路线，他当即邀请我开始筹备广九铁路的重建工作。广九铁路由英国投资建设，当时在英国工程师的管理下运营得相当不错，因此我对他的建议并不太感兴趣。我向

^① 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冯祝万几个月前去世为止。通过李民欣和冯祝万，我才和李济深将军的核心成员集团有了联系。

他推荐了卢勉，于是他便任命卢勉为广九铁路的执行董事。卢勉就职后邀请我住进了广九铁路的招待所。

此后广九铁路招待所便成为我们的社交俱乐部，广州铁路的交通主管、工程师和铁路工作人员都会定期来此聚会。曾将我推荐给欧洲考察团的徐树铮将军的我的老朋友陆兴祺那时也在广州，是重建委员会的领导。每天晚上，卢勉、陆兴祺和我会一起吃晚饭，我们会讨论南方地区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凑巧的是，我们都喜欢那里的美食，尤其是生长在广九铁路区域的桂味荔枝。

最后李济深将军任命我为粤汉铁路总经理。在接受任命前我提出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就无法重建和改造粤汉铁路，于是他当即签发了一份密令，授权我指挥他驻扎在粤汉铁路沿线的部队。我就任总经理一职后，李济深将军还在粤汉铁路的行政办公楼里安排了士兵，以显示他不畏一切阻碍改造粤汉铁路的决心。看到自己对粤汉铁路的控制权受到了损害，机械师协会于是秘密组织了一次大罢工。我的巡查员发现了工人藏在铁路动力室里的80多支步枪。于是我下令逮捕了其中两名劳工头目，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这次行动标志着机械师协会开始丧失对粤汉铁路的控制权。

然后我便开始了粤汉铁路的重建工作。首先，我核查了员工数目，发现有些员工只拿工资不上班，甚至还有给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发工资的现象。于是我解雇了所有多余的人员以减少开支；然后又降低了票价，这样便可与走北江去韶关的货船的票价

相竞争。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的收入实现了惊人增长。^①

通过缩减开支和增加收入，我们从马尼拉购买了数千根硬木铁路枕木，又从美国购买了两列机车。我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李济深的人品，他与以往那些恨不得把广东铁路收益榨干抹净的军队领导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增长的收入才得以用于改善粤汉铁路，而非上交给省政府。此外，我深信在有突发情况时，我可以随时调用李将军驻扎在铁路沿线的军队。

在粤汉铁路的重建工作中，我有幸得到卢炳玉的帮助。卢炳玉是毕业于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优秀工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柯蒂斯公司（Curtiss Company）工作，发明了牙签式飞机螺旋桨，从而降低了老式螺旋桨在飞行时产生的噪音。回到中国后，卢炳玉立志于在广州建造轮船。当他得知我负责粤汉铁路的重建工作时，就找到了我并表示愿意效力。他大胆而谨慎地帮助我研究各种重大的工程问题，毫不畏惧机械师协会可能对他施加的人身伤害。尽管如此，我还是建议他在车间工作时随身携带一把手枪防身。^②

粤汉铁路的重建任务完成后，我就将粤汉铁路交还给了李济

① 这是铁路车票的首次降价。沿线各个车站的商贾派代表给我送去银杯以示感谢，还鸣放烟花以纪念新政策的实施。

② 我后来重建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时，卢炳玉也担任了总工程师以协助我。卢炳玉喜欢动物，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饲养一只小警犬上。他借住在我在上海的日子里时就曾用牛奶喂养幼犬。有一天，我2岁的儿子守仁告诉我，他想做卢叔叔的小狗，因为卢叔叔的小狗有很多牛奶喝。

深将军。机械师协会算是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他们对粤汉铁路的控制权也已经被瓦解。在和他们进行斗争的那段时间里，我因为随时带着两名武装保镖才避免了遭到流氓恶棍的袭击。这也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大的风险了。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的朋友们都保持中立，这让我感到失望。由于担心与机械师协会对抗可能会危及自己的性命，他们甚至不敢来见我。之前我与他们曾在广九铁路总部进行政治讨论，他们每个人都许下了豪言壮语，现在看来不过是空谈。于是我打算返回上海，并且决心今后遇到其他重要的项目时我也绝不会与这样的人进行任何合作了。然而，还是有一位忠诚的朋友有勇气接替我的位置，他便是胡继贤，也就是我离开广州市土地局时的继任者。我与他就当前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密谈，并邀请他接管粤汉铁路。他表示同意，于是我将他推荐给了李济深将军。李济深将军任命他为粤汉铁路总经理。^①

李济深将军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身材魁梧，性格内向，一直没能把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尽管如此，李济深将军还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他曾在华北的军事学校学习，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也学习过《易经》。一位伟大的《易经》学者曾对我说过：李济深就是《易经》中“蒙卦”的最好诠释。

① 继广州的经历之后，我决定在以后的整个政治事业中继续与胡继贤进行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年后，胡继贤又接替我成为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执行董事。最后一次听到胡继贤的消息，是他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时候。抛开他目前的政治立场，我可以确定地说，胡继贤是一个正直、有能力、有勇气的人。

《易经》教导人们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李济深将军控制着两广，是除蒋介石之外最强大的军事领导人。包括香港总督在内的多名优秀参谋建议他待在南方，但他对此置若罔闻，毅然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前往南京参加 1929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借此机会，蒋介石将他扣留在了南京近郊的汤山温泉，直到 1931 年 10 月才释放。总体来说，李济深不是一名行动主义者，他更喜欢文书工作和参谋勤务工作。内向的他也许寄希望于成为蒋介石的副手，结果却无辜地落入了蒋介石设计的圈套中。

蒋介石之所以能将李济深骗至南京，是因为国民党的三位元老张静江、吴稚晖和吴仲贤曾向李济深保证了他的安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也是这三位元老保住了他的性命，并负责照料他的身体健康。为了丰富李济深的生活，蒋介石还给他送来了一名美貌的侍女。我在南京时，曾陪同张静江和李石曾到软禁李济深的地方拜访他。得益于张静江和李石曾这两位政界元老的名望和影响力，我才得以成行。在拜访过程中，我和李济深探讨了中国的艺术和书法，但未提及政治。他看起来镇静自若，没有一丝苦闷。我注意到房中并没有任何警卫。

虽然张静江、吴稚晖和李石曾是国民党的政治领导人，但他们对蒋介石的影响力却十分有限，因为蒋介石任用他们只不过是达到了他个人的政治目的。张静江、吴稚晖和李石曾在革命之前就在法国形成了一个三人的小团体。那时张静江是古玩界的成

功领导人，李石曾是豆腐制造商，而吴稚晖则是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哲学系学生。张静江家境殷实，本人十分慷慨，为中国的革命提供过经费支持。李石曾是一名积极的革命倡导者和政治家，而吴稚晖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和学者。革命成功后，尽管双腿瘫痪受困于轮椅之上，张静江依然热心于铁路建设和电气项目等国家实业。在北伐战争时期，他曾一路追随北伐军到达南京，坐着轮椅参加了所有会议。张静江还是一位中华文化方面的学者，每天晚上都会练习书法作为对自己的一种修行。他非常受人尊敬，我本人也很敬佩他。李石曾醉心于政治权谋，而吴稚晖则通过以身作则来树立道德和知识的标准。张静江和我是好朋友，我曾在他领导的建设委员会工作，还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行政秘书。他希望我帮他建立隶属该委员会的电气企业。也是通过张静江，我才与李石曾和吴稚晖相互熟识起来。

国民党政权学习并采用了共产党教给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府管理模式，而不是根据法律来管理国家，国民党主席的意愿就是法律。蒋介石实行了彻底的独裁统治，以至于李济深被捕一事竟无人敢提出异议。随后，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也被扣押，从1931年3月被软禁至1931年10月。不久，张学良也被逮捕，至今仍被扣留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就可以随意逮捕关押任何人，这一点至今仍然如此。到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依然没有实行政治民主，也没有根据宪法实行法治，而是由蒋介石一如既往地独揽大权。

第十章 在固定的职位上安定下来

1928 年底，孙科结束他的国外考察回到中国，蒋介石任命他来管理国有铁路。随后铁道部从交通部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使独立的职能。孙科去铁道部赴任时，邀请我负责行政处的各项事宜，并同时任命我为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总经理。

肩负着这些新的使命，我一周内大部分时间要待在南京处理铁道部的各项工作，周日和周一则回到上海处理我直接负责的两条铁路的各项事宜，我几乎没有时间陪我的家人。那是一段劳心费神的日子，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铁路工作中，因为这两条铁路都迫切需要通过更新的、更合理的财务管理来实现重建和扩建。

每周六晚上 11 点，我会乘坐夜间特快列车离开南京，于次日早上 7 点到达上海。我在家用过早餐，然后从 9 点 30 分起与沪宁铁路的各位部门主管在我家召开周日业务会议。下午是我唯一的休息时间，通常我会开车带家人去吴淞口。我们沿着乡村的防浪堤散步，感受海风吹拂，看着浑浊的河水从岸边一直延伸到地平

面。河水黄浊的原因是内陆的树木被大量砍伐，长江水里裹挟着大量的泥沙，最终流入大海。

周一一整天我都要忙于铁路事务，晚上 11 点再乘车出发返回南京，于周二早上 7 点到达。

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上海市四川北路尽头的一座两层楼房里，这是一座简单的中式建筑，配备了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尽管铁道部许可我将这幢现代化建筑作为我的居所，但我放弃了这一特权，而是把它改造为了铁路员工的诊所。^①

在南京，我和我的几位同事一起住在一套租用的房子里。由于城里没有现代化的供水系统，而井水又不适宜饮用，我去那儿的第一周就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患上了痢疾，后来改喝从上海带来的蒸馏水才渐渐康复。

我以前的同事胡继贤也进入铁道部工作并担任财政司司长，他也是我在粤汉铁路的继任者。此时我们住在一起，经常到郊区一边散步，一起讨论共同面对的难题。我们约定在幽传寺（Yu Chuan Chih，音译）见面。幽传寺是中山陵附近的一座安静的寺庙，附近景色优美。有时我们也会在城墙上散步好几个小时，远

① 我家里有一名男佣阿阳（Ah Yang，音译）和一名女佣，还有一名男厨师。先前我在粤汉铁路工作时曾有两名保镖，其中一名保镖阿平（Ah Ping，音译）现在加入了沪宁铁路保卫队。我在上海时，阿平会时刻跟在我身边。我的两个女儿那时在顺德女子学校的低年级学习，我儿子则在附近的中华教堂幼儿园上学。阿阳负责每天送三个孩子去上学。我儿子非常淘气，有时会抱住电线杆不愿上学，除非答应给他买冰糖吃。晚上三个孩子就跟着家教学习英语。

远望着五洲公园里的湖泊，一边继续讨论没完没了的问题，一边欣赏下面的湖景和远景的全貌。

我的部门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它得到了卢毅庭的帮助。卢毅庭是一位高资历的北京官员，早年他在前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梁士诒手下工作时，就被公认为北方政府最优秀的秘书。他曾在北京的交通部工作多年，所以是铁路百事通。正是因为有他担任我组建铁道部时的首席指导兼顾问，我才得以发挥积极突出的作用。除了利用现有的优秀人才之外，我还得到了英国铁路顾问洛克哈特（Lockhart）的帮助，洛克哈特也曾在交通部工作多年。他此次担任铁路交通处处长一职后，交通部给他配备了两名速记员，这样他便不必再亲自书写备忘录了。这也是他第一次掌握行政职权，所以他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帮助我解决了最急需改造和重建的几条铁路上面临的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

在筹资方面，我做了多种尝试，试图找到更多未被开发的资金和物资来源。比如，我从交通部接手铁路管理工作时，我们也接收了一批未出售的陇海铁路债券，面值总计约 100 万美元。这些债券是为改造陇海铁路而发行的，作为庚子赔款中赔付给比利时部分的抵押，这条铁路也是由比利时人投资兴建的。中国的银行家们试图以票面金额 60% 的价格向交通部收购这些债券。当交通部在周会上讨论这一出价时，我提出了反对，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最后，孙科部长授权我按价高者得的标准到上海的国际市场上出售这批债券。

于是我与上海的比利时银行合作，设法以最高的价格销售这

些债券。银行和我都同意先找一家著名的、实力雄厚的经纪商行，以确定的价格买走一半的债券，这样便在上海创造了一个市场价。剩余一半的债券则由这家银行通过柜台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出价不得低于经纪商行购买的价格。本杰明和波特公司（Benjamin and Potts）是英国最大的经纪商行，他们以债券面值 80% 的价格购买了一半债券之后，中国的银行家们便开始以更高的价格争相购买剩余的债券，价格为票面价值的 82% ~ 85% 不等。这样，铁道部就获得债券面值 20% 以上的价值来用于陇海铁路的恢复工作。若非如此，这笔钱就都落入中国银行家们的口袋了。

沪宁铁路是由中英银公司（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 Ltd.）投资兴建的。我与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筹划用分期租用付款的方式购买 100 辆 40 吨级的钢制货车和 9 列机车。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采用分期租用付款的支付方式。

通过竞争性招标，我成功地降低了华北铁路机车的采购价。很快，美国鲍尔温机车公司（Baldwin Locomotive Company）的代表安德森（Anderson）和迈耶（Meyer）开始向我抱怨。于是我向他们承诺，如果下次他们在北方线路采购火车时能提供最低报价，我将试用鲍尔温火车。我提议他们以成本价加手续费作为报价，而不收取佣金，被放弃的佣金部分将计入广告费和他们的商业信誉中。安德森和迈耶采纳了我的提议，并成功赢得了随后的那次招标，从而将鲍尔温火车引入了北方铁路线路。（当时的铁道部次长兼京奉铁路总负责人王征因为干涉军方监控下的京奉铁路的管理事务而被蒋介石突然逮捕，这才让我有机会放手行使我的管理

职权。)

对于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的重建工作，我任用了现有的最优秀的铁路和财务专家来执行此项任务。^① 我们尝试了一切方法来缩减开支和增加收入。为了创收，大部分的被称为“花车”的豪华私人车厢被改造成了普通的客车车厢。这些私人车厢此前是免费供高级官员来往于上海和南京时乘坐的。我们还引入了车次更为频繁的单机组蒸汽式火车来取代上海至吴淞口之间的大编组长列车，这样空余出来的车厢就可以被用到主干线路上拉载更多乘客以实现创收。所有的物资采购均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当时火车煤炭的日消耗量为 500 吨，以前都是按筐称重，如今也改用大型地磅按车称重（若以小型称按筐进行称重，煤炭销售商容易在秤上做手脚，或是贿赂不诚实的铁路雇员）。

另一个问题是麦根路站的承包商体制。监管劳务承包体制是所有车站执行董事的分内之事，但过去有些执行董事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职责。因此，我废除了由包工头提供劳动力的劳务承包体制，代之以劳工合作组织的形式。这样劳工们就能够直接拿到他们的每一分酬劳，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得到包工头克扣之后

① 刘叙棠是广九铁路最有经验的高级交通专家，蔡国祖是津浦铁路最优秀的机车工程师之一，杰克·王（Jack Wong）是川汉铁路最优秀的土木工程师之一，我的老同事陈伯庄是铁道部工程处处长。这些人全被调到上海，组成了中国当时最好的铁路专家团队。巧合的是，他们全都是广东人。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工程交通人才都来自广东。我的老朋友罗泮辉博士仍然担任我的行政秘书，我在香港工商银行的前任经理陈公衡负责总务处。此外，我在粤汉铁路时的前任工程师卢炳玉则担任我的技术总顾问。

的部分工资。这些包工头并不属于什么大型的秘密组织，他们不过是一些小混混，挖空心思用各种手段榨取他人的利益。劳工合作组织避免了无良铁路雇员与包工头勾结剥削工人的情况发生。

沪宁铁路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与中英银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问题，正是后者为铁路建设提供了资金。根据双方的协议，沪宁铁路是由中英双方共同管理的，但事实上中方执行董事只有所谓的监督权，而英国方官员、总经理、总工程师、交通管理员以及列车和物资部门负责人则掌握着沪宁铁路的管理权。过去几年里，在上海的颓废生活方式影响下，英国官员逐渐怠惰因循、疏于政务、官僚作风日盛，还出现了严重的滥用职权现象。在沪宁铁路任职一年后，我决定前往伦敦协商沪宁铁路贷款协议的修正事宜，以促进中英两方高层官员更加密切、优质地合作，从而提高重建沪宁铁路的效率。幸运的是，中英银公司驻华代表 B. T. B. 布思比（B. T. B. Boothby）也认同我提出的联合共管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做出调整的看法。在我的劝说下，布思比非常乐意返回英国协助我起草新的贷款协议。

那段时期，我也在认真地考虑中断我与孙科的来往。我在沪宁铁路任职期间坚决维护铁路公司的利益，树敌太多，因此我在铁道部工作的这段时间与孙科的关系并不融洽。但当蒋介石意欲从孙科手中夺回对铁道部的控制权时，我还是帮助孙科一起抵挡住了这次攻击。当时蒋介石派来的是主席办公室的首席秘书古应芬，他也是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一个亲密同僚。古应芬是蒋介石的联络员，随时负责向孙科传达蒋介石的重要信息。在 1929 年 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科突然派人来叫我。当我到达会议大厅时，我看见他和古应芬两人正在一间会议室里。孙科对我说，古应芬告诉他沪宁铁路的工人将在三天后举行一场大罢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若真有如此大规模的工人罢工，那一定是出于重大的政治原因，而铁道部只负责铁路管理，不应就政治罢工承担任何责任。如果政府想要铁道部来阻止工人罢工，除非下令让驻扎在铁路沿线的军队都听命于铁道部。孙科接受了我的意见，言辞激烈地驳斥了古应芬：政府如果想让铁道部为工人的政治性罢工承担责任，就必须下令由铁道部领导铁路沿线的军队。古应芬无言以对，在这次充满唇枪舌剑的国民党代表大会结束后便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因为孙科并没有迫于蒋介石的威胁乖乖地递上辞职信，而是依然安稳地坐在铁道部部长的位子上。后来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工人大罢工，这只不过是蒋介石为逼迫孙科辞职编造的谎言罢了。

那天晚上，我深入地思考了孙科的处境。第二天，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建议他从两条更为宽广的道路中任选一条以应对蒋介石。第一条路，若他只对铁路方面的事务感兴趣，他就不应该参与政治，一旦他选择这样做，那么作为孙逸仙博士唯一的儿子，应该就不会再有人对他进行任何阻挠，他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铁道部的事务中去。第二条路，如果他不能将自己从政治中抽离，那么就on应该辞去铁道部的职务，然后前往上海专注于政治事业。

如果选择第二条路，孙科就应当网罗天下精英，每天研习国内外大事，然后将他们的观点宣讲给大众。这样大众才会逐渐认

识到他的政治领导能力，他的威望也会随之提升。对此，孙科的反应却是劝我继续替他管理铁道部，他的政治事业不用我操心，好像已经忘了是谁在前一天把他从一场有预谋的政治迫害中解救出来。换言之，他只想继续依赖于蒋介石，做一名普通的政客，浑浑噩噩地度日，而不愿尝试掌控未来的事态发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孙科和他的幕僚们继续在政府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消极角色。他缺乏基本的政治才能和组织能力，永远不可能实现他父亲的雄心和理想。他仍然在不同的时期和地点频繁地更换他的幕僚，却始终没有一个能让他真正成为政坛巨头的长远规划。

由于过度劳累和参与铁道部管理的复杂政治斗争，我最终心力交瘁。一天，我在南京和同事一起吃完午饭后不久就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并且还发现呕吐物中混有血迹。这显然是胃溃疡引发的胃出血。向铁道部请假后，我乘私车返回了上海，路上我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休息。我很少去医院看病，也没去拍胃部的 X 光片，只是在家静养了一段。一天，我和我妻子乘车外出兜风，司机一时大意，竟与一辆电车迎面相撞。在事故中，我右眼上方裂了个大口子，所幸我妻子并未受伤。我们立刻去了圣卢克医院的急诊部，在那里，由我在檀香山的一位老友高医生为我缝了六针。手术过程中我们聊起了檀香山和那里的朋友们。手术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右眼上都没有眉毛，还好后来眉毛慢慢长出来了，很快我也恢复了健康。

在被迫休息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重新思考我的未来。事情已经变得明朗：如果我继续保持与孙科的来往，我将会一直受

他坎坷的政治生涯牵制，结果必然是越陷越深。若他真的拥有领导才能，我很乐意做出牺牲，以求实现更高的共同理想，但孙科显然缺乏领导力这一最为重要的才能。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决定尽快离开他，并在政治上保持自主中立，只希望真正能为拯救中国人民的事业服务。

在我断绝与孙科的来往之前，我还想去伦敦为铁道部和沪宁铁路完成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与英国政府商谈用退还庚子赔款的基金修建更多铁路；第二件是修正沪宁铁路的贷款协议。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Sir Miles Lampson）已经准许我商谈退还庚子赔款之事，他还给英国外事办公室去函，表示支持我的提议。意识到我伦敦之行的重要性，孙科愉快地批准我离开铁道部和沪宁铁路。

当我妻子听说我要去伦敦的计划后，她提醒我要履行我的承诺。我第一次从欧洲返回时曾向她承诺，若再有出国行程，一定要邀请她共同前往。所以在返回南京之前，我就告诉我妻子，如果她能在两周之内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就可以跟我一起走。我们把三个孩子留在上海由我父亲和她继母照顾。铁道部一次性支付了我一笔出差的公费，我妻子的费用则由我自己承担。带着四个大行李箱（三个是我妻子的，一个是我的），我们于 1929 年秋天离开了上海。

第十一章 第二次访问英国

在陈炳池的陪同下，我和我妻子于 1929 年秋天从上海登上了一艘开往马赛的日本船。陈炳池是我在铁道部的同事，他将作为我此次谈判活动的秘书。轮船首先在我们都很熟悉的香港停靠下来，上岸后，我们去拜访了一些亲戚朋友。

当我们忙着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被告知周寿臣爵士正在找我，要向我转达香港总督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约我去英国政府的夏季别墅喝茶的邀请。金文泰爵士从迈尔斯·兰普森爵士那里得知我将路过香港，因此想与我私下讨论利用广九铁路香港段和粤汉铁路广州段开设香港与韶关之间直达列车的事宜。我坦诚地告诉他，广州民众不会赞成这一安排，因为他们担心直达列车的开通将阻碍黄埔作为广州港口的发展。金文泰爵士的回答是，香港并不反对黄埔的发展，因为大型轮船无法通过珠江口在黄埔靠岸，所以黄埔只能是个二级港口，根本不可能与香港的那些能够容纳各类船只的大港口形成竞争。此外，他向我保证香港政府

随时愿意为黄埔港口的建设提供资金，但前提是广州同意开设经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的直达列车。我向总督先生承诺，我从英国返回后一定会将他的建议提请铁道部审议。^①

经过新加坡时，我遇见了橡胶巨头陈嘉庚先生。陈先生曾将他的全部财产捐献出来，在他的故乡——福建省厦门市建立大学。他皮肤黝黑，身材瘦小，但是温文尔雅，有很强的社会意识。他是新加坡贫困华人群体的捍卫者，不仅维护他们的权益，还为他们提供法律和经济上的援助。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6%以上，尽管其他地方已经十分现代化，但是新加坡的华人区还像中国的城市一样落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自福建省厦门市，还有一些来自广州市。富裕的中国人家里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已经高度西化，都是在剑桥或牛津接受教育，然而这些精英阶层此时却没有政治意识，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保持社会现状，维持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②

去往欧洲的海上旅行令我神清气爽，因为这是我多年艰苦奋斗和努力工作之后的第一个假期。过去两年里，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中国的铁路事业上，忙着帮助朋友们维持和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负担。在海面上，我不仅能

① 我并没有为香港和广东之间的铁路联通做什么贡献，因为我回到中国后就离开了铁道部。日本于1937年入侵中国之后，广州方面主动邀请香港开设直达韶关的列车，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② 新加坡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留学英国的华人学生的治理下，现在的新加坡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政风廉洁的城市国家。

够放松身心，还能用所有时间陪伴我的妻子。过去两年里我奔走于广州和南京之间处理铁路运营事宜，把她独自一人留在上海照顾三个孩子，实在对她亏欠颇多。^①

穿越苏伊士运河之前，航行一路平静无事，但是从快要到达红海前的几天，乘客们就已经开始讨论那里的酷热环境。船上的所有乘客都做好了面对恶劣气候的心理准备。我们大约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穿过这段酷热难耐的水域，水面上的热空气扑面而来，令人窒息。当轮船抵达苏伊士运河入口处的塞得港（Port Said）时，许多皮条客登上甲板向我们兜售所谓的导游服务。据传闻，塞得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白人妓女市场，但是我们可不想去亲身验证那些去贫民窟转了一圈的同行旅客回到船上后讲述的故事。船驶过苏伊士运河后，水面又变得风平浪静，我们仿佛航行在宁静的湖泊上。

下一站停泊的港口是那不勒斯，在那里我们参观了庞培古城。包括古罗马妓女聚集区在内的一部分区域是只向男性游客开放的。内墙上画着原始的、感官的、色情的交媾场景，描述了罗马帝国衰败时期罗马人腐化堕落的性生活。

行船的终点是马赛港。这里是北非、印度支那和其他法国殖

① 我们在甲板上散步，聊孩子们的事，还谈到了在重建粤汉铁路过程中我曾面对的一些巨大风险，心情不那么沉重的时候我们也会卿卿我我一阵。我们不怎么与同行的乘客交往，因为我们只想单独相处，我们很享受彼此的陪伴。这次旅程就像是我们的二次蜜月。偶尔我们也和我的秘书一起玩玩桥牌，不过他更喜欢社交活动，在船上结交了很多朋友。

民地在法国的殖民贸易集散中心。我们从这里上岸，准备开始前往巴黎的陆路旅程。在参观完山上的大教堂后，我们就把当天剩余的时间都用来在商业区里逛街，因为这里适合观光旅游的地方并不多，马赛市的很多区域十分穷苦和危险，并不适合女士。

当天晚上，我们坐上了从马赛前往法国首都巴黎的蓝色特快列车。这真是一次令人愉悦的乘车体验。车厢内部打扫得纤尘不染，列车运转高效，餐车上还有美味的食物。卧铺车厢的隔间装饰也很有品位。晚上关灯后，车上也不是如其他列车那样漆黑一片，而是会亮起一盏小小的夜灯，发出柔和的蓝光。这些地方无不体现出法国铁路公司为来法国的乘客提供舒适、便利环境的周到细心。

经过一夜旅行，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到达了巴黎。下火车后，我们带着轻便的行李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我们并没有去旅馆，而是让司机把我们送到了一所家具齐备的公寓。我们是在晨报上看到这条按周出租的广告的。住在这里经济又舒适，而且看门人对我们也很照顾。我们在巴黎待了两周，去了歌剧院，还参观了主要的景点。^①

离开巴黎后，我们又去了布鲁塞尔，在那里我和几位比利时的投资者就陇海铁路的问题进行了几次商务会谈。在布鲁塞尔短

① 一天晚上，我们看完歌剧返回住处时，我决定带我妻子去乘坐一次巴黎的地铁，让她见识一下法国的年轻情侣们是如何在地铁上当众拥抱的，可是她并没有对这种狂热的示爱方式感到惊讶。离开巴黎前，她还买了很多饰物，但是并没有买巴黎女士穿的礼服，因为她一直只穿中式服装。

暂停留的时间里，我们受到了比利时朋友们的盛情款待。次日，我们离开了奥斯坦德前往伦敦，所幸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旅程比较顺利。

我们在伦敦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找到一家食物和供暖都好的旅馆。找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最终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下了。旅馆老板是一对瑞士夫妇，这里的房间很暖和，提供的食物也很美味，我们在伦敦的三个月一直住在这里。我每天早上去开业务会议，下午和我妻子一起参观风景名胜、历史古迹或博物馆。晚上如果没有晚宴邀约，我们会去最好的商业区逛逛，或者去剧院。周日我们经常去海德公园散步，欣赏那里的湖景和风光。^①

在伦敦，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英国外事办公室商谈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一事。我带着迈尔斯·兰普森爵士的介绍信去拜访了英国外事办公室中国科主任维克托·韦尔斯利爵士（Sir Victor Wellesley），却发现他对我的提议反应十分冷淡。幸运的是，我在伦敦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 W. S. 内森少校（Major W. S. Nathan），我可以向他寻求一些建议。内森少校曾是河北省秦皇岛市附近开

① 在英国首都时有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我们在观看一场名为《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剧目时，一名后台工作人员给我妻子送来了一盒巧克力，说是一名演员送给她的礼物。可是我们根本不认识剧组中的任何成员，所以我们很好奇到底是谁送来的巧克力。第二天，我们在旅馆喝茶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问我们是否喜欢昨晚的歌剧，我们这才知道是他送的巧克力，他和他的妻子碰巧也住在这家旅馆里。他的这一善意举动体现了英国人民对游客的友好态度。

滦煤矿的建立者，也是中英银公司的董事。退休多年之后，他于1928年代表北京辛迪加公司（Peking Syndicate）来到中国，与南京政府商谈联合管理河南省内的中原煤矿的事宜。后来他来寻求我的协助，于是我帮他获得了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的支持，从而达成了他的目的。从那之后我们便成为好朋友，而他作为一位大美食家，也向我推荐了一些我在上海和伦敦吃过的最好的法国美食。

有一次我到内森家里去，他给我看了一封陆军元帅赫伯特·霍雷肖·基奇纳爵士（Field Marshal Sir Herbert Horatio Kitchener）的亲笔信。在信中，基奇纳元帅表示他想到远东地区为中国组建一支现代化军队。假如基奇纳元帅的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亚洲的历史有可能就会是另一番模样了。内森还告诉我，中国海军在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赢得了第一场战役，但日本舰队发现中国海军在赢得胜利后并未乘胜追击而是掉头驶离，于是日本舰队才又调转船头将中国的军舰击沉了。事实上，中国海军没有继续追击的原因是他们在之前的对战中已经用光了所有的弹药。

午饭过后，我将我在外事办公室维克托·韦尔斯利爵士那里碰壁的事情告诉了内森少校，他建议我去见外事办公室顾问弗兰克·阿什顿·格沃特金（Frank Ashton Gwatkin）先生。我问内森少校，格沃特金先生为什么愿意出力帮助中国，他于是告诉我，格沃特金先生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担任参事，但因为出版了两本有关日本的著作而变成了日本政府的眼中钉。虽然格沃特金先生被选为前往参加华盛顿会议的英国代表团

成员，这次会议的议题也包括要求日本将山东省归还给中国，但格沃特金先生因为反对日本政府而并未出席。因此，内森少校凭直觉认为格沃特金先生会愿意帮助我。

格沃特金先生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牧师而非外交家。他专注而充满同情地听取了我关于退还庚子赔款的提议，然后在十天之内就起草了一份关于退还庚子赔款的初步协议。他为英国政府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我们要利用一部分退款在伦敦和香港宣传中国文化。我没有请示南京政府就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条件。

中英银公司十分赞成修订沪宁铁路的贷款协议。此时该公司的驻华代表 **B. T. B. 布思比** 也返回了伦敦，帮助我商谈新协议。公司董事会主席查尔斯·埃迪斯爵士 (**Sir Charles Eddis**)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告诉我，中英银公司没有代表企业债券持有人修订贷款协议的法定权力，若要修订贷款协议，除非首先获得法院的批准。我告诉埃迪斯爵士，英国和中国就如同一对老夫老妻，都不想在法庭上大肆宣扬他们的意见分歧，而是更愿意通过友好协商来修订贷款协议，以便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新情况。由于埃迪斯爵士也担任外事办公室的咨询顾问，我建议他提请英国政府将此次谈判作为一次外交议题来处理，这样双方便能够就贷款协议的修订事宜相互交换意见，而无须申请法院的批准。于是埃迪斯爵士去了外事办公室，争得了针对我的提议的许可，我们也得以继续推进敲定新协议细节的工作。根据修订后的贷款协议，中方官员有权参与沪宁铁路的管理，本来高达 6% 的属于公司债券持有人

的利润率也被大幅降低。每天早上，我都会去位于朗伯德街3号的怡和洋行办公室参加和中英银公司代表的会议，会议一直持续至中午。结束上午的工作后，我们会一起去吃午饭，下午则不再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我觉得在伦敦出席会议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因为有足够的时间为下一次会议做准备。最后，双方代表完成并草签了修订协议，我的伦敦之行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埃迪斯爵士为我准备了一场正式的送别晚宴。中英银公司的主要经营企业，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和怡和洋行的所有重要成员都携他们的妻子出席了这次晚宴。那是一场英式晚宴，男士们都打着白色领带，女士们都穿着晚礼服。每当有宾客到场时，男管家会报出他们的名字，每位男士还会收到一个小信封，信封里装着他们在晚宴上将要陪同的女士的名字。我坐在女主人查尔斯·埃迪斯夫人的右边，我妻子则坐在男主人埃迪斯爵士身边。而她的另一侧则是我的好朋友内森少校，他向我妻子讲述不少他在中国生活时的趣事。埃迪斯爵士、我本人和其他一些宾客致了祝酒词，所有人都认为沪宁铁路贷款协议的修订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事，它必将为中英关系开辟新的纪元。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埃迪斯爵士和我进行了一次密谈，我们探讨了影响中国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危险。我告诉他，如果南满铁路能够实现国际化，那我们就能够消除日本对满洲的控制，从而也就能掌握防止日本未来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主动权。埃迪斯爵士认同我的论断，认为如果 J. P. 摩根公司 (J. P. Morgan & Co.) 的托马斯·W. 拉蒙特 (Thomas W. Lamont) 能够合作的话，就有

可能实现这一计划，因为无论在伦敦还是纽约，南满铁路的债券都已经出现了浮动。埃迪斯爵士就我的提议给在纽约的拉蒙特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并请我代为转交。可是几个月后我从加拿大顺路经过纽约，见到这位著名的金融家时，他并不看好我的提议，也根本不支持南满铁路国际化的方案。

1929年的圣诞节当天，我们搭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的公爵夫人号轮船离开了利物浦前往蒙特利尔。那年冬天，大西洋上的风浪很大，我们的船上又只装了一些轻量货物，所以整个航行过程颠簸起伏。到了晚上，巨大的海浪猛烈地拍打着轮船底部，仿佛轮船撞到了岩石上一样。我妻子被惊醒后就再也不能入睡。当我们的船终于到达蒙特利尔后，她开心极了。

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我们在温莎酒店住了大约一周时间。一天早晨吃过早饭后，一名记者在酒店大厅里采访了我对中国的看法。当时我妻子坐在我旁边，戴着她从巴黎买的帽子，穿着时髦的法国女鞋和中式旗袍。第二天，我在报纸上寻找对我的采访时，却发现半个专栏都用来报道我的妻子了，报纸上详细描述了她的魅力、美貌和穿着以及鞋帽，却对我的采访只字未提。那个记者很明智，他没有报道我对中国的看法，因为他知道相较于对我的采访而言，读者们对美人和她们的衣着要感兴趣得多。蒙特利尔的氛围就是新大陆上的巴黎翻版，因为在这里生活的法国人保留了很多法国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欣赏美女。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蒙特利尔。我访问了该

公司的铁路管理部门，提议皇后号轮船在沪宁铁路设在吴淞口的港口靠岸，届时那里将对驶向上海的皇后号轮船开放（当时所有大型客船都是在吴淞口以外就抛锚停船的，那里与上海之间还有数英里距离，因此去往上海的乘客只得再搭乘汽船）。如果皇后号轮船能够在沪宁铁路的吴淞港口靠岸的话，乘客们便能够乘火车直接到达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上海北站。这一提议对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和沪宁铁路两方都有益处，于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承诺将研究这一提议的可行性和经济优势。我们一行人也因此有幸作为公司的客人，在当年冬天穿越了加拿大。

最后我们从温哥华登上了加拿大皇后号轮船返回中国。途经檀香山时，我母亲也加入了我们，因为她想与我父亲一起在上海生活。在船上我还遇见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他刚刚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在横渡太平洋的漫长旅途中，我们彼此相互熟识了起来。在到达上海之前，他邀请我担任中国银行在上海的分公司——新华银行的总经理。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准备重新进入金融领域。

第十二章 重返市政服务

我发现要想彻底脱离好朋友们的政治活动似乎很难，结果就是我不得不收回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做出的加入新华银行的承诺。1930年初的时候，我的老朋友，也是时任浙江省省政府主席的政界元老张静江坚持邀请我出任杭州市市长。杭州市是浙江省省会，也是著名的旅游中心。^① 杭州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以其美丽的寺庙、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著称。从隋唐五代时期起，中国其他地区的富裕人家为躲避连年不断的战乱纷纷涌向这里避难并定居下来。杭州在中国是个家喻户晓的地方，常言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盛产精美的丝绸和著名的“龙井茶”。龙井茶出自地处丘陵地带的龙井村，那里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杭州还因其保存良好的大型寺院和佛塔而闻名，这些都彰显了佛教对这片地区的巨大影响。

^① 据我所知，国民党统治时期所有省长、市长等都不是通过选举任命的。

我保留了我们在上海的房子，同时又在杭州租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别墅，然后举家搬到了这里居住。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尤其喜欢去西湖划船，累了的时候就到湖边别墅里歇歇脚，喝杯茶。湖边别墅习惯上是对游客开放的，别墅的主人们还会以简单的茶点款待客人。除了游湖，我的家人们还坐着轿子参观了所有著名的寺院和佛塔，或者是乘坐汽车和黄包车到城外更远一些的地方游玩。

杭州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没有供水系统，也没有下水道系统，甚至连市政大楼主楼都没有配备现代化的卫生设备。我作为市长，上任后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市政府员工修建能够正常使用的抽水马桶、洗面盆和淋浴设施。这样他们就能在这里使用这些家里没有的设施了。^①

那时，张静江主席已经渐渐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而蒋介石则在张静江身边安插了一个民政厅厅长朱家骅和一个教育厅厅长陈布雷，以保证他自己在浙江省内的利益不受损害。张静江主要依赖于他的行政秘书刘锡心和建设厅厅长霍亚民来管理浙江省的政务。刘锡心是从法国归来的留学生，霍亚民则是一位金融家。刘锡心、霍亚民和我成为与张静江关系最紧密的顾问，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解决浙江省面对的一些重大难题的办法。蒋介石和张静江之间的冷战一直持续到 1938 年张静江被迫辞职为止。日本

^① 我选用了我的一些老朋友在杭州市政府工作，包括香港工商银行前任经理陈公衡、前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卢炳田，还有沪宁铁路的前职员马少怀和王向辰。

侵华战争爆发后，张静江自愿离开了中国，一直居住在纽约，直到 1950 年去世。表面上蒋介石和张静江关系融洽，但实际上他们处于两个极端，不但性格迥异，政治主张也完全不同。简单来说，蒋介石是独裁主义者，张静江是自由主义者；蒋介石控制着国民党，手握实权，而张静江作为政界元老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则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两个人并没有公开决裂，因为张静江去美国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他的政治事业。

上任后，我发现杭州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困难。这里的富裕人家都不缴纳市政税费，由于警察是受省政府领导的，所以市政府也无权派遣他们去催缴税费。为了彻底铲除这种特权，我和张静江主席商定将警察划归市政府掌控，这样就可以派他们到拖欠了市政府税款的人家催缴税款。此外，我们还选出了一些拖欠税款的大户，并将他们的名字公布在日报上以施加压力。这两种办法之中，哪一个都会让这些大户人家感到有失颜面，于是他们只好乖乖缴税。有了这笔额外收入，市政府不但改造了杭州的街道，还在郊外修建了更多的通路，方便游客使用。

我在杭州暂居的时间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每天下午拿到上海送来的报纸后，我会开车去寺庙、道观或者某个风景名胜，在那儿读世界各地的新闻、放松身心或静坐沉思。到了晚上，我一般会在张静江家里待上一个小时，一边看他练书法，一边和他讨论国内外的问题。张静江尽管双腿瘫痪，但精神上仍是个积极活跃的人。他坐在椅子上让人抬着去这儿去那儿，他甚至还靠这种方法，随着北伐军一路从广州走到了长江流域。张静江还是一

位伟大的学者，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普通话。在强烈的爱国情怀驱使下，他从清末就开始用自己的个人财富支持革命事业，也正因如此，他被公认为最受尊敬的政界元老之一。他慷慨大方、休休有容、胆识过人、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我们有着类似的人生哲学，所以能成为亲密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

一天晚上，我在聊天时告诉张静江主席，我伦敦的朋友们告诉我国际联盟可以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但在我返回中国向孙科汇报时，他却并不支持这一项目。张静江立刻提议我应该帮助浙江省获得国际联盟的技术支持。于是我去了上海，请求中国政府的顾问弗雷德里克·怀特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作为浙江省和国联的联络人。怀特爵士顺利地完成了和国联之间的初期准备工作，国联也准备好向浙江省派遣专家。但由于胡汉民的反对，张静江最终并没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胡汉民指控我把国联的代表请进中国是为了要控制中国。为了不使张静江主席感到为难，我主动提出辞去杭州市市长的职务，但张静江拒绝了我的辞呈，他向我保证胡汉民在政治上伤害不了我们，并表示他会就我的提议承担全部责任。后来，宋子文于1932年6月担任了行政院代理院长后，发现浙江省本来要接受国联技术援助的提案，当即就批准了这一项目，但是他把收到的援助用在了全国各处，而非浙江一个省。这次事件揭示出一些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愚昧无知和狭隘偏见，他们对一切外来援助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哪怕这些援助是有益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的。

1930年底，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张静江不得不辞去了浙江省省政府主席一职。于是我也辞去了杭州市市长的职务，返回了上海。我拜访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群，他邀我为他整顿上海市财政局，因为当时民众长期拖欠税款的情况很严重。我是通过我们共同的朋友杨永泰与张群熟识的，那时他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而我是铁道部行政处处长。张群是蒋介石最初的三个结拜兄弟之一。^①他是一个耿直、清廉的公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为张群工作十分值得，因为只要你恪尽职守，就能得到他的支持。他的妻子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崇尚民主政治，具有社会意识，所以张群具有的一些进步保守主义思想无疑是受到了妻子的影响。作为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一方面，张群尽其所能为蒋介石谋取利益，另一方面，他很少管闲事，也从不在家事上给蒋介石提任何建议。除了自己的亲戚和儿子们以外，蒋介石给予了张群极大的信任。自然而然地，张群也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心腹。多年来，无论蒋介石得势还是失势，张群一直是他的知己密友。在政治上，张群是“新政学系”的杰出领袖，新政学系是一个关系十分紧密的政坛盟友组织，外人对其知之甚少。^②由于该组织的一些所谓成员从未公开承认与该组织的关系，因此这一组织一直是政坛中的一个谜。尽管政治风云变幻，但是这个组织中的显赫成员们一直手握大权，他们其中一些现在转投了共产党政府。

① 另两位分别是被袁世凯在上海杀害的革命烈士陈其美和上海市前任市长黄郛。

② 杨永泰和吴铁城是这一组织中另外两位我熟悉的有能力的领导人。

1931年初，我接管了上海财政局的工作，并且发现拖欠税款的人大多是有权有势的士绅或以敲诈勒索为业的混混。为了从他们手中收回他们逃欠的税款，我选择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告上法庭，目的就是让他们丢面子。这一史无前例的法律行动收到了令人振奋的效果，拖欠税款的人纷纷前来补缴，政府马上就收回了200多万元被拖欠的税款。为了增加上海市的财政收入，我坚持由政府部门直接收缴被拖欠的税款，取消了往届官员把有油水的差事分派给混混们的做法。以前，割头税的征收工作就是被分包出去的，后来被以王小赖为首的集团所垄断，而王小赖又是臭名昭著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亲信。我专门指定将割头税的收缴工作收归政府就是为了表明，我绝不会遵从任何代收税款的流氓集团的规则。后来，小混混们开始鼓动屠宰户们闹罢工，但因为我的新税收政策受到张群市长的全力支持，罢工并未起到什么作用，而且很快就结束了。税收政策改革获得了成功，过去那些将征税工作分包给小混混，使他们有机会从纳税人身上得利的做法也被废除了。

为了给城市警力提供资金，我还引进了一套新的、效率更高的租金税征收体制，即每三个月预收一次租金税。具体来说就是，以每三个月为一个征税周期，在每个征税周期的最初两周内，纳税人必须给财政部门开出支票或是亲自去现场缴纳税款。若纳税人未在两周的付款期内缴纳税款，财政部门就会派人上门征收税款，而且还要加收上门费。实行这套征税制度后，财政部在两周的付款期内就收到了大约3/4的应缴税款。这样一来，征税部门花

费的人力少了，征收到的税款却多了。市政府有了可支配的资金，也就无须向银行寻求临时贷款来应对突发危机了。

1932年，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起攻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从1932年1月到3月对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在此期间，我邀请了我的老朋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壁约翰爵士从中斡旋，也力促中日双方停战。在那场短暂的战争中，中国士兵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展现了他们敢于对抗拥有现代化武装和军事设备的敌人，哪怕是敌人有着压倒性优势，他们也绝不退缩。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成功抵挡了日本在上海持续三个月的昼夜空袭和海上袭击，力保吴淞要塞不失。可惜的是，蒋介石在1934年福建事变后便解散了这支英勇善战的广东军队，只因为他不放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有这样一支由广东人指挥的军队。

早在日军入侵上海两个月前，张群就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吴铁城接任了这一职位。我想要返回南京继续协助张静江，担任掌管全国的电力企业的建设委员会的行政秘书，但吴铁城一时却找不到接替我担任财政局局长的人选。由于日军入侵，上海市政府已经破产，战况最惨烈的闸北区急需巨额资金重建，警署和宪兵队的工资也已经拖欠了很久。在这种举步维艰的形势下，上海市的前任市长张群和我的另一位密友杨永泰说服我留在上海协助新任市长。张群甚至在一次密谈中对我说，如果我不愿意做二把手，可以取代吴铁城的市长之位。在这些朋友的劝说下，我决定继续留在上海，担任吴铁城的财政部门负责人，因为我不愿意从一个20多年的老友手中抢走他的位子。

战争结束后，为了重建满目疮痍的上海市，吴铁城市长邀请了一些重要的市民领袖到重建委员会中任职。尽管每周都开例会，委员们也都积极发言，但这些不负责任的委员们并没有制定出一套具体可行的城市重建计划。预见到重建委员会的这些委员们商议不出任何有用的办法，我在私下里尝试以海关总署每年分配给上海的港口税费作为抵押发行一批 600 万元的公债。英国著名经纪商行本杰明和波特公司曾在三年前购买了比利时的赔款债券，我利用了我和他们的关系，成功说服他们以票面价值 80% 的价格承保这笔公债，然后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提供这笔贷款。那时，中国的债券在伦敦的交易市场上大概以票面价值 60% ~ 70% 的价格出售。很多银行家虽然是重建委员会的委员，却不肯主动支持城市的重建，但是贷款协议签署后，这些人全都争先恐后地从本杰明和波特公司购买债券。几个月后，我又利用向黄包车夫收取的许可费作为抵押，由美国的经纪商行新丰洋行（Swan, Culbertson and Fritz）以票面价值 90% 的价格承保了另一笔 400 万元的公债。

在我的斡旋和联络下，纽约国外电力和股份公司（Foreign Power and Shares of New York）下属的上海电力公司与上海市政府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上海市政府特许上海电力公司向“界道路”供电。所谓“界道路”就是指由公共租界政府在中国控制区域内修建的道路。这些公路的用电过去虽然也是由上海市电力公司提供，但并没有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认可。协议的达成使得上海市不但可以收到一笔特许费和每年的年费，还能收到一笔 120 万元的贷款，用于为中等收入群体修建六个现代化居住区。这一住

房建设项目将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完成。

有了新筹集的 1000 万元后，上海市终于可以重建经受战争摧残的闸北区，并启动了新市政中心的修建工程，包括市政大楼、运动场和公园。

我告诉我的同事，上海应当在伦敦或纽约发行一大笔公债来筹资重建吴淞港，以代替外国租界和上海市的其他港口。但是，想让南京方面的高层统治者来慎重考虑和接受这样一个先进想法的时机显然还不成熟。后来南京政府在这种落后的心态下又拒绝了我的另一个提议。那时我与一个感兴趣的法国人谈妥了协议，由他出资修建一座连接浦东和上海北部的南市的跨河大桥，但是我向行政院提出的这一提案却没有获得通过。我的政策理念是为上海获得尽可能多的国际投资，这不仅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也是为了获得强国的外交援助，以防止日本未来对中国发动进一步军事入侵。

我在上海市政府任职期间，还对宋子文和孔祥熙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是蒋介石的襟兄弟，也是政府高官。宋子文任民国财政部部长，而孔祥熙则任行政院长。上海市首次发行 600 万元的公债时，必须先经过宋子文的批准。宋子文批准发行公债的条件就是其中 100 万必须无限期存入他领导之下的民国中央银行。直到 1933 年孔祥熙接替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部长后，上海市政府才得以取回这笔款项。我亲自去拜见了孔祥熙，告诉他中央银行扣住这笔钱绝非明智之举，而是应该把钱用于上海市的重建工作。他听完我的理由后，立刻下令解冻了这笔存款。我和宋子文之间还有

一次不愉快的经历。那时孔祥熙邀请我担任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是在经济萧条期可以向借款人提供金额不超过500元的小额贷款，资金的来源是财政部和银行协会建立的基金。那时孔祥熙掌握行政权，而宋子文则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在我成为贷款委员会主席之前，宋子文曾邀请我去拜访他。见面后，宋子文让我谈一下贷款委员会提供小额信用贷款的最好方式。我坦诚地回答道，最好由中国银行全权负责调查贷款对象的信用状况，因为中国银行具有这样的资源和渠道。宋子文则直白地告诉我，中国银行不愿承担因为拒绝向那些信用差的贷款对象提供贷款而树敌无数的后果。我冷冷地说，那么为了公共的利益，由我来承担树敌的责任好了。

在与孔祥熙的来往中，我发现他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绅士。我还清楚地记得与他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一天，吴铁城市长打电话告诉我，孔祥熙邀请我去他在上海的家中面谈。我于是应邀前往，他说他听闻了我在公共事业工作上的良好声誉，尤其是在英美银行界的声望，希望通过我与外国的金融界进行联系，因为他打算在没有贵金属储备的情况下发行纸币，来为抗日战争做准备。他还补充说，我是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公众并不把我视为他的亲信。孔祥熙还说宋子文反对他现行的政策，并询问了我对此的看法，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服务，所以比较有发言权。我回答说，国难当头，民众一定会支持他的货币控制政策，并将其视为抗日爱国之举，因为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受侵犯。为了感谢我的配合，

孔祥熙希望我接管造币厂，但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在担任钱币司司长时就曾管理过造币厂。不过，我向他承诺将无条件地帮助他。（这次会议是我与孔祥熙之间长久友谊的开始，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几年前他去世为止。）后来，他又邀请我接管国家彩票事业，当时国家用销售彩票筹来的资金扩充空军力量。我感谢了他的抬爱，但是建议他停止销售国家彩票。我提出可以发行国家有奖债券来代替彩票，国家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小额利息，并设立少数大额奖励。由于彩票是有赌博性质的游戏，绝大多数持有人会不断地购买甚至不惜花光全部家当，所以我基本上是反对发行彩票的。我向孔祥熙说明了我反对彩票的理由，但他为发行国家彩票寻找了各种借口。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国家彩票是他从前任领导宋子文手中接管的，除非他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否则无法废除国家彩票。

我在上海待了四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上海市的两任市长张群和吴铁城都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并授予我其他同事所不曾拥有的权力。上海市政府负责为南京政府处理重要的外交事务。张群后来被调到南京担任外交部部长，但是他依然要依靠上海的老部下在上海的国际圈内为他联络疏通。我和我妻子就代表我的老领导张群出席了很多外交活动。

我是 1934 年初离开上海的。在那之前六个月，为了改善上海市的财政状况，我接管了土地局的工作。当时悬而未决的土地权益积案已经多达 3000 多件，土地局的注册费收入也出现了下降。造成案件拖延的原因是按照当时的规定，提交土地权益注册申请

时必须附一份手写申请书。由于申请书并没有固定格式，民众不得受制于土地局的一些小官僚，而这些官僚则通过尽量拖延申请程序以从中攫取非法利益。于是，除了一些非常复杂的个案之外，我废除了手写申请的规定，而是针对每一种特定的土地交易类型制定一份简单的固定表格让申请人填写，以供土地局记录土地交易情况之用。对于民众来说，填写表格的方式方便得多，所以我任职三个月内就理清了积压的 3000 多件案件。民众们十分认可我在任期间签发的地契，并将这些地契作为证明土地所有权的决定性证据。1937 年至 1945 年日本占领上海期间，这些地契甚至被作为可流转的票据使用，成为人们投资的对象，因为日本侵略军和南京傀儡政府所发行的货币既不稳定，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在上海市政府的任职于 1934 年中期意外结束，当时上海市前任市长和时任外交部部长张群突然给我发电报，要我前往南京与他商议一项重要的紧急事务。应他的要求，我接受了一个新职位，而这个职位是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想过要担任的。

第十三章 重组航运的意外来电

当我应张群的电报邀请到达南京时，他告诉我几年前被政府接管的轮船招商局此时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董事会的所有成员和总经理都向政府提交了辞呈，因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威胁说要取消该公司对其财产和轮船的抵押品赎回权，因为轮船招商局已经欠了这家英国银行 1600 万元的债。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大的、最著名的航运企业，由清朝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李鸿章建立，起初是为了从上海向华北运输大米和其他粮食时不再走大运河而改由海上运输。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的组织工作委派给了来自广东省香山县唐家村的唐廷枢。唐廷枢是一位杰出的人才，曾在湖北汉阳修建铁厂，还在天津附近的唐山开设了煤矿。唐廷枢从香港的机械厂和造船厂招来广州工人，以建设这些重点产业，并帮助他的老乡们在上海、汉口和华北的机械厂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过去几十年里，他们的后代都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好的技师。

早期的轮船招商局由精干的广东人管理，所以业务蒸蒸日上。它的轮船在太平洋航行，也经常驶往旧金山。但是随后的几年，盛宣怀获得了招商局的控制权，由于总部和全国各地分公司里的官员多有贪污腐败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公司业绩开始下滑。到民国政府接管该公司并开始重组之时，这家航运公司的状况已经是混乱不堪了。此时，随着董事会成员和总经理提出辞职，轮船招商局更是面临着新的危机。公司急需的是一个既能维持公司运转又能说服英国银行家们暂缓取消公司的抵押品赎回权的人物。担任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还是一项十分危险的工作，因为轮船招商局一直受制于青帮。青帮不但经营赌场和妓院，还参与上海和重庆之间的毒品贸易。清朝末期出现了大量帮会组织，许多都活动在上海和天津之间的海岸沿线以及长江流域。帮会控制了这些地区的所有赌场、毒品贸易和白人妓女交易。青帮是规模最大的帮会之一，其控制力已经渗入了轮船招商局的运营，控制着上海五个码头的作业，即两个公共租界码头，两个浦东码头，还有一个法租界码头。轮船招商局的两位前任经理就是被青帮暗杀的；他们还会逼迫董事会默许他们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干预轮船招商局经营的要求。而这些都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管理不善和腐败问题出现在公司的各个地方，导致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裙带关系。张群告诉我，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已经向蒋介石推荐了两名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候选人，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现在，俞飞鹏请张群帮助寻找一个有能力担此重任的人，于是张群便告诉俞飞鹏，我是整顿公司混乱现状并找到向英国偿付拖欠已久贷

款的解决办法的最佳人选。

因为我没有丝毫航运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对接管轮船招商局一事并不感兴趣。我甚至不知道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总部地址。因此，张群的提议成为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意外。我第一个反应是拒绝这个提议，但重新思考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提议，因为轮船招商局最初是由广东人组建的，后来在其他省份人士的管理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一个广东人，如果我拒绝掌管这个企业，一定会让我的老乡们感到失望。尤其是对于蒋介石而言，邀请一个广东人领导如此重要的国有企业实属罕见。张群和俞飞鹏带我拜见了蒋介石，他欣然同意了对我的推荐，并且告诉我会在公司重组方面给予我支持。青帮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此我在这次见面时并没有向蒋介石提及这个重组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障碍。

我之前从未见过交通部部长俞飞鹏，因此不确定是否能够与他愉快地合作。他是蒋介石的表哥，曾在北伐战争时期担任军需署署长，在和平时期就负责为蒋介石解决一些棘手的麻烦。他做事缺乏系统性，对现代运输和现代通信也知之甚少，不过他算得上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执行困难的任务时严格而又勤勉。由于对海运的无知，他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但是渐渐地我可以通过每天从上海给他写信的方式向他说明我的工作内容。他曾经向我们下达过一些不可理喻的命令，比如只许租用悬挂中国国旗的船舶之类的。我的一些同事对他忍无可忍，纷纷劝我放弃这份工作，但我决定不受他的干涉，尽力履行我的职责。

张群邀请俞飞鹏和我共进午餐，并讨论轮船招商局面临的问

题。席间俞飞鹏诚挚地邀请我帮助交通部应对轮船招商局面临的危机。我返回上海后，吴铁城市长对我即将离开上海市政府感到遗憾。他建议我雇用尽可能多的保镖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提议由上海市政府来为我提供安保人员。他提醒我一定要格外地小心，铭记中国的俗语——一而再，再而三。换言之，轮船招商局的前两任总经理均死于暗杀，我作为第三任总经理，很可能会面临相同的命运。我感谢了他的建议，但没有接受他为我安排的保镖，因为我想在接管轮船招商局时也保持自己的平静和沉着。

就任后，我首先研究了拖欠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 1600 万元贷款的问题。结果发现，以前每当银行催还欠款时，新上任的总经理都会就未能清偿贷款而向银行道歉，然后恳请银行延长还款期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轮船招商局和银行都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恶性循环。最后银行的耐心终于被耗尽，并决定向轮船招商局发出正式通知，宣布取消招商局对其财产和轮船的抵押品赎回权。

我之前曾在沪宁铁路公司工作，而沪宁铁路又是由中英银公司投资兴建的，且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关系密切，因此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管理层和我之间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听说我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之后非常高兴，并且完全相信我能够找出一个清偿拖欠贷款的办法。不过，我没有就贷款一事直接与银行进行商谈，而是先找到了英国商务专员路易斯·比尔爵士 (Sir Louis Beale)，请他帮忙在轮船招商局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之间进行协调，以帮助双方寻找到一个能够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满意方案。路易斯先生的回答很简单：欠债还钱。我告诉他，问题

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轮船招商局既有有担保债权人，也有无担保债权人。虽然我名义上是总经理，但实际上我更是一个债务清算人，必须全面调查公司的所有贷款。作为轮船招商局最大的有担保债权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将首先被邀请与我一道寻求清偿公司拖欠他们贷款的方法。由于来自伦敦的著名英国政府财政专家利思·罗斯（Leith Ross）那时正在上海访问，我建议双方邀请罗斯先生来帮助我们制定一个双方都能实施的解决方案。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比尔爵士邀请了利思·罗斯先生和我在华懋饭店共进午餐并进行会谈。当他们要我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时，我首先打趣说，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向轮船招商局出借更多资金，这样轮船招商局就能以此赚钱来偿还之前的旧贷款；另一个更切实可行的方法则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减免还款金额，降低贷款利率，并同意以按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剩余贷款。如果双方都认可第二种方法的话，我会找一个银行集团或寻找一家中国银行作为偿还剩余贷款的担保人。多亏了比尔爵士和利思·罗斯先生在清偿贷款一事上的疏通协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最终同意将贷款的金额由原来的 1600 万元减免为 1000 万元，将贷款利率从原来的 6% 降为 4%，并且同意招商局 10 年分期偿付余额。我说服了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请其下令由政府的中央信托局为招商局担保。因为双方都抱着真诚的态度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且甘愿做出一定让步，所以最终达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轮船招商局之间另一个有争议的小案件

是轮船招商局所签发的一份仓库凭单丢失的归责问题。这个纠纷也同样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得以顺利解决。根据中国法律，轮船招商局不应该为仓库凭单的丢失负责，但英国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因此银行要求适用英国法律，认定轮船招商局为仓库凭单的丢失负责。在我担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之前，双方已经就这一纠纷往来了大量的信函，但并没有达成共识。我于是邀请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经理一起吃午餐，并在餐桌上做出了让步和妥协，即双方各承担一半的损失。在处理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的纠纷时，我的政策是秉持互谅互让的精神，而我的前任总经理们处理纠纷的政策则是坚决捍卫轮船招商局的利益而完全忽视另一方的利益，所以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我发起的另一场财务改革是向金城银行（Kinchen Bank）申请到一笔大额贷款，用于打造三条新轮船，以便与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及其他日本公司争夺内河运输和沿海运输的市场。在有效的管理下，轮船招商局逐渐实现了盈利，这也使得公司能够有信用贷到更多新贷款。

在重组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我尝试使所有的办公室员工和船员变得高效且有纪律性。所有轮船一经装满就立刻下海，以保证投资能实现利用最大化。轮船停靠在码头进行维修时，船长要负责监督轮船的维修工作。所有客票均在岸上的售票处出售，除舱面旅客外，售出的所有船票上都有一个编号。以前，除头等舱乘客之外，所有乘客都可以登船后再买票，所以船上卖票的买办们往往少报实际销售的票数，而把这部分钱款装进自己的腰包，

此外他们还会通过为某些乘客提供好一些的住宿和饭食的方法收取额外的费用。原则上来讲，轮船招商局并不需要雇佣买办，因为买办原本是那些在中国的外国企业雇佣来专门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更糟糕的是，轮船招商局的买办常常也是青帮的成员，因此他们的权力甚至比分公司经理或船长的更大。我发现轮船招商局的基层员工中已经有青帮成员渗入，并且公司的高层领导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勾结和贿赂的现象。作为新任总经理，我决定展现我的强硬手腕，并且表明我拥有警力支持。以强硬而果断的方式处理我面临的问题后，我发现我其实并不需要南京政府的协助，因此，南京政府也就没有理由对公司的管理层说三道四了。

为了协助轮船招商局的重组，交通部给我派来了一批技师学校的毕业生。我给这群学生分配的任务是研究导航、客运和货物运输。在过去，学生并不受轮船招商局的欢迎，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我的政策是只要他们表现良好，就给予他们合理的待遇。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培训，这些学生被任命为码头、轮船和仓库的巡查员，我要求他们直接向我做定期报告，并提出一些改善码头、轮船或仓库状况的建议。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都变成了我的“眼睛”。我从这些学生中挑选出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然后任命他们为客船上的事务长，以取代已经被我解雇了的那些买办。这些学生事务长们接管了以往买办们的职责，贯彻执行我的制度，负责收检客票，按照票面上指定的等级为乘客提供相应的住宿。这就是我用来瓦解帮派成员权力的技巧之一。

对河运的下一步改革是清理赚取非法收入的“茶童”。茶童本

应是河船上为乘客们提供服务的服务员，但实际的情形往往是船上的茶童比乘客还多。他们的主要作用是走私大烟和毒品，以及在港口之间运送他们自己的货物。他们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赚取个人的收入，还经常逼迫乘客为他们提供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支付高额小费。这些茶童都不是由公司雇佣的，因此他们没有工资。他们能够拥有不在船上工作就随意免费乘船的特权是因为他们向买办们支付了大笔回扣。

改革方案的第一步是登记所有的茶童，记录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和个人资料。完成登记工作后，我下令所有茶童要在中国红十字会和上海市卫生局的医生那里接受体检。检查结果出来后，我解雇了所有患传染病、性病、晚期肺结核和其他不治之症的茶童，命令他们回家休息和接受治疗。如此，有大约2/3的茶童都被遣退了，仅保留了服务乘客所必须的人员数量。轮船招商局按月向剩余的茶童支付工资，但是严禁他们在港口之间私带货物或做任何其他生意，同时也规定他们向乘客收取小费的额度不得超过10%。

清理了茶童后，我又把注意力转向了码头上的工人，尤其是那些与青帮有关联的码头工人。青帮最大的据点是上海法租界的金利源码头，所有客船和河船都要在那里停泊。这些帮派成员会向入境旅客收取定额的服务费。例如，帮助一位乘客走下跳板就要收取一元。至于旅客们失窃或存储在这个码头的货物丢失造成的损失则难以计数。

我下定决心要清除金利源码头的这些帮派成员，于是我邀请

了法国的总领事、市政主管和警察局局长共进午餐。我告诉他们我不久将撤走在法租界码头停靠的所有船只，改为停靠在公共租界或浦东的其他码头。这一举动意味着法租界将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他们主动提出将配合我清除金利源码头上的那些流氓。法租界总领事、市政主管和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这是轮船招商局在过去 60 年内首次向他们提出协助要求，他们需要一周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便于他们将金利源码头区域目前安排的警力替换为其他区域调配来的新警力。一周之后，法国警察包围了码头，搜查并没收了大量的走私货物和武器。这样，轮船招商局就重新取得了对金利源码头的控制权。

上海的青帮十分强大，以至于国民党的许多显赫的领导人都与青帮成员有私交，并以政治伙伴的礼遇对待他们。对于轮船招商局的历任总经理而言，上任后立刻去拜访青帮臭名昭著的领导人以请求他们的配合甚至成为惯例。这些青帮领导人包括法租界的黄金荣和公共租界的杜月笙。但是我就任总经理后根本没有理睬他们，黄金荣于是登门拜访，但我碰巧不在家中，之后我连电话也没给他回过。我回敬他礼数的方式就是让他最得力的副手，同时也是招商局在金利源码头的雇员给他传话说：我不在家中做私下交易，如果他见我是为了公事，就应该往我在公司的办公室里打电话。

为了恐吓我，青帮在我办公室前导演了两次武力示威。一天，我正准备离开公司去吃午饭，却看见一群人堵在了我办公室的门口。我看出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会对我的人身造成伤

害，于是我保持了镇静，拨开人群安全地上了车。如果我看见人群就胆怯地躲回办公室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冲进来。吃完午饭回来以后，我立刻解雇了我办公室的所有人员，因为他们看到办公室前的示威人群竟然不向我通报。我调来了一些之前在财政局时信任的下属取代他们。然后我将此次事件通知给了公共租界当局，并要求他们提供警力保护，因为轮船招商局办公室就位于公共租界内。我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再有恶徒出现的话，我将要求中国市政府出动警力。他们向我保证，他们的警察能够维护公司所在地的安定与秩序。第二天中午之前，那群恶徒又出现在我办公室前面，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公共租界的警察获得通知后很快便骑着摩托车到达了现场，驱散了那群恶徒。警察一定是严厉地惩治了参与其中的闹事者，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事件过后，为了防患于未然，我把我在广州粤汉铁路工作时的两名忠诚的保镖调来了上海。我在轮船招商局任职期间，他们一直负责保护我的安全。

第十四章 日军的第二次侵华

1935年，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准备抵抗日军第二次入侵中国。因此，交通部也密令轮船招商局安排船只进入备战状态，每艘船要储备六个月的必要给养以备紧急情况 and 小型维修。然而，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要保护上海和其他港口的码头和仓库的指令，但是我还是自行决定查看了一下有什么能做的。

在甲午战争期间，为了防止日本侵占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和其他财产，政府把轮船招商局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又将轮船招商局买了回来。得益于这一历史先例，我与卫利韩（William P. Hunt）成功达成了一项托管协议，如果日本占领港口，卫利韩将接管轮船招商局在上海的财产管理权。卫利韩此前曾是美国驻华北领事馆人员，此时是上海一位有魄力的货运代理商。他勇敢、机智、充满活力，在战时由他来处理与日本之间的事务再理想不过了。1937年11月底，当日军开始占领上海部分华界时，卫利韩接管了轮船招商局在公共租界的运营。

开战后不久，我为了履行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职责，说服了我的一位好朋友冯炳南促成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组建，来救济从中国政府管辖区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难民。冯炳南是一名律师，也是闸北电力公司的董事和上海银行协会的顾问，他是上海最足智多谋又心系大众的人之一。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在汉口已经组建了国际红十字会，并建议他在上海组建一个类似的组织来减轻战争中难民的苦难。他接受了我的提议并邀请了英、美、法、中各方的重要领导人到他家中，商谈建立一个组委会来负责在上海成立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分会的工作。

我在国际红十字会财务委员会的同事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 W. C. 卡斯尔斯 (W. C. Cassels) 和纽约的美国国民城市银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的查尔斯·R. 贝内特 (Charles R. Bennet)。我成功说服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捐赠了价值 25 万元的中国债券，作为政府的认购出资，这样就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筹来了种子基金，这样红十字会才能够又吸收到 100 多万元的公众捐款。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中国管辖范围内的南市成立了南市难民区来收容战争难民。难民区的成立还得益于耶稣会教士，同时是国际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饶家驹神父 (Pere R. Jacquine) 耐心执着的努力。他是当时与日本占领军进行协商的主要中间人。

作为广东旅沪同乡会 (Cantonese Residents' Association) 的副主席，我还履行了我的另一项职责。我为同乡会提供了 100 袋大米，足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 1 万多名广州难民吃 2~3 个月。如

此大量的粮食是从将其储存在轮船招商局仓库的经销商手中购买的。如果没有担任轮船招商局的领导，就不可能购买到如此大批量的粮食，因为国难当头，国家每天都在征收粮食备战。幸运的是，有广东旅沪同乡会的主席林炳炎的配合，他自掏腰包购买了这 100 袋大米。林炳炎是我见过的最友善、最率真，也是最慷慨的人。他白手起家，成为金条交易市场上最重要的交易商。在战争期间，他向广东旅沪同乡会捐赠了 25 万元善款来帮助他那些受苦受难的同乡。

作为公共租界疏散委员会的成员，我还与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沟通，利用他们的沿海线路船只免费将广州难民送回家乡。

日军登陆上海后，尽管我母亲和我妻子都不愿离开上海，我还是把家人都送到了香港。我自己暂时留在上海，在法租界一处租来的房子中，秘密清理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劝我离开上海，因为连民国政府自己的代表大多都已经离开了这里。我与卫利韩又签署了几份补充协议，以方便他管理轮船招商局。在他家避难几天后，我于 1937 年冬天启程前往香港。

多亏法国邮船公司（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驻上海代理人让·肖谢特（Jean Choquet）的热情相助，我才得以登上他公司停靠在以前属于轮船招商局的码头边的一艘轮船，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偷偷离开上海。这个码头现在已经被日军占领，他用小船把我直接从法租界送到船上，才绕开了把守港口的日军。

为了避免被拦截，轮船招商局的所有海船都在香港寻求庇护。

公司的小型船只已经被政府征收，用来沉入水中以堵塞河道，为的是向日军表明我们永不投降的决心。大型的内河汽船都驶往重庆避难。2000吨级以上的轮船以前从未尝试过由上海或汉口逆流驶向重庆，因为担心长江上游峡谷水流湍急。但是，我命令我的船长们在战争爆发时无论如何要行船前往重庆，因为如果船员继续留在汉口，就一定会被日本人霸占。我告诉他们，如果有好战分子反对我的命令，就对他们说：宁可让我们的船沉在长江峡谷里，也不能留给日本人。有两艘停在汉口的日本轮船被政府俘获后，由我的船队拖着，一起成功地通过了长江上游峡谷处的险流，全部安全抵达重庆。在战争期间，我们的船全都安然无恙，轮船招商局没有一艘船只被强大的日本海军俘获。当时共有4艘“海”字号（Hai's）沿海线路船只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航行，其中一艘是所有船只中最后一个离开上海的。这艘船刚到达上海后三个小时就被命令立刻起航，前往香港避难。我告诉公司员工，他们的亲友都可以免费乘坐这艘船去香港避难，很多人接受了我的这一提议。在战争期间，轮船招商局在香港避难的大型海运船只都被卖给了英国航运公司。

我在香港办事处设立了轮船招商局总部后，就立刻重新担负起了公司运营的责任，而我们的运营资金则来源于卫利韩在上海的经营。卫利韩把法租界的金利源码头经营得十分成功，他对船只停靠和货物存放加收战争险以满足公司的各项开支和债务。

战争中时有意外发生。我在香港时就突然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我离开上海前，我与纽约的美国国民城市银行商议，由他们接管招商局在外滩和福州路上的总部大楼，以免其被日军

占为己有。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招商局曾以这些财产作为抵押向美国国民城市银行借了 100 万两银子（1 两银子约等于中国货币 1.4 元）的贷款。国民城市银行此前从未催还过这笔贷款，而轮船招商局也一直按时支付年息。让我吃惊的是，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经理突然出现在香港，要求我立刻清偿全部贷款，理由是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正从中国撤离，所以要了结在中国的所有业务。经过两周的连续谈判，我终于说服美国国民城市银行接受原贷款金额 1/4 的还款，因为重庆根本无法给招商局提供任何财政援助，我费了很大的力气也只能筹来这么多了。

美国国民城市银行的经理带着他从招商局榨出的最后一点油水离开上海后，我也终于不堪重负而患了重病。银行催要还款一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过去四年里，我承担了太多太重的责任，忙着重组招商局并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一天，当我正要与孙逸仙博士生前的顾问 R. S. 诺曼（R. S. Norman）以及我的秘书陈炳池吃午饭时，我突然出现了严重的不适，胃部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令我感觉仿佛有无数根针扎进去一样。我疼得几乎无法动弹。陈炳池把我送回家时，我的家人都被吓坏了，以为我要死了，因为我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由于他们在香港不认识任何医生，他们也不知道该找谁。我的大女儿坤仪建议去找那位刚从英国回来，与我们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医生，请他对我进行紧急救治。这位医生就是新加坡华人李学良先生，他是一名内科专家，也是我的老朋友蔡昌的女婿。

查出我的血压低于 80 后，李学良医生立刻让我卧床休息，没

有他的许可不能起来。为了减轻我胃部的疼痛，他给我注射了吗啡。在床上躺了两周后，我实在百无聊赖，便无视医嘱，尝试下床走动。瞬间，我感觉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在围着我旋转，好像我是车轮的轴心一样。我被吓坏了，赶紧躺回了床上。我足足休养了三个月，医生才终于许可我下床。^①

1940年，我在香港逗留期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邀请我担任他的政府事务顾问。那时，广东省大半已被日军占领，未被占领的区域只剩北江和东江流域还在广东省政府的控制之下，此时的临时省会是韶关。由于我们素未谋面，李汉魂主席邀请我去拜访他。然而这趟行程并不好走，从香港到韶关花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首先要沿东江北上，然后再走陆路。有一天，当我横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时，我遇见了中美合资企业中国航空公司（Chinese National Airlines Corporation）的肯特（Kent），他有个外号叫“狐狸”。我问他是否能开设一条从香港直达南雄的航线，那里有机场，而且离韶关也近。肯特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还说，这条线路也许真的能够赚钱，因为飞机只在香港加一次油就足够往返，而无须在南雄再进行燃料补给。

我把肯特提供的这一宝贵信息转达给了李主席，他立刻与重

① 被禁锢在床上的三个月里，我的三个孩子每天早上会轮流给我大声朗读中文日报和英文日报。灾难使我们一家人靠得更近，因为我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我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之间的爱。从那以后，我每隔一天就会去香港的海滩边游泳，坚持了两年，我的身体才彻底恢复了健康。我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海滩，教他们游泳。所以，我儿子游泳游得很好。

庆方面联系启动建立香港至南雄新航线一事。于是，在被隔绝两年多后，没有被日军占领的广东省部分地区终于再次与外界取得了联系。这条航线开通后，我乘坐了该航线的第二次航班飞往了南雄。我和肯特一起坐在驾驶舱里，俯瞰着下面的山地。土地上到处都有农民在放火烧秸秆，为的是增加土壤肥力，给种植下一季农作物做准备。虽然肯特和我本来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是经过这一次难忘的空中航行后，我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他身材魁梧，一头红发，脸上长满了雀斑，对待朋友总是友善而坦诚。几个月后，在一次飞往云南省省会昆明的航行中，肯特乘坐的飞机在昆明附近被一架日本飞机击落。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都深感悲痛。他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儿子那时还在香港，后来他们都返回了美国。

当我到达南雄机场后，广东银行的副总经理曾晓风受李汉魂主席委托，代表李主席到机场迎接我。一顿丰盛的晚餐过后，我们在南雄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汽车穿过乡村土路，经过半天的车程到达韶关。李汉魂主席和广东省政府的其他成员盛情款待了我，感谢我帮助他们建立了香港与南雄之间的航线。我在韶关待了几天，在我离开前，李汉魂主席给了我一大笔钱，作为我的旅费。我将这笔钱捐给了由他妻子主持的韶关难民儿童之家。在这次旅程中，我结识了很多朋友。两年后，日军占领了香港。当我在前往重庆的途中再次经过韶关时，这些朋友给了我很大帮助。

在香港生活的那四年半时间里，我多次被重庆政府委任执行复杂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防止在香港的中国船只为日

本人所用。我大概命中注定要来执行这项任务，并在其中发挥突出作用。当时我的任务是将日本船长和军官控制下的六艘本来属于烟台正记轮船公司（Ching Kee Company of Cheefo）的船只在出发前扣留下来。重庆方面在周四向我下达命令，并要求我依据中国法律扣留这些船只。我了解后发现，这些船只计划在周六启航，也就是说我只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来阻止他们的逃离。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不适用中国法律的英国殖民地上依据中国法律将这些船只扣留下来。

幸运的是，我发现轮船招商局持有正记公司的少量股份，而正记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已经将这六艘船出租给了一家日本公司。于是我命令轮船招商局的律师 D. L. 斯特利特（D. L. Strellet）去申请一份阻止这些船只启航的法院禁令，理由是正记公司已经不再是一家合法存续的公司，该公司因为投靠日本已经被重庆政府依法注销，所以它的香港分公司也没有合法权利或权力将这些船只出租。我选择无视重庆方面依据中国法律扣留这些船只的命令，而是根据英国法律提起了诉讼。如果我听从重庆方面的命令，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与香港当局进行外交谈判，而香港当局一心只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外交接触，这样做只会让我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日本在香港的外交力量显然比重庆政府的更强大，到那时，我必然无力再扣留这些船只。既然我们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我就不得不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法果决地处理问题。适用英国法律大大简化了这个案件，法院不仅向我颁发了禁令，许可我扣押船只，而且指定我为这些船只的清算人。日本就法院签发的禁令和任命

我为清算人的判决向香港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结果依然是败诉。随后他们又向伦敦的枢密院提起上诉，但伦敦枢密院依然支持下级法院的判决。这个结果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大获全胜了，但交通部仍然执拗地给我写信强调依据中国法律解决这个案子的理由，显然交通部门某些支持这一行动的高级顾问觉得依据英国法律取得胜诉让他们有失颜面了。最终我给交通部回复了一封令所有指责者哑口无言的回信，我说100年前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不是我的责任，那之后在香港适用英国法律也是必然的结果。这些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不肯承认香港已经不再是中国管辖领域的现状，也不愿面对中国法律不在香港适用的事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经常会影响人们思考的能力。^①

① 中国人的法律概念与西方人的法律概念完全不同。西方国家的法律是由罗马人制定的，旨在管理他们由具有复杂经济、社会和其他利益结构的不同种族组成的伟大帝国。《拿破仑法典》就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目前仍然在很多西方国家适用，甚至包括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在罗马法产生之前，日耳曼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实行的是简单的部落法律。有些部落法律可能也对罗马法律产生过间接影响。

同样地，中国的法律可能也起源于史前的部落法。早期的中国人定居在中国的北方地区，他们的风俗也构成了中国北方地区土著居民的法律。

在一个简单的社会里，人们会推崇品德优良、智慧卓越和勇气可嘉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从古至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一直都是家庭，因此人们一直都是依靠简单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日常行为。

中国不实行英国、美国实行的判例法制度，所以判例没有法律效力，甚至连在一段时期内颁布的法令和判定也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而不是拥有永久的法律效力。

发挥我们的想象，如果自然法加上些现代实践，例如根据合同进行商业贸易等，将来也可以作为中国法律发展的指导方针。

接管正记公司的这些轮船后，我们把船出租出去作为在海港存放货物用的水上仓库。要把这些船只驶离香港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将它们卖到国外，另一种是把它们驶进印度洋。于是我飞往马尼拉，想看美国海军是否能够帮忙。然而菲律宾给我的建议是将香港的这些船只卖给任何愿意出价的买家，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恶化，所有人都认为其他国家将很快加入中日战争。我于是赶紧返回了香港，找到了一个愿意将这些船只在晚上驶出香港的欧洲买家，这样做是要冒着被在香港水域巡航的日本巡航舰拦截的风险的。把这个诱人的报价提交给了交通部后，我便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结果交通部竟然放弃了这次机会。在香港沦陷前，当局拔出了海水阀，将这些轮船都沉入了海港中，以避免它们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在抗战期间，张群来到了香港，他问我对重庆政府应对战争的方式有何看法。我告诉他，政府的繁文缛节过多，各部门官僚都在回避做决定以避免承担责任，需要做决定时，他们就把问题推到上层机关。对于这一糟糕的事态，最直接的改进措施就是让与事件有直接接触的官员做出决定并承担责任。我在政府机构的同事们常常觉得，既然重庆方面相信我的判断，是不是也特别授权我直接决策。其实他们完全想错了，对于我在战争时期为重庆政府处理的每一件重大事项，我因为做决定而承担的责任都比重庆政府的指示中许可我的权责更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做了错误的决定，那么我将有可能失去我的位子，其实那样的话我反而会很乐意提交辞呈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在那段麻烦不断的日子里，我很幸运能够与香港当局友好相处。那里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曾经试图招募我去担任中国海员协会的领导，这是一个有数千名会员的组织，他们都是在英国国家商船队中服务的中国水手。身为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我不得不拒绝了这一提议。^①

我们在香港待的这四年半的时间，对我和妻子而言是一段还

① 在香港待了一年后，我的两个女儿坤仪和文仪在圣保罗学院读完了中专，然后去了夏威夷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日本入侵香港前几个月，我的儿子守仁通过了香港大学的入学考试，英文成绩尤其优秀。但是，由于他只有 15 岁，所以还要再等一年才被允许入学。我不想让他在香港无所事事浪费一年时间，就决定把他送到夏威夷上大学。我妻子觉得守仁还太小，不能送到国外。我问她守仁是否能够照顾自己，我妻子回答可以，然后我说孩子终究是要离开家的、她才勉强同意把她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送走。让一位母亲忍痛与自己深爱的小儿子分离是非常困难的。在日本开始袭击香港前，守仁乘坐美国总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President Line）的最后一艘船离开了香港。他无疑是幸运的。

我们在香港期间，我建议母亲和妻子离开香港，去夏威夷和我弟弟及孩子们一起生活。我母亲不愿离开，而我妻子考虑到要留下来更好地照顾我母亲，所以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留下来。我无法陪她们去夏威夷，因为我不能在中国正处于战争时弃它而去。由于我不能陪在我母亲左右，她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她就回到她乡下的老家去，而且她预测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最多只会持续几年。然而，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所有人都没能预料到，对她而言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几年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在中国掌权五年后，我母亲被定性为地主，被带到批斗会上批斗。当时她已经 85 岁高龄，瘫痪在床，身体虚弱，根本不能参加批斗会。她在乡下的一切财产，包括店铺、房子和 20 多亩地都被没收了。任何人都不能去照顾她，因为作为一个地主，她是国家的敌人。后来，她在饥寒交迫中死在了那间指定给她的屋子里。她太不明智，不知道在如此高龄之时应该和她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完全罔顾“老有所依”的古语。

算美好的日子。每周六晚上，我带她去香港酒店吃饭跳舞。我们在席间轻声谈论家庭琐事，然后跳几支舞再回家。日本袭击香港两天前的那一晚，我们参加了一个慈善舞会，那也是我们在香港半岛酒店参加的最后一个舞会。我们见到了大多数群体领袖，他们和亲朋好友在那里度过了香港大屠杀前最后的时光。

那次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是个周六，我和妻子坐车去了九龙和新界。下午晚些时候，我们乘渡船回到了香港。我的一个朋友问我日本是否会袭击香港。我指了指同一艘渡船上独自坐在自己车中的日本总领事，然后说战事可能不会立即爆发，因为那个日本外交官看起来是那么平和、安详，仿佛丝毫不问世事。他一定是个优秀的外交官，因为我完全被他骗到了。

第二天早上9点，我正打算去办公室，一个亲戚打来电话向我借车，说要去圣玛丽医院接一个朋友，因为日本飞机一直在医院上空盘旋。我告诉他，这一定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在做例行晨练。然而，那个亲戚告诉我飞机已经向医院投掷了炸弹。于是我马上打电话向美国领事馆询问，然后被告知一个坏消息——日本突袭了珍珠港。战火终于烧到了香港。

面对日本突袭香港的这个噩耗，我的第一反应是英国将有能力很好地防卫香港，因为过去几年里他们一直在进行军事训练，而且还在岛内四处修建防御工事和碉堡。不过我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给公司员工提前支付了六个月的薪水，并且开始在家里大量囤积粮食，为长期被围困做准备。我位于蓝塘道的家里很快住满了来避难的公司员工。从战争伊始，我们的饮用水供应就已

经十分困难，因为部分主要的自来水总管道已经被日本飞机投掷的炸弹毁坏。晚上所有灯熄灭后，外面一片漆黑，只有远方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光亮。连续几天的轰炸结束后，我们用强大的双目望远镜从家里往外看，发现九龙已经被完全占领，海港对面香港半岛酒店的旗杆上已经升起了日本国旗。第一次袭击大约十天后，日军横渡海港并在香港北部登陆。负责防守的印度军队十分沮丧，纷纷弃甲奔逃，有些士兵甚至把武器都丢弃在了我家旁边的山坡上。在日本军队发起的猛攻之下，英格兰和苏格兰军队感到了彻底的无助。

又过了两三天，一枚炮弹落在了我们公寓楼的入口处，另一枚炮弹从房顶飞过。炮弹的爆炸声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感觉自己的头好像已经被炸飞了。我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敌人的袭击目标，因为我们这一连串住户都在附近小山的山脚下。日军的炮火十分精准，我们处于炮火目标下的房子随时都可能被击中或摧毁。太阳百货商店（Sun Department Store）的经理蔡昌当时也在我们的公寓楼里避难，我和他讨论了当时危险的形势，我们一致同意离开这个危险区域，躲到他家去才是明智之举。他的家在香港市中心的坚道住宅区。但我母亲不愿离开这个公寓楼，她想留下来和公司员工和朋友们待在一起。她争论说，整个香港岛是一个要塞，因此所有地方都一样危险。我和妻子接受了蔡昌的邀请，住到了他家里。第二天晚上，日本的先遣部队就攻占了我们的公寓楼，在附近楼里杀死了 20 多个人，强奸了大多数的年轻女子，最小的女孩儿只有 13 岁。他们的随军人员，也就是那些韩国马夫，把那

一片地区所有房子都洗劫一空，我们失去了全部的家当。日军烧杀奸掠后的第二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把我母亲从公寓楼里接了出来，安全地送到了我身边。

蔡昌必须去保护他的百货商店。为了不使蔡昌为难，我带着我的母亲和妻子去了另一个朋友家里，在那儿住了两天。香港沦陷那天，我把我的妻子和母亲托付给了这个朋友，自己一个人去了一个表亲刘卓家避难，他在香港西部开了一家粮食店。那里在日军到达前已经有许多流氓大肆掠夺，这些流氓多数来自汕头。当我藏身在粮食店时，我派人去了我的另外一位表亲蔡履枝家，他曾经是革命者，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拜托他在贫民区为我寻一个住处，以躲避日军的抓捕。

蔡履枝在鸦片窟为我租了一间小房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周。我的表亲和他的妻子都住在附近，每天给我带来食物和外面的信息，我妻子则偷偷来看望过我几次。我住的地方虽然阴暗恐怖，但至少相对安全，因为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在鸦片窟避难。重庆政府的许多重要代表都是在他们的住处被抓捕的，他们一定认为我已经在日本士兵在我家附近大楼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中遇害了。在那个昏暗的小房子里，我平和地度过了三周的时间，每天勤勉地研读《易经》，试着去理解书中深奥的人生哲学。《易经》是五部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这本书是我几个月前在商务印书馆的降价柜台上发现的，但直到此刻我才终于有机会细读。

我的表亲人脉极广，他和一个渔船船主商定将我偷渡到澳门。我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普通劳工，穿着工作服，胡子不刮，头发

剪得很短，指甲里也脏兮兮的。早上 9 点我上了船，船上大约有 20 个同行乘客。我只带了一个黄麻袋，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产和几件工装。在船离开香港之前，三名日本士兵下到船上进行搜查，船员告诉他们船要开往附近的青山岛。我旁边站着一位穿着考究、年轻迷人的护士小姐，她带着好几个新行李箱。看着日本士兵翻查其他乘客的财物，抢走他们的手表和其他贵重物品，那个护士吓得浑身发抖，像一片飘零的树叶。我安慰她不用害怕，要相信上帝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当士兵们搜查她的行李箱时，她开始变得镇静，不再那么紧张。检查完她的行李后，我估计日本士兵该检查我的黄麻袋了，因为我是船上最后一个没被搜查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告诉船员可以开船了。这是我在战争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日本人，幸运的是我没有受到他们的无理对待。由于我的沉着镇静，日本士兵没有觉察出我的身份，我得以顺利逃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渔船载着难民们启航前往澳门。大约 2/3 的行程中，我们都在被海盗尾随、追赶，他们还不断向我们头顶上方开枪。船上的船员为了自保想要停下来投降。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得不接管了对渔船的控制。首先我说服船员们相信，如果他们不停船并把我们安全送到澳门的话，我们将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我给他们看了我手里的一张百元纸币，并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些钱平分给他们。然后我劝说船上的其他乘客做出相同的许诺。我们的现金奖励发生了神奇的作用，船员们热情高涨地继续划船，但海盗们依然紧追不舍。为了保护船上的妇孺不被飞来的

子弹打中，我让他们进入船舱，并把行李堆积在他们的四周作为一层保护屏障。所有男乘客则只能平躺在甲板上避免被击中，因为渔船根本没能力向海盗还击。经过一个小时的追逐，海盗们渐渐赶上了我们。他们离得越来越近，只剩下大约 15 英尺的距离时，我虔诚地做了最后一次祷告。信不信由你，奇迹发生了。海盗船突然掉头，不再追赶我们，而是去追逐附近的其他渔船了。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很少祈祷，在这个危急关头，所有逃生出路都被堵死，我努力地做了祷告。仁慈的上帝似乎听到了我的祈祷并做出了回应，也许他想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再多活一些时间，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我不愿想象如果海盗们登上了我们的渔船，我们将会遭遇什么，因为他们素来以对待抵抗者的残暴而著称。事实上，与日本对香港进行的那三周轰炸相比，海盗们的近距离射击对我来说才更是险象环生。

第二天凌晨 1 点，渔船驶达澳门。我下船之前，一个老者走近我，感谢我在船上为他的家人和其他乘客所做的一切，并问我在澳门有没有去处。因为我已经 26 年没来过澳门了，所以我告诉他我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可能会去住旅馆。他告诉我澳门的所有旅馆都被难民挤满了，如果我不介意的话，可以在找到住处之前暂时住在他家里。我接受了他善意的邀请，在凌晨和他的家人一起去了他家。我们吃了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然后就上床睡觉了。经过一路的艰苦磨难，我们疲惫的身体和紧张的神经也终于得以舒缓一下了。

第十五章 避难澳门

到达澳门后，我不得不立即蛰伏起来。我改了名字，白天也不敢出门，多亏了当地多位好友的帮助，我才没有被日本间谍发现，在澳门平静地过了两年。

到达澳门的第一天晚上，我和那个老者的家人一起睡在他家里的大床上。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投靠了我的一个表亲。她是我姑姑的女儿，和她的四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澳门，她的丈夫此时仍然留在香港。我找到了她的住处，她热情地接待了我。她的生活也很拮据，家中甚至都无米下锅，我把身上仅剩的50元钱给了她，把装着我所有财物的那个黄麻袋也寄存在了她家里。之后我领着她的两个儿子出门散步，在海边和居民区转了转。这时迎面走来一对穿着考究的夫妇向我们点头致意。待他们走近，我才发现对方是上海的银行家崔聘亚和他的妻子。

能在这儿遇到老朋友自然令我非常高兴。我向他们讲述了我从香港到澳门的惊险旅途以及我目前的困境。他邀请我到他的家

里吃早餐。一顿丰盛的早餐过后，他给了我一些澳门元、港币甚至银圆，另外还给我的表亲家送去了一袋米。他以前是广东旅沪同乡会的活跃成员。他知道我在战争初期曾为上海的广州难民提供过许多的帮助，因而十分欣赏我。正因如此，他才会竭尽所能在经济上给予我帮助。

那时澳门的重要性陡然上升了许多。这个城市原本坐落于广东省香山县。在过去 300 多年里，澳门曾是中国向西方开放的窗口。自从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澳门的商业地位就大大降低了，但是它成为远东地区的蒙特卡洛，城市的主要收益来源就是赌博和卖淫。这里也是毒品和其他非法商品的走私中心。二战期间，澳门成为日本和西方国家的连接点。日本人想要占领澳门易如反掌，只需调集占领附近地区的日本军队即可。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满足于控制澳门的警务，他们可以随意逮捕中国人，然后把他们押送到沦陷区去。因为澳门周围为浅海水域，只能容纳 3000 吨量级以下的船只，所以它一直只是一个三级港口。在和平年代，有客船和货船定期往返于香港和澳门之间。战争爆发之前，那里曾有一个不错的机场，利用率也很高，但是在战事开始后不久就荒废了。澳门的葡萄牙籍居民大多是中葡混血，而且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英文和葡语。

在我到澳门两周之后，我的妻子来到澳门与我会合。我离开香港后，她和我母亲搭上一艘小船从香港回到了我父亲在中山的老家避难。为了避免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我母亲选择留在村子里生活。由于在香港期间以及从香港返回老家的路途中一直担惊

受怕，而且吃尽了苦头，所以我妻子患了重病。在澳门的两年时间内，我尽全力悉心照料着我的妻子，以期她能够痊愈。一开始，她的头部和腿部都出现了浮肿，医生诊断为肾病，因此不允许她吃肉食。结果由于营养不良，她又感染了肺结核，可是等一位上门出诊的葡萄牙医生诊断出来的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这位葡萄牙医生是当时澳门市卫生局的局长，也是一位高级医师，但即便如此，他的业务水平也并不高。他依然允许我妻子到处走动，而没有叮嘱她卧床静养。在战争期间，澳门的所有医生都是二流、三流的，因为最好的医生都还留在香港。

在澳门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住在刘叙棠的家中。刘叙棠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在沪宁铁路时的同事。他长期居住在澳门，是当地华人群体的领袖人物。

澳门的资源要供养本地居民已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要满足蜂拥到此的上万难民的需求。平常的时候，澳门的果蔬、肉类、及其他食品就依赖临近地区的供应，随着日军侵华后对食品的需求，流往澳门的物资已大大减少，只有一艘在日本海军严密监管下的蒸汽轮船会偶尔运送一些食物到澳门，以免当地居民遭受饥荒。

成千上万的难民在澳门露宿街头，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饥饿。路边的尸体暴露数日都无人掩埋，惹来数不尽的苍蝇，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那真是一种可怕景象。有时略微强壮一些的难民会从物资运输队的车上偷些食物，然后仓皇逃跑。警察对这些小偷小摸通常会手下留情，这毕竟是无奈之举。食品价格已经

飞涨，咖啡和黄油根本买不到，除非是以极高的价格到黑市上买囤积者出售的存货。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主力及英国驻扎在新加坡的舰队先后被日军重创之后，大多数澳门民众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们连做梦都不敢奢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人被赶出中国。

在澳门，尽管必须隐藏身份，但我还是有诸多挚友相伴，因为我的许多朋友也在澳门避难。广东旅沪同乡会的主席林炳炎也在这里。我们是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林炳炎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 20 岁时还只是一名厨师，之后在一个小钱庄谋了份工作，并在那儿积累了实用的金融经验。我和他在上海相识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杰出的银行家。恒生银行就是由他创建的，已经在香港注册成立。在他去世之前，仅从南美向澳门进口金条一项业务，每年就可以为恒生银行盈利近 900 万元。林炳炎不仅是金融专家，还是一位文雅、慷慨、侠肝义胆、心系大众的有识之士。在战乱中，他对许多被困在澳门的朋友颇为照顾。澳门的中国医院之所以能在战争期间保持运营，就是因为有他的大力支持。^①

香港沦陷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想知道中国未来能否从日本人的控制下收回自己的领土，以及能否继续以独立国家的形式存续。所以我充分利用了刘叙棠丰富的藏书，开始博览中国的文

^① 林炳炎在 20 世纪 40 年代去美国时还给我儿子守仁提供了一笔助学金，好让他完成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余下的两年学业。

学、史学和哲学文献，试图从中找到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政治存在能够延续数千年的奥秘。最后我发现，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的政治家都从两本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中寻求指导，那就是《春秋》和《易经》。

《春秋》是封建国家鲁国（现在的山东省）的编年史，由孔子所著，旨在建立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从而指导未来政治家学会如何施政和管理。在后世，这本书被政治学学生奉为中国的政治圣经。在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家鲁肃曾建议他的继任者吕蒙研读《春秋》，以《春秋》之说作为他日后管理国家的准则。在宋朝，另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范仲淹也建议大将军狄青学习领会《春秋》的精髓，以理解其中的治国之道。

《春秋》中最重要的道就是：统治中国的政府必须是合法的，而且是汉人自己的，这样才能防范谋朝篡位者和外族“蛮夷”。统治的目标是通过增强和巩固朝代的延续来实现国家和平和秩序。^①

① 五帝是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五位杰出部落领袖，在 647 年的时间里，每位领袖都为这个国家做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燧人氏发现了火；伏羲氏教人烹煮；黄帝发明建造之术；大禹引洪入海；炎帝战胜了入侵的蚩尤。

在封建王朝时期，所有的开国帝王都是给国家带来安定和秩序的人。他们或善施教化，或大修防御城墙，或勤练雄师攻城拔寨、保家卫国。

当统治者的暴政和腐败使国家不宁、国力衰退时，统治者就失去了合法的统治权力，而新的领导人则获得了合法挑战旧有统治的权力。他们既可以以和平手段迫使统治者退位，也可以发起革命实现政权更迭。

统治者被视为天子，必须为了国家利益做应做之事。如果统治者昏庸无道，人民就会认为他已经被上天遗弃，应当重新选择一位统治者执行天命。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治世哲学，而大同世界是属于人民所有的。（转下页注）

《春秋》还论述了对官员的要求。例如，在推举政府官员人选时，唯一的衡量标准是他能否胜任，所谓举贤不避亲、仇。^①《春秋》在过去一直被视作中国的道德宪法。

《春秋》里隐含的哲学道理在《易经》中也可以找到。《易经》揭示了领导力的奥妙，领导力能将一个凡体蜕变成一个志存高远、大公无私、道德高尚的“君子”，他将为社会和人类服务。然而，这样的中国经典作品并不为西方的学术圈所熟悉，甚至为当代的中国学者所忽略。如果一个人不熟悉《圣经》，他就不可能理解基督教义；同样地，如果一个人不理解《易经》，那么他就领会不了正统中华文明的精神和基本哲学。

根据《易经》，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根据阴（负）和阳（正）

(接上页注①)儒家学派著名的弟子孟子认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王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没有哪个统治者天生就该享有统治权。新的天子随时可以挑战旧的统治者，如果人民相信新的天子，就会支持他执行天命。

三国时期，作为政治家楷模的孔明曾效忠于汉王朝缔造者的后裔刘备，辅助他在四川建立蜀国，延续了汉王朝这一合法政权的存在。当时孔明年纪尚轻，只有二十几岁时，刘备就三顾茅庐请孔明出山帮助他复兴汉朝。此时，谋逆者曹操已经在北方为他的儿子建立了魏国；孙权也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吴国。刘备空有一个汉朝后裔的名号，却并没有实际统治的区域。孔明有两个兄弟，一个在曹操手下，另一个在孙权手下，所以他本可以投靠到任何一个非法政权之下。但是孔明选择了一条正道，决定与刘备共命运，因为他遵循《春秋》里面的教义，他的责任就是惩奸除恶，匡扶正统。

① 北宋时期，宰相王旦推举自己的对手寇准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得幸于这一高尚的行为，寇准最终大败长江北部地区的辽国军队，拯救了国家。东晋时期，宰相谢安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组织北方军，谢玄和他的雄师也击败了长流域北部地区另外一支入侵的少数民族军队。《春秋》中关于施政准则的思想又一次为国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的宇宙法则发生变化。只要人们能够依据变化做出调整，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就是那个真诚、高尚、积极、无私的“君子”。无论失败还是成功，他都无私尽忠于自己的职责，随时准备以有德的方式来服务社会，从而实现利他的目标。他的人生使命就是服务于人类。

上述思想即为“君子之道”，也就是通过服务于天下从而实现至高的完美境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如此，才能实现天下为公的最终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民治、民判、民富和民乐的世界政府。

总体来说，《易经》中的理念与基督教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易经》中讲述舍与得的章节中，它就强调了要持续、无私地奉献社会，这与基督教中“爱”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时，《易经》的思想也十分超前。当“君子”遭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而难以完成人生使命时，“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这体现了《易经》尊重个体自由和人性尊严之道。《易经》还宣扬了一种中庸的、和谐的生活方式，即人应该及时行乐，无须苦行；累了就要休息；一天的辛苦劳作后，应该享受美食，多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尤其要欣赏音乐。

我在澳门住了两年，深入钻研了《易经》的精意要旨，并且在这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改变了生活方式。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上明白了孔明缘何能助刘备白手起家逐步建立一方霸业；我也懂

得了为什么甘地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印度人民从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们的成功来源于卓越的道德领导能力。在一个没有成文律法的国家里，道德领导就会显得至关重要，否则专制阶级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随意剥削人民。即使是在法律受到尊重和执行的國家，道德领导对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利益和自由也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由于少数政治家卓越的道德领导能力，中华民族才得以延续 5000 年至今，因为每当国家面临严重的危机时，总会出现身具《易经》中要求的美德的君子来拯救中华民族。

在研究《易经》之前，我信奉有“东方基督”之称的墨子的人生观。墨子是普通大众的代表，他创立了中国的墨家学派。墨子反对一切战争，除非是为了保卫受到入侵的家园。他还主张“兼爱”和“节用”。

在我理解《易经》之后，我明白无论最后结果如何，我都应该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遥望先贤孔夫子在知天命之年研读《易经》之后，也坦然承认自己在过去 49 年里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并希望自己从今以后可以少犯小错。如《易经》所教导的那样，在我转为尊崇纯粹的儒家思想之后，我才断绝了与所有中国政府高官的往来，回到美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大约在澳门待了两年后，不得不离开的时刻到来了。一天，一个旧识的儿子突然来找我，要向我借 500 银圆。这个卑鄙小人威胁我说，他跟日本领事馆有来往，可以借助他的影响力保证我在澳门的周全。我无法对他的勒索置之不理，尽管我不可能满足他贪得无厌的要求，就算我这一次满足了他，也会再有下一次，而

且要求会变本加厉，最终他还是会把我也出卖给日本领事馆。

在权衡了目前困境的利弊之后，我被迫决定离开澳门。我打算前往中国非沦陷区。为了准备去往非沦陷区的旅程，我的朋友冯祝万把我介绍给了一群盐商，他们因为生意的缘故既与中国的伪军有关系，也与地下游击队有联系，所以可以在澳门和非沦陷区之间自由来往，而且可以不受侵扰地穿越沦陷区。^① 他们保证说可以帮助我安全穿过沦陷区到达非沦陷区。

我下定决心只身潜逃，把我妻子留在澳门继续接受治疗。我向她解释了我目前的绝境和潜逃计划。作为一个善良的贤妻，她同意了我的决定，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我拜托房东刘叙棠照顾我妻子，她将继续住在他家里。同时，我也拜托我另一位老友谭益芳在我离开澳门后亲自关照我妻子。谭益芳也是我值得信赖的一位同事。那是一场令我哀痛欲绝的分离，因为我妻子那时已经病入膏肓，我们都明白这一别可能就永无再见之日了。

一个月后，当我平安抵达非沦陷区内的韶关时，我深爱的妻子在澳门去世了，时年 43 岁。我到达广东省的临时省会韶关后，就立刻给她发了一封无线电报，所以她在与世长辞之前至少得知

^① 冯祝万是李济深将军的一位亲密的同事。自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之后，冯祝万就悄无声息地在澳门蛰伏了许多年。国民党开始北伐之后，李济深在两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当时冯祝万主管广东省的财政。我去广州为李济深将军重组粤汉铁路时，与冯祝万相熟识。冯祝万是一位国学大家，对《易经》尤其有研究。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仍然胸怀大志，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我在澳门时常常去拜访他，与他谈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尤其是《易经》。

了我平安抵达目的地的消息。她的身体已经太过虚弱，根本无法独自和病痛斗争。过去，每当她遭遇不快或有重大疾病时，我总是会陪在她身边。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她会原谅我在她人生最后的时刻离她而去，她也会祈求上帝保佑我和三个我们珍爱的孩子，直到我们在天堂相会。

我善良的好友们在澳门料理了我妻子的后事。他们拉着我妻子的灵柩从她去世的那家中国医院一路走到了墓地。没有一个家人出席葬礼，因为我母亲当时在广东乡下居住，我们的三个孩子也在美国学习。在我不在澳门的情况下，朋友们替我安葬了亡妻，这份珍贵的恩情让我永生难忘。这件事情也使我更加坚信人性的善良。这一经历告诉我，如果我们友善待人，当我们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回报以友善。

第十六章 惊险重重的韶关之行

1943年7月20日上午9点，我告别了病入膏肓的爱妻、刘叙棠和谭益芳，离开在澳门的住处，加入盐商的队伍，踏上了前往韶关的旅程。领队的是一位名叫罗晓峰的政界老手，他曾连任过好几届广东省议会的议长。在广东省，他与基层社会的各个阶级都交往甚密，因此广东省沦陷地区内的游击队和傀儡政府官员都对他很尊重。由于他本人和他一个姓李的副手也加入了这次行程，所以整件事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而且途中还有我的老友区国良（Au Kwok - leung，音译）和我做伴。我给了盐商们2万元，作为他们向我提供食宿和保护的酬劳。

我们一行人首先坐船到澳门的湾仔，然后又从湾仔搭乘一艘手划船到了罗晓峰的一个朋友的水稻种植园。我们在那儿吃过午饭后就登上了一艘大帆船，前往中山的中心区石岐。石岐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开船一段时间后，我们又转到了一艘小船上，去往一个叫平中的小村镇。我们当晚在一个游击队员家

里过了一夜。从我们抵达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那儿的游击队一直充当着哨兵保护我们。随后，我们搭乘了一艘小船前往另一个村镇芬周。在那里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又搭上另一艘小船去永洛（Wing Lok，音译）。永洛是一个很大的镇子。从这里我们乘上一艘大帆船驶向了下一个镇子坦洲（Tam Chow，音译）。从坦洲出发，我们又步行了半天的时间到达了石角。

游击队员划着小船载着我们穿行在连通这些村镇的小溪中，因为我们不敢走大河，怕被日本人发现。途中我问他们，如果我们真的遇到敌军该怎么办，他们说那样的话就要立即换上伪军的制服，显然他们和中山的傀儡政府私下里都是有联系的。

到达石角的那天晚上，我们登上了一艘大帆船，上面已经载满了乘客和货物。船上没有灯，甲板上的人全都神神秘秘、偷偷摸摸的。大约凌晨3点时，我们的船起航驶向三埠。三埠是著名的侨乡，大多数在美华人的祖籍都是这里。从澳门到三埠大约用了四天时间。在此期间，我们偷偷穿过了沦陷的中山区。三埠是一片无人管辖的区域，此时由游击队控制着，这些游击队员大多是土匪和走私贩。穿越中山已经足够危险了，但是穿越这片无人管辖区却比穿越中山更加危险。幸好游击队是和盐商们密切合作的，多亏他们的保护我才得以安全通过三埠。

土匪和走私贩很难区分，在中国历史上他们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那些动荡不安的年代。每当出现暴君统治国家、剥削人民时，不愿妥协、热爱自由的人们就会以抢劫和走

私维持生计，这也是他们对统治者和施暴政者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领袖也可以被归为这一类人。在日本第一次侵华时，就出现了很多游击队领袖，他们破坏日军运输线，还参与在沦陷区内的其他破坏活动，将日军困在城市里。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他们帮助共产党保卫解放区。每当日军企图占领郊区时，游击队也会给日军造成很大的麻烦。正如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协助了过去的革命领袖一样，只要中国的领土上还有压迫和暴政，游击队就一定会继续存在。

到达三埠之后，我们一行人住进了一家混凝土建造的三层楼旅馆，休整之后再继续后面的行程。所谓三埠，就是由建在河岸边的三座小城构成的区域。这里拥有宽阔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建筑。这些城市都是由美国华侨们投入巨资建设的。战争期间，三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没有了来自美国亲友的汇款，这些住在三埠的华侨家属们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为了避免挨饿，这些不幸的家庭只好把家里用过的一些美国日用品和衣物拿到露天的街市上售卖。尽管如此，这些小城中与食物配给和战争物资相关的工商业活动还是非常活跃的。

离开三埠之前，我差点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意外。夜里我想去旅馆楼顶的洗手间，但是楼里没有灯，而我不吸烟，所以我也没法点根火柴照明。我自以为能够在黑暗中找到通往楼顶的楼梯，不幸的是我找到的其实是下到一层的楼梯。当我意识到自己踩空了的时候，我已经从楼梯上滚下去了。因为楼梯都是用钢筋混凝

土建的，每一层台阶都是光秃秃的坚固水泥。我努力想站起来，但是没有成功。不过最后，我并没有伤到脖子和四肢，也没有伤到头，只是在脸上留下了几块瘀青，这真算得上是个奇迹了。由于我常年保持每天散步一个小时的习惯，我的身体向来不差，所以才能够在滚下楼梯时下意识地调整身体，从而减少伤害。我回到美国之后的几年里，也曾两次滚下台阶，但每一次都没受什么大伤。可能是由于上帝的仁慈，我才能够在这三次事故中平安无事。

我们在三埠停留了一周，经过彻底的休息都已经恢复了精力。我们乘船前往肇庆，那里是清朝时两广的政治中心。到达那里时，我感觉就像在拜访一位老朋友，因为很多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协助前任总督岑春煊的军事政权反对袁世凯的复辟运动的。这个地方最有名的食物是裹蒸粽，就是以猪肉、盐、鸡蛋和豆子做馅蒸的粽子。我们每个人都吃了不少裹蒸粽，因为旅途上舟车劳顿，我们的食量也变大了。

从肇庆出发，我们沿西江顺流而下，经过肇庆峡，向四会进发。我的老同事邓征涛是四会的地方长官。我们在四会停留的那段时间里，他对我们一行人都颇为照顾。在四会，我还结识了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忠肝义胆的爱国志士伍观淇。他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游击队领袖。他此时已近古稀之年，曾在清末的新式陆军中担任新军管带。作为《易经》尊崇者，他过着简朴、无私的生活，也就是“君子”的生活。他还邀请我们一行人去观看

了为游击队员表演的戏剧。^①

从四会出发后，我们又雇了一艘帆浆并用的小船，沿北江逆流而上前往广东的临时省会韶关。北江的部分河段水位太浅，以至于水手不得不把纤绳系在腰间，一步一步把船拖过浅滩。晚上，我们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躺在铺了东西的甲板上睡觉。白天，我们就玩扑克、讲故事、沉溺于对往昔的回忆。我们经常会停船去陆地上的餐馆里吃晚饭，然后买一些肉食和蔬菜带回船上，作为我们行船时的饭菜。这些水手厨艺很好，我们在船上的饭食也令人满意。我们航行的河水清澈见底，与沿岸经过的蓝色石灰石山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河岸两边高出河面的土地都很干旱，虽然有几个巨大的水车可以引水灌溉一些田地，但我们根本没看到任何大规模的河水灌溉设备。河两岸都是当地政府张贴的鼓励冬耕的标语，但标语就是政府给当地农民提供的全

① 这部戏是关于三国时期刘备手下著名的猛将关公抵抗逆臣曹操的策反和利诱的故事。为了使关公背叛刘备、投靠到自己麾下，曹操布下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陷阱。在这部戏剧中，由著名的粤籍演员扮演的关公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春秋》。一位迷人的美丽少女走进来，给他端了一杯热腾腾的香茶，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春秋》上吸引过来。最后他终于注意到了她的出现，就问她是谁，想要干什么。她告诉关公，她是名动全国的美女貂蝉，几年前曾为废黜篡权者董卓，拯救汉朝做过贡献。她非常倾慕关公这个当世的英雄，自愿委身做他的女仆贴身伺候他，因为自古美女配英雄。关公把自己的剑递给她，然后告诉她，她为保护这个国家做了重大贡献，同样也应该保护自己的名节。曹操为了使关公归降，派貂蝉前去引诱他。但她的美貌和魅力依然不能诱惑关公背弃刘备，所以貂蝉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即为了子孙后代也应该保护好自已的名节。当关公把剑交到她手上时，她听从了关公给她的唯一劝言，举剑自刎了。

部。春天充沛的河水本可以储存在水库或者鱼塘里，以满足旱季所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无人启动这样的工程。我始终不知道当地政府到底是缺乏深谋远虑，还是真的愚昧无知。

到了韶关，省政府的官员们邀请我和我的同事住进了最好的旅馆，还将我们奉为上宾。由于我曾经担任过广东省政府的顾问，因此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恳请我留下来协助他。军政长官余汉谋也向我发出了类似的邀请。

韶关是一个繁华、人口稠密的城市，大约有 30 万居民，其中商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这座城市看起来与外面硝烟弥漫的世界不相关，丝毫没有战争的影子。人们照常忙着每日的活动：耕种、经商和生产本地特产。李汉魂胸怀大志，曾组建广东省实业公司，并力促其他产业的发展。他邀请我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我同意接任这个职位之后，公司总经理接受了报社的一次采访，对外宣称该公司的盈利额已逾 1000 万元。我看到这个虚假报道后大为光火，因为这一账面利润完全是由通货膨胀造成的。我向李主席陈述了实情，同时也拒绝了担任董事长一职。我还向他阐明了我的观点：如果以 3 万元的价格在通货膨胀前买进 10 辆汽车，随后再以通货膨胀后的价格卖出，那么自然会出现一笔巨额的账面利润。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一团和气，但实际上李主席和余将军彼此对立。他们的较量是纯粹的政治斗争，因为两个人都想完全把持广东省的大权。由于军权在握，余将军的实权更大，但是作为政府领袖，李汉魂间接地对余汉谋实行监督权。也有传言称，李汉魂已经收到蒋介石的密令，要监视余汉谋的一举一动。在这种复

杂的形势下，余汉谋想让我接管广东银行。由于我已经拒绝了李汉魂的邀请，所以再接受余汉谋的邀请自然非明智之举，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在他们二人的争斗中选边站队了。

在韶关逗留期间，我主动提出帮助余汉谋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因此他邀请我住在他的招待所里，这个招待所之前只接待他的军方贵宾。我住在那里的時候，美国驻广西副领事理查德·瑟维斯（Richard Service）来拜访我，我们就当前的战事闲谈了许久。罗伯特·B. 林恩上尉（Captain Robert B. Lynn）和特德·特莱斯廷中尉（Lieutenant Ted Gleysteen）是美国第十四空军的克莱尔·陈纳德少将（Major - General Claire Chennault）的两位代表，他们也经常来招待所找我，并希望我向余汉谋转达重要的信息，因为我能够直接接触到余汉谋，而且他们也相信我的判断。

日本占领广州后，广州绝大多数重要的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都迁到了韶关。岭南大学也迁到了这里。岭南大学的校长李应林邀请我就中国的未来给学生们做一次演讲。在我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后，我试着回答学生们的問題，有些问题是与演讲主题相关的，也有一些是关于他们感兴趣的其他问题的。一位女学生就计划生育向我提问，我向她讲述了我在伦敦见到的计划生育诊所，以及乔治·B. 克雷西博士（Dr. George B. Cressey）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的观点。当时适逢克雷西博士被美国国务院派遣到韶关进行访问。根据克雷西博士的观点，中国多为山地，仅靠降雨灌溉不足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中国大量的人口。

广州的基督教青年会那时也搬到了韶关，精力充沛的老秘书

长爱德华·H. 洛克伍德 (Edward H. Lockwood) 仍然负责掌管这个机构。洛克伍德能够讲一口地道的粤语，他是美国人，却像爱自己的祖国一样深爱着中国。他是中国人民忠诚真挚的朋友，已经在中国服务了 20 余年。在韶关，我对他和他优雅迷人的妻子对我的帮助感激不已。他们把从美国收到的杂志借给我看，并在自己家里款待我，这都使我在这里单调乏味的日子不再那么难熬。爱德华一直保有传教士的热忱和执着。他还帮助智者俱乐部 (Wise Men's Club) 举办每周的聚会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讨论战事的进展和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在那个俱乐部里，我发表过两次演讲，一次是关于温德尔·威尔基 (Wendell Willkie) 的书——《一个世界》，还有一次是关于《易经》。

美国浸信会也在韶关进行了很多活动，他们经验丰富的领袖 S. R. 桑德斯博士 (Dr. S. R. Saunders) 当时经营了一个儿童之家，专门收留战区的流浪儿。广东省政府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来照顾这些无家可归的儿童。韶关还有一个浸信会教堂，设在市里最重要的大楼里，我偶尔会去教堂做礼拜。

这里使用的电灯灯光晦暗，而且蚊虫猖獗，所以每天晚上我都早早上床睡觉。韶关的周边地区对于居民来说是极不卫生的。有一次，我去郊区一栋漂亮的现代化大楼里的一所学校参观。校长告诉我，这栋大楼的建造者的全部家庭成员都已经死于疟疾。这种可怕的疫病使得北江流域上游城镇的家庭几乎都活不过三代。因此，那里的人口在过去 50 年内基本保持不变。如果不是省内邻近的人口稠密地区有人迁居到此的话，当地恐怕已经没有人烟了。

随着湖南战事的恶化，以及日本发起新的大屠杀，罗伯特·林恩上尉和特德·格莱斯廷中尉建议我说，如果我还想去重庆的话，最好尽快离开韶关。那时已经是 1944 年的春天了，当时的战局相当不利，他们认为日军很快将会从长沙向南，同时从广州向北发动进攻，最后连通两个省会之间的沦陷区。我向余汉谋将军和李汉魂主席报告了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并督促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日军侵略做好准备。

当经过湖南抵达广西的列车线路被切断之后，余汉谋将军也建议我乘坐最早一班前往湖南边境衡阳的火车离开韶关，然后再从衡阳找能够到达广西的火车搭乘。我知道，如果日军到达韶关，那么韶关就会立刻沦陷，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任何防御准备。郊外没有人挖阻止敌人前进的战壕，城内也没有人接受过能在紧急情况下照顾伤员或维持和平秩序的训练。相反，这里到处是自鸣得意的声音，人们像平常时期一样生活，既不关心战争局势，也不关心中国的未来。我无法给这里的朋友们提供什么有建设性的帮助，所以在韶关待了六个月后，我于 1944 年初离开了这里，决定排除万难前往重庆。途中我要穿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和四川几个以山地为主的省份，旅途的艰辛可想而知，所以我只能祈求上帝保佑我了。

去往衡阳的途中，我有以前的同事谭益芳与我结伴而行。在我妻子死后，他就到韶关来找我了。另一个和我一起从澳门逃到韶关的同事决定留在韶关照顾他的家人，因为他妻子已经在来韶关的路上了，然后他们会一起回老家。在离开韶关之前，我在韶

关的一个煤矿主朋友谭赖廷（Tam Laiting，音译）慷慨地赠予我5万元作为我去重庆的路费。当时通货膨胀十分厉害，我们从贵州都匀到贵阳市乘坐的是邮政车，只带了三个行李箱和一些寝具，仅这一段的路费就高达25000元。不管怎么说，谭赖廷赠予我这么一大笔钱绝对是慷慨之举（他把那笔钱用旧报纸裹了个不小的包裹给我送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却精于商道，也颇有政治才能。他白手起家，到战争开始前，珠江河面上的所有运营的大帆船和蒸汽船已经都是他名下的产业了。我仍然记得离别时他对我说的话，他说他已经老了，但他希望年轻的一代能抗争到底，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他希望我将来能去美国寻求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来拯救中国。我最后一次听到关于这位忠诚的朋友的消息，是他的资产都被共产党清算了。

在韶关期间，我发现无论是沦陷区的鸦片运输还是非沦陷区的鸦片运输，都是由杜月笙的青帮、民国政府的禁烟委员会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傀儡政权之间勾结操控的。鸦片是从非沦陷区运出去的，装鸦片的箱子上贴着禁烟委员会的官方封条，不但有政府士兵护送，各地的驻军也会给予保护，因为他们都是被买通的。

战争爆发多年前，禁烟委员会刚组建时，当时还在上海担任蒋介石首席秘书的杨永泰让我为禁烟委员会推荐一个最为有效的禁烟计划。因为我曾经在一次和国际联盟代表C. 博尔奇博士（Dr. C. Borcic）的会谈中了解到埃及的毒品交易控制体系是最好的，于是我天真地向杨永泰建议禁烟委员会应当与国联合作，以

便引入埃及的控烟禁烟体制。然而，我一直不知道禁烟委员会是否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时，我的朋友英国总领事壁约翰爵士告诉我，一船波斯鸦片已经被运进上海，并且有中国警察和宪兵队护送。我当时还没有把他的话当真。许多年后，韶关军事领导人提供的证据证实了这个信息。禁烟委员会和青帮勾结，在战争时期在非沦陷区和沦陷区公开运输、贩卖鸦片。直到那时，我才开始了解国民党领导人的道德堕落是多么严重，而这也是他们逐渐垮台以至于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打败的根本原因。

鸦片这个中国挥之不去的恶咒，已经成为引发中国内忧外患的因素。过去在一些重要的城市里，鸦片是扭曲的政治机构和流氓犯罪团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它也是国民党政权腐败和中国殖民主义建立的部分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在过去不断游说其政府对华实施反制措施的贸易商们积累了巨额财富。

第十七章 艰苦跋涉到重庆

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后，已经买不到经停湖南衡阳的韶关至广西柳州的车票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战局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的火车要被留用，为军事运输做准备。出于同样的原因，从柳州到贵州独山的火车票也只能在柳州购买。从独山到贵州省会贵阳和从贵阳到四川重庆的线路上则只有运煤炭的汽车了。

在韶关，余汉谋将军的副官帮我和我的同事弄到了两张去衡阳的火车票。一早我们就登上了拥挤的火车，车上挤满了士兵和难民，都是要去湖南边境的。整个旅途就是火车翻越一个又一个山脉的爬升之旅。

到了衡阳，我们在一家旅馆安顿下来后，就去拜访了运输部主管和第九战区总司令薛岳将军的妻弟方仁初（Fang Jen - chu，音译）。方仁初邀请我们吃了午饭，并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可供平民乘坐的火车了，所有的火车都要被用来运输军用物资。注意到餐馆里还有一些美国军官正在临近的餐桌就餐

时，方仁初建议我们去找他们碰碰运气，因为他们手里可能还有为预防紧急事件而保留的火车票。我走到他们桌边，自我介绍了一下，很快我们就相互熟识了起来。他们很高兴能够认识我并从我这里打听到韶关目前的局势。在我离开前，他们好心地送给我两张第二天早上出发去柳州的火车票。虽然长沙前线的局势日益紧张，但衡阳依然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恐慌的迹象，看起来人们已经放弃了抵抗的希望，并且也认命地接受了日军必将占领这座城市的前景。他们低声嘀咕着，说也许日军都不会比国民党再糟糕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这列发往广西柳州的拥挤火车，又开始了一场翻越好几个山脉的旅程。当我们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拜访了第四战区的总司令张发奎将军。在他的军事总部，我还见到了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时的一个老同事麦朝枢，他是一个心系大众的人，此时是将军的秘书。

张将军问我韶关和衡阳的战争局势，以及我对日军未来进攻计划的看法。我告诉他，韶关和衡阳即将面临最坏的局面，并且第十四空军中消息最灵通的美国人认为敌军不久之后将会从北面南下攻占衡阳，同时从南方北上占领韶关。完成这些后，柳州就会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张发奎将军悄悄告诉我，他现在只有一支 3000 人组成的小游击队，至于美国提供的有限的精良武器装备，蒋介石也大都没有分配给他的部队。但是，他仍将尽己所能保卫广西。在我告别前，张发奎将军命令他的副官在发往独山的火车上给我们留两个座位。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了这辆拥挤的

火车，再次越过几个山脉后，完成了最后的一段旅程。在这段漫长、艰辛的旅程之前，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山。

在火车上我们遇见了一个法国人，他是中华民国邮政局的行政官员。他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按一般交通费的标准支付费用，就可以搭乘他的一辆分派邮件和包裹的邮车从独山到达都匀。我们感激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当我们到达独山的时候，他命令邮车司机将我们和我们的行李拉到都匀。我们为这趟行程支付了 25000 元路费，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个昂贵的价格，但那主要是是由于通货膨胀，并不是真的漫天要价。

在都匀住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搭乘了一辆运煤车从都匀出发。在车上，我们被挤得就像装在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全程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当煤车终于到达贵阳时，我们已经全身酸痛、四肢僵硬了。在去往贵州省省会的路上，好几个晚上我们都是当地的小旅馆中过夜的，有时候只能睡地板，吃糙粮，但我们还是成功地熬过了这段艰苦的旅程。小旅馆会用大木桶给我们提供热水，所以每天晚上我可以用一路随身携带的大搪瓷杯舀水往身上浇，也算是洗个澡。无论何时，只要能找到饭馆，我们就会选择在饭馆吃饭，因为这里的饭菜通常比小旅馆好一些。好的饭菜是我们在这段陆上旅途中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它不仅能填饱我们的肚子，而且能帮助我们忘掉一些旅途上的艰辛。

贵阳是一个十分活跃战争中心，我看到这儿的许多老朋友都参加了抗日战争。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周诒春此时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首席秘书。我在铁道部时的老同事陈地球此时是省

运输处处长。在我住的那个旅馆里，我还遇到了我以前的校友蒋梦麟，他曾担任教育部部长。我和这些朋友一起讨论战争局势和中国的未来，这些也是那时最受热议的话题了。

贵阳的百姓非常穷。女人们坐在路边晒着太阳，缝补衣服或者捉跳蚤。如此近距离地见证贫困让人心里很难受。虽然朋友们挽留我再多待些时日，但我还是一找到去重庆的车就马上启程了。

一天早上，我在旅馆里遇到两个美国兵：来自布鲁克林的 G. M. 格林伯格（G. M. Greenberg）和来自克利夫兰的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他们正在寻找向导，向导可以坐他们的吉普车带他们去重庆。于是我毛遂自荐了，虽然我并不知道路，但是我相信会说中文的我可以问到路。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带着我们和我们的行李一起上了吉普车。他们的车动力强劲，即使走在颠簸的山路上也能像在普通的高速路上一样。吉普车以 40 英里的时速行驶，遇到崎岖不平的道路或急转弯时，我们都不得不紧紧抓住安全带。唯一欣慰的是，我们不用像上次在煤车上一样被挤成沙丁鱼罐头。途中我们会时不时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我们的朋友会把他们的口粮分给我们。这是我离开香港之后，第一次吃到巧克力，我从来没觉得巧克力像此时这么美味过。大约晚上 8 点的时候，我们到达重庆，找到旅馆安顿下来，向那些美国朋友表示了感谢并且和他们道别。从韶关到重庆的这段旅途总共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是一个多雾的城市，沿长江上游两岸的山势而建。城市中的生活忙碌而活跃，重庆已经成为抗日的外交中心、政治中心、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重庆的交通很落后，路上挤满了黄包车和运煤车。因为路况差，所以去哪儿都不方便。大多数人选择排着长队去挤人满为患的公交车，只有少数官员才有汽车，而且汽油的价格极高。这里只有一座半现代化的旅馆名叫嘉陵旅社，本来是一座老式乡间别墅。嘉陵旅社是重庆的外交中心和社交中心。它的附近就是外国记者在媒体俱乐部里设立的总部。一些著名的中国官员例如孙科、吴铁城和郭泰祺也住在附近。

我一到重庆，交通部秘书潘光回就告诉我，孔祥熙已经去了美国，在他走之前曾做出指示，任命我在他离开期间担任当地轮船公司的代理董事长。^①所以在重庆的这六个月里，我一直担任中国内河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代理董事长，我的所有花销也由这个公司承担。

潘光回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毕业生，也是一位精力充沛的进步人士，孔祥熙和交通部部长张嘉璈都十分信任他。他是一位重要的对外联络员，而他迷人的妻子塞西莉亚（Cecilia）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对待他的朋友们十分亲切。我经常受邀参加他的家庭派对。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

^① 我还了解到，孔祥熙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想让我担任中央信托局的总经理，负责采购所有的战备物资。然而我在澳门期间却从未收到任何消息。显然要么是他无法联系我，要么是他的信件在半路寄丢了。

年代里，在他家度过的那些夜晚却是美好的。

我的老朋友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邀请我住在国民党的招待所里。那里离他家很近，我的一日三餐都是在他家吃的。通常，我会在晚饭后花一个左右的时间向吴铁城汇报我白天从外国大使馆、新闻记者以及其他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吴铁城有一个很大的藏书室，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

孙科和他妻子也住在附近。他那时并不受蒋介石欢迎，蒋介石甚至都不愿见他，有什么话都要通过吴铁城来转达。吴铁城不愿和孙科有什么不愉快，所以他常常让我帮忙转达，而我则让古应芬给孙科传递消息。孙科的自由已经被限制，他身边的保镖都是由政府配备的，而且每周都要更换，他接待了哪些访客也要登记下来汇报给当局。由于我住在国民党的招待所，而且是代表吴铁城拜访孙科，所以我能够不受监视。孙科和吴铁城在北伐战争前就是我在广州市政府的老朋友、老同事，所以我可以自由坦诚地和他们谈论绝大多数敏感的政治话题。孙科告诉我，无论他何时去拜访蒋介石，总会有第三个人在场，所以他就不能与蒋介石单独讨论他想向政府提出的一些重要提案。而吴铁城则向我抱怨，孙科每次见蒋介石都会抱以批评的态度，对身为他父亲同事的长辈没有一点敬重之心。孙科名义上是立法院院长，事实上从南京政府时期起，立法院就已经沦为蒋介石所拟法令的记录机关。作为一个根本不能发挥任何作用的院长，孙科将所有的时间都用于阅读严肃书籍和杂志，并充分利用他所学到的理论来探讨战争和

时局。他无疑是陪都里最有学识的人之一。^①

四川是一个富庶的地方，物资上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这个重要省份的省政府主席就是张群。四川还是中央政府抗日的根基和据守阵地。张群也是蒋介石最后一个还在世的结拜兄弟，过去也一直担任着一些至关重要的职位。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攻击之前，张群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并负责处理重要和棘手的对日问题。当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离任之时，他也曾被蒋介石指派接管财政部。

在重庆，蒋介石身边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陈布雷，他是一个学者，也很传统。我任杭州市市长时，他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所以我对他也很熟悉。在陪都的时候，想见到陈布雷很不容易。他对蒋介石的所有访客进行严格筛选，不少重要的求见者都被他拒之门外。无论谁想见蒋介石，都必须先递交一份请求书，详细说明拜访蒋介石的目的，然后耐心地等待结果。一旦递交请求书，求见者就不能离开重庆，必须留在这里一直等到同意接见或者拒绝接见的回复做出为止。因此，在那段时间里，陈布雷才是暗中掌握大权的人，因为他负责筛选和处理所有的请求书。

① 20世纪早期，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时，吴铁城在孙科手下担任警察局局长。他们都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在北伐之前，蒋介石查办了右翼团体成员，吴铁城因此被关进了广州附近的监狱。虽然在蒋介石的得意下属杨永泰说情之下，吴铁城在北伐结束后获得释放，但前提是他要答应蒋介石的条件，背弃孙科并加入蒋介石的政治阵营。吴铁城极其聪慧，随时愿意采纳好的意见。他很有个性，也很有能力，国民党在重庆与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吴铁城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介石最有影响力的同乡是陈立夫，他是陈其美的侄子，也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陈立夫于 1925 年到美国进修工程学。他是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坚持要用中文主持重庆美籍华人俱乐部的每月例会，虽然参加者其实都是美籍华人或者留美的归国学生。他对掌控国民党很感兴趣，实际上也确实掌握着极大的权力。当时有一种盛行的说法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孙家只有大陵墓（指孙逸仙博士在南京的中山陵）。”这个说法充分说明蒋介石掌控着整个国家，陈立夫掌控着整个国民党，而孙科其实处于无权无势的尴尬窘境。

当孔祥熙去美国时，他将财政部交给了俞鸿钧。俞鸿钧是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时的老朋友和同事。他是一位精干的人民公仆，沉稳、准确并且高效。这些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短处。若是平常时候，他肯定能够将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但是面临极端紧急的情况时，他不能提出大胆的有建设性的大政方针来推行积极的改革。他和张群来往密切，因此也被蒋介石视为永远不会背叛党国的忠诚者。在重庆的时候，我经常拜访俞鸿钧，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吃午饭。他友好地邀请我主管中国海关，但我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重庆也有很多著名的美国战地记者。理查德·瓦特（Richard Watts）是美国大使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几篇批判蒋介石的文章。著名的戏剧评论家奥利安娜·阿特金森（Orianna Atkinson）、《生活》杂志的安娜丽·雅各比（Annalee Jacoby）和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也在那里。还有

美国史带集团（C. V. Starr）出版的《上海晚报》的兰德尔·库德（Randall Could）也发表过批判蒋介石的文章。这些记者大多去考察过延安的共产党解放区。他们从延安回来后，孙科为记者们安排了一场晚宴，我也受邀出席。在晚宴上，这些记者们热烈地讨论并盛赞了他们在延安见到的各种改革措施。我当时提醒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采取了哪些改革，而是中国共产党一旦取得政权，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我认为，一个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应当高瞻远瞩，而这些朋友当时则目光短浅，我只不过是想要强调共产党执政后可能带来的一些深远影响罢了。

我到达重庆后，战况已然恶化。衡阳、韶关和柳州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在独山沦陷之后，日军开始经铁路向贵州进发。我是最先从理查德·瓦特那里得知独山沦陷的人之一，然后我立即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吴铁城，让他传达给政府的其他部门。

从表面上看，重庆政府是通过三个独立政府机构来指挥战争的，这三个机构分别是：何应钦将军的军政部、陈布雷领导下的蒋介石侍从室以及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委员长办公厅。何应钦将军是一个战略家，但没有实权。蒋介石留用他，是因为他在军队中的资历和威望，还因为他接受过军事训练并拥有实战经验。每当某个与蒋委员长没有直接私人关联的军事人员提出异议时，蒋介石都会派何应钦去平息事端。不过，何应钦优秀指挥官的资质也常被人质疑，因为他从没有亲自带兵打赢过任何战争。作为一个学者，陈布雷则完全不懂军事。让本就混乱的战局更添烦扰的是，这三个各自独立的机构还经常向战地指挥官们发布相互冲突的命

令。各机构之间没有协调的指挥，一个机构发出的命令可以被另一个部门取消，而蒋介石更是可以取消任何部门的命令。绝大多数这样的命令是以电话或者电报的形式传达给前线的，有权下达最高指令的那些人只根据间接的汇报来指挥战争，因为他们很少派遣高级官员深入前线去了解真实的战况。

当听到日军已经向贵阳进军的时候，重庆政府立时慌作一团。如果日军继续向贵阳行进，那么贵阳就会像其他城市一样沦陷，然后日军就可以轻而易举入侵四川。重庆政府的高层们开始筹备着将中央政府的临时都城迁往西康。如果走出这一步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国民党政权的终结和一个难民政府的产生。西康易守难攻，与外界进行通信十分困难。幸运的是，侵略军没有继续他们向四川和重庆推进的脚步，据报道，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冬衣来抵抗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

我十分幸运地在过去七年艰苦的战争时期内仍然保持着最好的健康状态。我曾冒着感染疟疾的风险在中国的疟疾重灾区住了六个月；我在沦陷区和非沦陷区五个省里穿行时不得不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小旅馆里过夜，也随时可能染上各种疾病，但是我都平安度过了。可是在重庆住了几个月后，我的眼睛却感染了，医生诊断为沙眼。我在重庆医院里的眼科门诊接受了一系列治疗。每天早上，我不得不排着长队等候公交车去门诊室接受治疗，滴几滴呛人又会感到刺痛的眼药水。受过这番折磨后，我还得再排队去坐公交车回家。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治疗后，我返回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医学中心重新检查眼睛。那儿的医生告诉我，我的眼

睛非常健康，根本没得过沙眼。这件事情说明了非沦陷区和战区里的医生水平有多差。

在重庆待了大约六个月后，我决定永远离开中国。这一决定并非偶然，但它是在一天晚上变得彻底清晰起来的。当时我和吴铁城在谈论中国的未来和战后的问题，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国还不具备成为共和国或建立其他代议制政府的条件。他真心地认为即便是在日本被赶出中国后，也只有独裁专政才能解决中国的战后问题，并使中国保持自由和独立。他的这番话在我听来犹如晴天霹雳。

那时我才意识到蒋介石所追求的宏图大业与我在中国尽毕生之力所追求的法治民主政府是背道而驰的。自我追随孙科在广州市政府担任财政局局长以来，我就已经下决心在中国只担任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岗位，因为我知道我个人永远也无法获得什么政治大权。因此，我所担任的经理或行政管理职位都是致力于为大众提供好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在这些方面，我都做出过一些成绩。但是，作为孙逸仙的追随者，我在中国的达成使命的实践已经彻底失败，因为我发现自孙逸仙博士离世后，再没有任何一个人以实现他的政治愿望为理想，也再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实现他的政治宏愿，我自己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追随他的脚步。也是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认为高于一切的民主理想在战后的中国领导人那里得不到一丝认同。就连多年来的挚友吴铁城，都和我抱着完全相反的政治理念。

国民党自 1927 年执政以来，虽然口头承诺要建立民主政府，

但一如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把持了政府的所有权力。虽然南京政府成立了国家级的立法机构，各省也设立了类似的省级立法机构，但它们至多也就是个咨询机构而已。为了扫除文盲，国家也制定了普及教育的计划，却迟迟不能得以实施，后来又被内战和之后的抗日战争所打断。

在大城市中，工业有所发展。政府财政也已经得到发展，可以为公共事业提供资金。私人银行业也得到了发展，能够满足全国商业活动日益增长的需求。大众普遍接受了代替银两的纸币，币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功。根据苏联和德国的模式进行的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已经开始，但同样因为国民党执政期间的常年战乱而被迫中断。政府的效率普遍低下，因为还没有找到能取代北京政府以前的公职人员系统的办法。

由于缺乏行政管理经验，绝大多数任职的政治官员把他们的时间花在了如何执政的口头空谈上。少有的几个政府部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如土地局、商标局、政府银行等。盐务局、邮政局、海关和铁路局普遍高效，因为管理这些机构的主要成员大多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技术专家和旧政权中的专业人员。但是由于缺乏有组织、有创造性的总体方针来解决中国现代化这一巨大的问题，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已经陷入了困局。他们发起过一些零星改革，但是不能被贯彻到底，因此不可能将中国从几个世纪以来的贫穷和落后中解放出来。在我看来，即使国民党能在日本被赶出中国后重掌政权，他们也未必能比现在做得更好。重庆政府的普遍低效和政治腐败让人无法对它的未来有任何期望。

和吴铁城的那次谈话后，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思考我与这些老朋友们在未来会是怎样的关系，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未来的想法与我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我仍然是香港沦陷之前的那个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从我在澳门住了两年并且研究了《易经》之后，我的的人生观已经完全转变了。《易经》教导我过“君子”的生活，应该不计个人得失地尽力奉献社会。既然我不能改变我的老朋友们，我决定永远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我的孩子们也将在那里完成学业。此外，我留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为了帮助中国赢得这场战争，我的妻子做出了无谓的牺牲；我则把我生命中最好的年华用来帮助和服务于中国，结果却只是徒劳。

我告诉吴铁城和张群，我想去美国看看我的孩子们，并处理一下我与在夏威夷的弟弟之间的家事。他们没有怀疑我的真实意图，也都认为我需要一个假期，并且觉得旅行可以帮助我重振低迷的精神。吴铁城给军统局局长戴笠写了一封信，为我获得了购买飞往加尔各答的机票的许可。买完飞机票后，我知道我就要重新获得自由了。在即将离开中国返回我的出生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对个人自由前所未有的珍视，在我要前往的那片土地上，每个公民都能拥有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

第十八章 重返美国

1944年12月19号，我乘飞机离开重庆，途经昆明市云南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驼峰山口，目的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我在重庆的亲友们借给我一些钱，作为去美国的路费。我一早就在为这次旅程做准备。因为飞机上很冷，也没有暖风，而我只有一件薄大衣，于是我打算在大衣下面再穿一件羊毛浴袍。我身上穿的是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套西装。桌上放着一个卷轴，我把妻子生命垂危时在澳门写给我的遗言贴在了里面，那是我打算带到美国给孩子们看的。他们的母亲只能把最后的话写在一张粗糙的包装纸上，她说：“每一次与你相见，都是上帝的恩赐。不要担心我，你还有美好的未来，一定要让孩子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曾经陪伴我从韶关到重庆的老同事和好友谭益芳坐着黄包车来送我去机场。我们坐上黄包车离开了国民党的招待所。在黄包车已经走出一段距离后我才突然想起我把那个卷轴落在了房间里。我们返回去找的时候，我住的房间已经被打扫过了。服务员告诉

我们，房间里的垃圾都倒进垃圾桶了，而且外面垃圾桶里的垃圾也已经被清空拉走了。我自责不已，怎能如此大意，竟然把对妻子的最后一点纪念之物弄丢了。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补偿方法，就是把爱妻的话记在心上，并尽全力实现她的遗愿，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感到些许安慰。不管怎样，将如此珍贵的东西遗失实在太不应该，我应当向我的孩子们道歉。

我的两个好友也赶到机场为我送别，一个是加拿大人马丁·戈尔德（Martin Gold），他是卫利韩在重庆的代表；另外一个郑秀兰，她是我妻子的姑母，当时她一个人孀居在重庆。我和我妻子当初就是在她在汉口的婚礼上相识的。看到这样一位美貌迷人的女士来到机场为我送行，祝福我顺利到达印度，平安返回美国，戈尔德感到十分吃惊。我给他们相互做了介绍，并请求戈尔德在将来重庆陷入战乱时能够对她多多关照。

尽管飞机抵达昆明只用了几个小时，但是这段不长的旅程却充满艰辛。飞机降落在一个宽阔的机场上，由于昆明是非沦陷区的运输基地和航空基地，所以那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军用飞机和运输机。由克莱尔·陈纳德少将指挥的美国第十四空军就驻扎在这里。我们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三个小时，待引擎检查和燃料补给结束之后，就启程飞向喜马拉雅山了。

飞越驼峰山口的航线是最危险的，因为那里的气流强烈而复杂；更重要的是，敌军的飞机经常在这里袭击我方从印度或缅甸运输战略物资的运输机。高空中温度很低，还好我穿着羊毛浴袍和薄大衣，倒也还算暖和。我们的运气不错，赶上天空晴朗，可

见度高，也没有遇到敌机。

大约晚上7点的时候，飞机降落在印度的一个边境城市。我在机场餐厅里吃了牛排，喝了一杯纯正的咖啡。自从离开澳门后，我就再没尝过这些了。美味的食物让我感觉到自己又回到了文明社会。

从这里再经过一段短途飞行之后，我们来到了加尔各答。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忍受各种战时的烦琐手续，包括海关检查、安全检查和移民检查等。直到过了午夜时分，我才终于被带到了一家旅馆。

第二天早上，我得知我以前的秘书陈炳池也住在这家旅馆里。陈炳池曾陪我和我妻子一起去过伦敦。他在新德里为中国的外交使团工作，此时是因公出差到加尔各答。他告诉我，我得去孟买才能坐上前往美国的船，并且他会给我引荐一些朋友来关照我。

加尔各答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有着宽阔的街道和优良的交通体系。巨大的有轨电车上挤满了乘客，因为加尔各答的人口很多。在旅馆里，除早餐外，每顿饭都有咖喱。旅馆的房间很干净，服务也很周到。经过一段艰苦的跋涉后，我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加尔各答是一个典型的印度城市。到那儿之后，我立刻感受到了不同等级之间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差距。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群体被称作“贱民”，他们必须从事各种卑贱的工作。印度人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请得起佣人的家庭必须雇佣多个佣人，因为不同的家务必须由特定社会等级的佣人来完成。

对于有些“贱民”而言，他们在世上的所有财产就是一条缠腰布。晚上他们只能睡在街上，一般都是在路边。

一周之后我乘火车穿越印度，从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启程前往西海岸的孟买。乘坐印度的火车，乘客们必须自带寝具或者在火车上租用被褥。我在火车上有一个单独的客车隔间，里面带有淋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在横穿南亚次大陆的一周时间内，我平均一天要洗两次澡。沿途是绵延不尽的农田，以及分布在广阔土地上的小村庄。尽管耕作热火朝天，但满足城市里数百万人口的粮食需求的前景还是不容乐观的。最近几年，印度政府正式施行计划生育还是比较明智的。

到达孟买之后，我拜访了林铎，他是与中国交通部相关的运输管制董事会（Board of Transportation Control）的代表。林铎邀请我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他也是广州人，他的妻子来自江西九江。他们的儿子刚出生不久，还没起名字，林夫人请我为他们的儿子取一个单字的中文名。我非常清楚一个好名字对一个人的一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向她建议了“信”字，信意味着信念，也代表着真诚和正直。她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给她的儿子取名林信。^①

美国本森司令号（*Admiral W. S. Benson*）海军运输舰将于一周

^① 中文名字并没有什么标准可言，可以根据意愿取一个或两个字，所以取名字是一项艰辛的任务。中国人习惯为孩子们取有内涵的名字，有的名字暗示孩子长大后会有大作为，有的则祝愿孩子有一个富足兴旺的未来，而且名字还要符合中国的伦理观念。我的母亲给我取名增基，即是取“巩固家庭基业”之意。

后出发前往美国，美国运通公司在孟买的分公司能够帮我买到一张士兵级船票。我在孟买收到了支付船票及购买从洛杉矶到纽约的火车票的钱，它是由我美国的亲友们提供给我的。

在孟买等待出发的这一周时间里，我游览了那里所有的景点。孟买是东方最整洁也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让我想起了上海外国租界里最好的那些地方。印度的商业家、金融家和实业家们大都居住在这里。这里的酒店也很舒适，其中有一家可以接待各种族的客人。孟买像纽约和伦敦一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我认为这里展现了现代印度的优良风貌。

1945年1月4号，我穿着一件卡其布衬衫和长裤，拎着装衣服的帆布包登上了前往美国的本森司令号轮船，浑然不知我的目的地港口在哪里，因为战时与交通活动目的地有关的一切信息都是最高机密。我被安排了一个床位，是和其他大约60个人共用一个舱房。每个人都领到一个安全带，任何时候要去甲板上都必须带好安全带。我们还被规定晚上不许在甲板上吸烟，也不许向海里扔废纸，哪怕是一张小纸片也不行。因为如果扔进海里的纸被敌军的潜艇发现的话，就有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

船离岸时，乘客中间就流传着一个说法：有一支由60艘敌军潜艇组成的舰队在领海外等着袭击我们这艘运输船。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乐观，我坚信这次航行不会遇到灾难，而且我也尽力安慰同行的乘客，让他们保持镇静和理性。

由于我们是在一艘海军运输舰上，因此我们必须遵守海军纪律。每个舱房都任命了一个指挥官，我们的指挥官是基督教青年

会的一位前任秘书。每天清晨破晓前，起床号一响我们就必须起床。匆匆穿好衣服之后，所有人都要到甲板上集合，直到得到解散命令之后才能离开。规定早上在甲板上集合的原因是这段时间被认为是敌军潜艇最有可能对我们发动袭击的时间。

洗漱之后，我们去餐厅吃早饭。餐厅是自助式的，人们排队等待领取食物，然后坐在长桌边就餐。午饭和晚饭也都是同样的形式。对于我们这些被仆人伺候惯了的懒人而言，这是一种新奇而大众化的经历。早餐过后，我们还要打扫所在的舱房。同一个舱房的人员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轮流值日。上午 10 点检查时要确保一切都井井有条。晚上 10 点熄灯，所有人一律上床休息，严禁将食物和水果带入舱房。

我们的舱房里有 60 个人，是一个国际化的组合，包括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和欧美人。这些人中有的天主教神父，有的是新教传教士，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同。要使这样一个复杂的组合实现团队合作，就像是组建一个微型世界政府一样困难。例如，让印度人做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就很难，因为在他们的国家里，他们认为体力劳动是可耻的，只能由“贱民”来做。而那些神父和传教士认为他们属于精英阶层，理应享受其他乘客的服务。航行了一周之后，那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前任秘书感到舱房指挥官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继续，于是我被船长任命为他的继任者。我必须公平地对待每个人。有一天，当印度人寻找托词逃避工作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第二天盯着他们完成了工作，直到让他们明白不能逃避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并像其他人一样遵

守纪律。我免除了神父和传教士的劳动义务，前提是他们要为所有人祈祷航行不受鱼雷攻击。一天，船上的一名中国记者被警务员发现往海里扔了几片废纸。于是警务员把他带到我这里，要求我负责在我们的舱房里关他两天禁闭，作为对他不当行为的惩罚。我让他自己自觉地在舱房里待两天，因为我并不想像看囚犯一样看着他。我们的船上还有一些中国女学生，她们和海员们以及士兵们相处得很好。那时我就知道国际主义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从印度出发后，这艘船一直在采用“之”字线的航行方式。在孟买的时候，有传言称这艘船可能经过欧洲前往美国。但经过一周的航行之后，我们知道船正驶向南太平洋，因为气候变得越来越炎热，并且视线所及之处看不到任何陆地。十天之后，全体船员开始练习射靶。我们每天除了遵守船上严格的作息和规定之外，什么活动也没有。经过漫长乏味的航程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澳大利亚的悉尼。

到达悉尼以后，我们并没有被允许上岸。整整三天，我们的船就停在港口外。我们又听到传言说日本的潜艇在太平洋的这个区域十分活跃，还说在我们到达前几天，有一艘船在悉尼港口遭到了鱼雷攻击。有新乘客从悉尼登船，我们都围着他们打听最新的战况。

离开悉尼后，这艘船依然采用“之”字线的航行方式向东北方向驶去。当我们在南太平洋上航行时，有一天下午早些时候，我们看到远方天际的太阳变成了方形的，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象。船跨越赤道的那天，我们举行了一个向神话传说中的海神涅普顿

祝祷的仪式，以表达我们这些从他管辖的水下领域表面穿行的人们对他的敬意。那些以前曾穿越过赤道的船员被称作老手，而那些以前没有穿越过赤道的船员被称为蝌蚪。在全体船员中要挑选出资历最老且最有威望的船员扮成海神来主持这个仪式，其他参加仪式的人则扮演海神的得力助手海妖戴维·琼斯（Davy Jones），海神的皇家书吏、皇家医生、皇家牙医和撒旦。“蝌蚪”们会被“熊”围赶进甲板上的一个帆布大水池里。然后，船长会给每个新手颁发一个由他签署的证书，证书上写着：“致美人鱼、海蛇、鲸鱼、鲨鱼、鼠海豚、海豚、鳐鱼、鳗鱼、哑口鱼、龙虾、螃蟹、蝌蚪和其他所有的海洋生物：我们为某某某（新船员的姓名）举行了正规的入会仪式，他已经成为我们古老神秘的深海组织的一员。”所有种族的水手都非常珍视这个要永久广泛地献身于海洋的誓词。

船上的大部分服役人员都是从缅甸战区返回的黑人士兵，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缅甸时参与了著名的滇缅公路的修建。滇缅公路主要用于向中国的非沦陷区运输战略物资。这些黑人士兵非常友好，常常帮助中国男孩们往甲板上运输沉重的大罐头。这些大罐头要一直储存在船上，直到抵达下一个港口才能清理。黑人士兵管理厨房，也是船上主要的厨师。船上的食物很充足，简单、健康，分量很足。船上咖啡的大杯相当于美国普通杯的两倍。那些黑人士兵每天早上还负责打扫甲板、公共厕所和洗漱间。

1945年2月2号，这艘轮船安全抵达了洛杉矶，这场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终于结束了。我们扔掉了卡其色的制服，换上了市民

的服装。我穿着我的薄西装，拎着我的帆布袋走下了踏板。在码头上，有红十字会的女士们迎接我们，并提供了咖啡和甜甜圈。通过了移民检查、海关检查和安全检查之后，红十字会的人把我们带到了—个宿舍休息，但是因为床位不足，只能两人睡—张。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然后出去买了一双法国品牌的鞋子，换下了我脚上穿着的这双中国制造的、已经破烂不堪的鞋子。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穿前—种样式的鞋子。然后，我去了美国运通公司，想买—张到纽约的火车票。我找了一位看起来最友善、最好说话的售票员，因为我要确保自己尽快登上火车，这样就不用再睡在红十字会的宿舍里了。这位女士非常照顾我，卖给了我—张普尔曼卧铺车票，火车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出发。

我返回宿舍，取了我的行李，然后到街上等出租车。不一会儿，—辆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车里已经坐着一位女乘客，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和她—起乘坐这辆出租车，因为在战争年代，所有的出租车都可以搭载多名乘客。她了解到我是刚从国外战区来到洛杉矶的，就开始和我谈论战争的情况。我们彼此互相介绍了自己，发现我们都来自夏威夷的瓦胡岛。我不禁感叹：世界真小呀！

五天后的—大早，火车抵达了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下了火车之后，我看见我的三个孩子坤仪、文仪和守仁已经站在月台上等我了。我提前发电报告知他们我到达的日期。在无声的幸福泪水中，我们拥抱住彼此。深情的问候之后，文仪向我介绍了站在她身边的一位年轻人，他叫李祖安，是加拿大人，也是文仪的未婚夫。我们—起乘出租车离开了车站，来到了滨江大道附近

的 110 号街上，孩子们在那里为我们刚刚团圆的一家三口租了两间带家具的房间。然后我们去了一家中国餐厅吃午饭，这也是我从一个月前离开孟买之后吃的第一顿中餐。

和孩子们交谈后，我得知坤仪在纽约大学读大四，文仪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而守仁则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大二学生。我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我给他们讲了他们挚爱的母亲的所有事情，虽然我和我妻子在澳门时还能极偶尔地跟他们通一次信，但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都没有联络过了。

到达这里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他们挚爱的母亲举行一个小型的非正式追悼会。坤仪告诉我，她有个来自檀香山的朋友斯蒂芬·G. 马克神父（Reverend Stephen G. Mark）正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他能帮助我们安排这个仪式。于是，我们请求这个檀香山的神父帮助我们。他向我们承诺会在神学院里找一个小教堂来举行这个追悼会。到了晚上，守仁单独和我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不会参加这个追悼会，因为他已经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受他们母亲的影响，守仁、文仪和坤仪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在中国加入了浸信会。我告诉守仁，无论他现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不参加缅怀他母亲的仪式都是不孝的。追悼会当天，守仁还是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参加了仪式。那天没有一个外人在场，因为这原本就是一场仅限于家庭成员的追悼会。马克神父为这个追悼会准备了一场庄严动人的布道，然后我说了几句关于失去妻子的沉痛的话，并告诉我的孩子们，根据中国的孝道，缅怀她们母亲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地对

社会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至于我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和孩子们团聚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了。我在美国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我将会带着淡然和自信来迎接它。

第十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由于这本回忆录最初于 1950 年开始编写，但直到 23 年后的 1973 年才被出版，所以我在这里又记录了我在这段时间对中国情况的一些观察。

1944 年我离开中国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夺回了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领土。1945 年日本向同盟国投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东三省并占领了周围的乡村；国民党军队则驻扎进了那里的城市。国共两党争夺东三省控制权的战争最终以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结束，并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投降。

带领着仅剩的残兵败将、政治追随者和富有的大陆难民，蒋介石逃到了台湾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中华民国”。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美国视“中华民国政府”为代表中国大陆和台湾人民的政府。

然而，国民党在台湾执政后并未翻开新的政治篇章，也不采取正当的民主和法律程序，而是继续在台湾实行专制。在美国的

外资援助下，台湾日益繁荣了起来，并且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平；那些在大陆祖籍家乡会受到打压的老一辈华侨富商们也在台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岛上依靠无情的军事统治来维持和平和秩序。这个台湾政权的统治阶级腐朽、保守，犹如一潭死水，不可能发起彻底的政治、法制、经济和社会改革，所以不可能实现政府的革新和现代化，而且，这样的政府也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渴望建立民主政府、获得政治话语权的诉求已经在广大台湾居民之间暗潮涌动，国民党如果不做出改变，恐怕是抵挡不住当前不利的国际形势及岛上人民的反对的。自国民党的建立者孙逸仙博士逝世后，国民党内一直未能出现一个能够将孙逸仙博士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构想变为现实，实现全民民主的遗志继承者，实属不幸。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了一个由全国各族人民参与的开明的社会、经济和民主结构，在反腐、取消卖淫、清除乞讨和消除饥荒方面做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成绩，在为全民平等地提供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满足所有人的生活需求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这种依伦理道德严格要求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与共产党无私的道德领袖们积极、巧妙和优秀的组织能力是分不开的。在中国过去四千年的历史中，人们从未以这样的规模被如此有效地组织起来，去满足他们生存所需的一般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八亿普通人民的社会天堂、健康天堂和福利天堂。

从哲学上来说，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治国根基是“王道”

中带着些许“霸道”，“王道”即统治者应保持公平正义的正道，而“霸道”则是指有效管控的力道。中国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经济服务、福利和文化服务时就是在行“王道”；共产党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原子装备为实施一党专制做保障即是“霸道”。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是只基于“霸道”实施其统治，对人民实行从思想到物质的绝对控制。所以实际上，与中国政府相比，台湾更像一个警察社会，因为它没有前者所能提供的社会、经济和福利、民主。

1972年3月18日，美联社报道称，经过四天的激烈辩论，台湾“立法院”在人民呼吁政府改革的压力之下于前一天通过了一项法律，批准“中华民国”举行自1948年以来的首次普选。这次选举在台北市举行，虽然选举结果丝毫没有撼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的统治力，但是更多台湾人当选政府官员为政府提供了更稳固的基础。我们可能注意到，自这些达官贵人们逃至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便宣布重新返回大陆前将不再进行新的选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尽管台湾土著居民约占台湾总人口的85%，但在所谓的代表机构中，台湾人的比例不超过10%。在这次选举之前，“国民大会”、“立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成员还完全是由1948年选举产生的那些成员组成的，而且这些成员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去世或退休。从现在起，“立法院”每三年要选举100~200名新成员，“考试院”和“监察院”每隔六年选举100~200名新成员。尽管如此，考虑到联合国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驱逐引发的国际危机，这样的政治改革显然为时已晚，范围和力度也太小，因此并不能将整个台湾岛团结起来进行彻底的基本改革。

自孙逸仙博士去世后，国民党就不再坚持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和民生——作为其治国纲领。民族和民权意味着政治民主和法律民主，孙逸仙博士倡导的是平等的政治措施，如立法创制权和全民公投；而民生意味着财富的平等分配、人民的充分就业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和卫生服务的公平享有，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所提供的一样。如果台湾政权还想存续下去，那么根据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原则对整个政府进行重组是最基本的改革，台湾应当实行英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法律民主，同时还应像大陆那样提供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和服务民主。在过渡时期，应通过公民投票选举的方式，在岛上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全台湾所有人民的联合政府。^①

《旧金山纪事报》在1972年3月20日发表的一篇社论文章称：“台湾举行的首次全民选举并非是针对台湾土著居民做出的一次巨大让步，也达不到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明确提出的要求。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是一个致力于以人民自治为原则，将台湾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共和国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都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1945年

① 居住在菲律宾群岛和其他国家的海外华人在当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之后还未被许可入籍。联合国应该公平公正地采取法律形式解决这一问题，判定这些人作为他们居住地的公民，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祖先的居住地来将他们划定为具有双重国籍的公民。例如，所有华裔美国居民都是美国人，应当被归入美国生活体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无权在这些美籍华人归国探亲时判定他们为具有双重国籍的中国人。由于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约有3000万之多，他们的政治地位问题将对未来世界的和平和秩序产生影响。

时也认同这一观点。”

大体来说，中国的治国哲学是顶级领导者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同时对这些领导施行全面而宽松的监督和检查。因此，负责监察的官员们必须值得信赖、能力突出，还要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应对复杂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位这样的领导人时，便会出现一段和平、有序、繁荣的时期。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杰出领袖。但他们往往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到同样杰出的继任者。因为积极乐观、有建设性的领导者是非常罕见的，除了必要的后天培养之外，更主要的是天生具备的素质。这正是中国管理体制的根本弱点所在。在中国处于专制统治的时代里，好的政府总是不能延续，因为很难找到优秀的继任者来统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最有效的政权就是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社会机构、教育机构、经济机构、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住房机构和福利机构。问题是能否找到可信赖的、强大的、有能力的顶层领导者在未来继续指导并延续这些进步的措施。至于中国台湾地区，在那些能力稍弱的顶层领导者们领导之下，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则是维持其和平稳定的现状。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让年轻一代的领导人接替老一辈领导人。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席位，并驱逐“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提案。赞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

驱逐“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国家有阿尔巴尼亚、英国、法国、加拿大、苏联等，赞成联合国保留“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以西班牙、希腊、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投了弃权票。

通过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8 亿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驱逐“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决定对国际形势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非比寻常的举动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是因为美国放弃了坚定执行了 26 年的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具有稳固政权，并受其人民支持的政府的政策；二是因为控制联合国大会的众多小国家正在发挥它们的政治力量来摆脱美日及其同盟国的强权政治对大型国际组织的操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得以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而无须再受少数几个大国的干涉。

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友好访问的活动加强了中国与世界上重要强国的合作，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有序的世界，也是为了避免未来发生原子灾难导致人类毁灭。由尼克松总统来为世界和平而改变对华政策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到目前美国还是唯一一个人人们能享受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国家。

只有当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制和谐共存的时候，我们才能实现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容纳了所有这些基本元素的大家庭。联合国将成为帮助实现这些理想目标的最佳世界组织，而各国可以通过协商来消除分歧或根据法律将他们的纠纷提交到国际法院依法裁决。在单一的

经济体制下，有工业实力和财政优势的国家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简单的工业并生产能够保障生存的食物，这样就可以避免瘟疫和饥荒的发生，从而消除革命发生的根源。

其他阻碍世界和平和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也应当被消除。首先，各国的居民必须被授予公民身份，而且公民在变更国籍时不应有任何障碍。在以色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以及其他地方实行的根据种族授予国籍的这一过时标准应予以废除，如此才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秩序。

最后，我想引用一下詹姆斯·赖斯顿（James Reston）在《纽约时报》（1972年3月5日）上就尼克松总统北京之行对美国人民的意义所发表的有见地的观点：

当尼克松政府的历史最终被书写时，最有可能受到称颂的应该就是他的对华政策，这也是常识和优秀外交政策的范例……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了美国政策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孤立和敌对中国，并且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之后把问题解决了……哪怕北京之行只是重新打开了中美之间的沟通大门，让双方进行了坦诚、融洽的会晤，这也足够意义重大了；更何况，这次访问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它终结了过去一代人的一些假想，而正是这些假想导致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曾确信在朝鲜和越南的美国军队旨在颠覆新中国的政权，而美国也担心中国将要把它的势力扩展到东南亚地区，这次访问至少让人们对这些臆测产生了质疑。

第二十章 返回美国后的活动

返回美国后，我在 1945 年至 1972 年这 27 年间的主要活动涉及社会服务和金融。我在美国的第一个社会服务项目是与国际联盟的前任中国劳工代表汤姆斯·T. 周上校（Colonel Thomas T. Tchou）合作，在纽约宣传旨在促进国际和平的“同一个世界”（One World）组织。这项活动受到了诸多中美朋友的强力支持，包括前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和纽约教会和平联盟（Church Peace Union）的杰出领导者亨利·A. 阿特金森（Henry A. Atkinson）。^①

1948 年，我代表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前往香港发展农业和养牛事业。这个项目曾在南美洲采用双方各投资 50% 的方式取得了极大成功，即洛克菲勒家族每投资一美元，当

^① 为了给“同一个世界”组织组建分支机构，我不断奔走在美国各地。在此过程中，我认识了丹佛办事处秘书瓦奥莱特·J. H. 科尔宾（Violet J. H. Corbin）。我们于 1947 年结婚，但是后来协议离婚了。

地政府也要进行同等的投资。尽管有南美洲的成功经验在前，但香港当局却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积极的响应。

在这次去往香港的旅途中，我遇到了我的现任妻子金·瓦·程（Kim Wa Cheng，音译），之后我们在那里结了婚，后来我又把她带回了美国。现在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在旧金山。

1949年，我前往旧金山时，如今已故的原《华人世界》（*Chinese World*）开明出版商李戴明先生邀请我为他的中文报纸创建一个英文版本。于是，《华人世界》成为美国第一份双语日报，专门介绍中国人对与他们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个报纸后来和旧金山市政厅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因为它的公关经理也兼任旧金山市长的公关经理。

在《华人世界》工作一年后，我受旧金山历史最悠久的中国进口企业和记公司（*Wo Kee Company*）的邀请对公司业务进行整合。为了给公司提供中国商品，我去了中国商品集散港口香港，与那里的英美贸易代表协商签发“原产地综合证书”的问题。该证书由香港签发，表明运往美国的商品不是中国大陆生产的。因此，通过帮助和记公司，我也帮助了其他中国商品进口商，使他们能够将中国商品供应给美国的华人群体。

65岁时，我从和记公司退休。我本打算回到纽约居住，但是我妻子考虑到旧金山宜人的自然气候，坚持继续住在旧金山，所以我又着手成立了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San Francisco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唐人街分会。这是唐人街的第一个储蓄和贷款机构，它为中国人提供的存款利率比银行提供的存

款利率高。因为选择了恰当的营业地点，再加上为致力于社区服务的建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贷款，以及向香港家庭汇款免除手续费等举措，唐人街分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在社区服务中心向社区公众提供免费的个性化公共服务，以及向社区公众提供关于移民、健康、教育和其他问题的具体信息，分会的公众形象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唐人街分会是一项成功的金融事业。我在唐人街分会工作了 15 年，到 1971 年才以 79 岁高龄退休，当时唐人街分会的储蓄额已达 6000 万美元，是唐人街所有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中资产数额最大的。

在唐人街分会工作期间，我作为中国商会的代表，邀请长老会医学中心（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调查和研究旧金山中国医院（San Francisco Chinese Hospital）的各项工作，帮助完成了旧金山中国医院的重组。医学专家调查发现，旧金山中国医院的医生不保留患者的记录，医院甚至没有设立人体组织委员会。带着这份报告，我向旧金山市卫生部施压，强制旧金山中国医院提高其医疗水平，最终，这家医院成为一家被公众认可的医疗机构。

为整合唐人街社会项目的整体规划，我说服更多开明的中国民间领袖与我合作，成立大唐人街社区服务组织（Greater Chinatown Community Service Organization）。这个组织已经发展为一个著名的行动组织。它为旧金山中国文化基金会（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of San Francisco）提供了赞助，该基金会目前正在花园角广场（Portsmouth Square）上的假日酒店大楼三层建设中国文化中心项目（中国文化基金会的创办计划书参见附录 A）。

1972年，大唐人街社区服务组织恳请旧金山市批准一项总体规划的研究，这个总体规划旨在解决唐人街的休闲设施和住房问题。为了贯彻研究成果，监事会批准了城市规划委员会和重建办公室关于在斯托克顿街和萨克拉门托街拐角新建200栋中低价位的私人住房的计划。计划中还包括在街面上建立商店和办公室，以及露天场所和购物中心。这个项目的初期筹备预算是120万美元。联邦政府拨付的80万美元将解决项目预算的2/3，剩下的1/3（40万美元）则由旧金山市政府承担。这个项目的整体预算大约是750万美元。旧金山市政府想找一家非营利组织来开发和建造这个有意义且惠及大众的项目。

作为社区的一名退休人员，我目前仍然忙于金融、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咨询服务，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贡献我的一点力量。祝愿每个人都能生活在和平、自由和正义之中。

附录 A

旧金山中国文化基金会创办计划书

鉴于中国人在旧金山已经取得的成就，在这座城市里建立中国文化中心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文化最伟大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丰富与之相对的美国文化，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创造互相了解的桥梁并最终消除隔阂。

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些旧金山华裔美国市民在旧金山唐人街社区服务中心的领导之下，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同旧金山再发展事务处携手，在老正义大厅创立了中国文化中心。

1965年10月，这些市民依据加利福尼亚州非营利组织法设立了旧金山中国文化基金会，希望以此在旧金山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论坛。因为唐人街是所有在美国华人的非官方的首都，所以旧金山被选为了中心成立地点。

现中国文化基金会已与旧金山政府、再发展事务处及开发商

正义股份有限公司洽谈了关于在老正义大厅设立办公场所的事宜。基金会已经与正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 60 年的租约。至 1970 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基金会将租用面积为 2 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场所，实体设施包括礼堂、展览室、图书馆、演讲室及会议和办公场所。

中国文化基金会的活动、宗旨和目标可概括如下：

1. a. 在展览室展示代表中国优秀艺术水平的绘画、雕塑、陶瓷、青铜、玉石及其他手工艺作品。
 - b. 在礼堂进行文艺、戏曲和戏剧表演。
 - c. 在图书馆提供中国艺术和哲学方面的图书借阅。
 - d. 在演讲室举办文化主题和成人教育相关的讲座和研讨会。
2. 旨在推进太平洋盆地地区国家间贸易和交流的活动。

为进行这项工作，基金会呼吁所有美国和中国群体向我会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中国人已经与许多杰出的美国领导者成为朋友，我们相信他们会延续这个优良的传统，加入推动中国文化中心发展的活动。

附录 B

本书作者致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组的一封信

富兰克林·L. 何教授

韦慕庭教授

主任

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组联合主任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

纽约, N. Y. 10027

尊敬的何教授、韦慕庭教授：

我愿将本人所著的《蔡增基回忆录》一书原稿交由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别收藏馆收藏。在特别收藏馆管理员的指导下，此手稿可供哥伦比亚大学认可的学者做学术研究之用。以上学者可按照图书馆相关规定摘用原文简短段落或标注参考文献。

蔡增基回忆录

未经本人、本人的继承人、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许可，不得将此手稿出版发行。

此致

敬礼

蔡增基（签名）

1971年12月31日

附录 C

旧金山监事会授予蔡增基的荣誉证书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监事会向蔡增基——广为人知并广受敬重的旧金山商人、慈善家及杰出的市民领袖，授予此荣誉证书，以表彰其在促进公民权利和改善弱势群体生存条件领域所做的工作及在提升社区福利方面做出的高度有效的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了众多出于公民责任心而进行的推动本县和本市未来发展和进步的项目。

本人特此证明，

旧金山监事会于 1971 年 3 月 8 日经会议决定颁发此荣誉证书。

监事会主席：戴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

会议书记员：罗伯特·多兰（Robert J. Dolan）

议题发起人：监事戴安范·斯坦

旧金山市官方印章

附录 D

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会议关于表彰蔡增基的决议

大会规章委员会——加利福尼亚州议会

经尊敬的马奇·K. 方 (March K. Fong) 阁下, 第 15 区

尊敬的约翰·L. 伯顿 (John L. Burton) 阁下, 第 20 区

尊敬的小威利·L. 布朗 (Willie L. Brown, Jr.) 阁下, 第 18 区

[共同执笔人: 参议员乔治·R. 莫斯科尼 (George R. Moscone),

第 10 参议员选区]

提议的关于表彰蔡增基的决议

鉴于蔡增基先生近期当选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副主席; 及

鉴于蔡先生于 1956 年加入该协会, 在协会总部组建了华人部, 并于不到一年之后被任命为协会新建的唐人街分部经理; 及

鉴于蔡先生将唐人街分部壮大为一个在规模和资金实力上胜

附录 D

于许多其他储蓄协会本部的分部；及

鉴于蔡先生是旧金山最杰出的华人领袖之一，并于 1967 年获第五届旧金山基金会年度人际关系奖，并作为旧金山商会对东方贸易考察团顾问；及

鉴于蔡增基先生致力于推广位于老正义大厅的中国文化中心的发展，也是旧金山规划和城市复兴协会顾问团成员；现经大会规章委员会决议，祝贺蔡增基先生的成就及对社区的贡献；并决议，由大会总书记员向蔡增基先生签发本决议副本。

大会规章委员会第 153 号决议

经主席尤金·A. 查皮 (Eugene A. Chappie)

于 1970 年 2 月 19 日签署

发言人：鲍勃·莫纳根 (Bob Monagan)

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大会官方印章

附录 E

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关于表彰蔡增基的决议

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董事会通过表彰蔡增基在唐人街分部 15 年工作成就的决议

摘自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 1971 年 10 月 26 日例行会议的会议记录

“米切尔（Mitchell）主席宣读了唐人街分部副主席兼经理蔡增基于 1971 年 9 月 22 日签字发出致他本人的信件。

“对经史蒂文斯（Stevens）董事提议，巴塞罗缪（Bartholomew）董事附议并进行讨论的议案，最终决议如下：

鉴于协会董事会于 1956 年 8 月 21 日发起并执行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储蓄和贷款项目；及

鉴于该项目的目的曾是，现在依然是让旧金山储蓄和贷款提供的这项服务惠及本地区一个古老且值得尊敬的少数群体；及

附录 E

鉴于蔡增基先生被本董事会及管理层任命为在旧金山华人社区格兰特大道创立并运行本协会分部的人选；及

鉴于该分部全体工作人员在他们勇往直前的领导蔡增基的带领下，凭借活力、技巧和忠诚，取得了其他金融机构鲜可企及的巨大成功；

因此，本董事会现在万分惋惜地接受蔡增基提交的退休申请，并于 1971 年 12 月 31 日正式生效。我们在此回溯蔡先生值得尊敬的协会工作经历，忠诚、勇敢、坚韧、热衷慈善只是他诸多美德中的几个代表。他对协会、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忠诚，对他坚信的事业坚持到底和对受压迫群体敢于给予支持，即便是为此冒犯强权也在所不惜；为实现目标而不惜努力地坚持——无论是为了建立一个成功的分部还是创立中国文化中心并为其筹集资金的事业；最后他还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缺乏教育者和受压迫者进行的慈善活动。本董事会特此向蔡增基表达其感激与敬重，并祝福我们敬爱的增基能够享受他应得的平静惬意的退休生活。”

特此证明，以上为旧金山联邦储蓄和贷款协会 1971 年 10 月 26 日例行会议的会议记录的真实和准确摘录。

董事签名：

主席：克拉克·韦兰德（Clarke E. Wayland）

副主席：查理·F. 马斯腾（Charles F. Masten）

富兰克·H. 巴塞罗缪（Frank H. Bartholomew）

罗伯特·M. 坎农（Robert M. Cannon）

小亚力山大·C. 史蒂文斯 (Alexander C. Stevens, Jr.)

理查德·沃尔伯格 (Richard Walberg)

威廉·F. 迪恩 (William F. Dean)

菲利普·J. 菲茨杰拉德 (Philip J. Fitzgerald)

唐纳德·W. 米切尔 (Donald W. Mitchell)

查理·D. 苏依 (Charles D. Sooy)

威廉·C. 泰特 (William C. Tait)

编印说明

本书是蔡增基先生的个人回忆录，初稿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完成，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项目组的协助下进行细节挖掘与编辑补正，并于 1973 年在美国出版。

1935 年至 1941 年，蔡增基作为国营招商局总经理，对招商局进行了整顿与改革：甄别考试，裁减冗员；与青帮谈判，在租界当局协助下，重夺金利源码头的控制权；购买新船、扩充船队，与怡和、太古及日资航运公司竞争。尤为重要的是，蔡增基有效处理了招商局在汇丰银行 1600 万元欠款问题，使得招商局度过破产危机。抗战爆发后，蔡增基一方面率部分轮船南撤香港，暂避敌军锋芒；另一方面又委托美商卫利韩公司代为管理与经营招商局，并安排把船只撤入长江腹地。直至 1941 年香港沦陷，避居澳门，不再过问局内事务。

该回忆录内容除反映蔡增基担任招商局总经理施行的整顿改革措施外，还记述了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有在徐世昌领导下的

北京政府、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就职的从政经历，也有求学美国、考察西欧诸国及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可以说，蔡增基回忆录不仅是一份珍贵的个人生平记录，也是一份重要的民国史资料，对研究招商局经营管理、民国政府运作及抗日战争等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史课题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2014年10月，“招商局与中国企业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有学者提到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发现蔡增基回忆录后，引起招商局集团领导与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会后，搜集该回忆录资料，组织翻译成中文。于今付梓，以飨读者。

招商局史研究会